

拜德雅
Paideia
人文丛书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批评的功能

[英] 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 著

程佳 |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现代批评是在反对绝对主义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定义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根本没有前途。

“如今，用英语写作的文化批评家中，伊格尔顿首屈一指。”（《卫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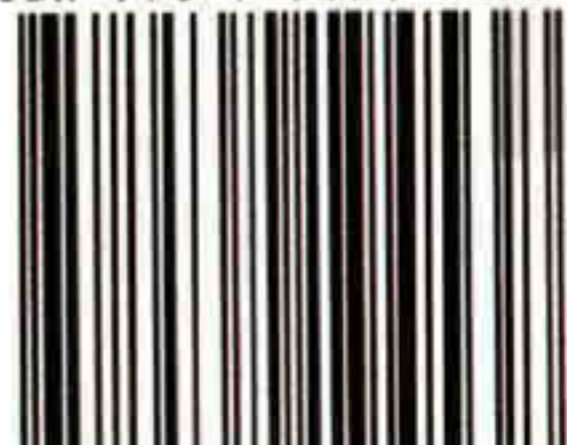
“伊格尔顿是一位斗志昂扬、表述果决、诙谐机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国家周刊》）

上架建议：批评·理论



拜德雅 Paideia

ISBN 978-7-5621-9453-8



9 787562 194538 >

定价：35.00元

批评的功能

[英]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 著

程 佳 |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批评的功能/ (英) 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著; 程佳译.--重庆: 西南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621-9453-8

I. ①批… II. ①特… ②程… III. ①文学批评—研
究 IV. ①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46388号

拜德雅·人文丛书

批评的功能

PIPING DE GONGNENG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程 佳 译

特约策划: 邹 荣 任绪军

特约编辑: 任绪军

责任编辑: 刘江华

书籍设计: 左 旋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400715)

网 址: <http://www.xscbs.com>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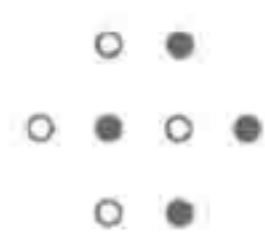
幅面尺寸: 130mm × 185mm 印张: 6.25 字数: 99千 插页: 32开1页

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1-9453-8 定价: 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拜德雅
Paideia
人文丛书

拜德雅·人文丛书
学术委员会

〇 ● 〇

学术顾问

张一兵 南京大学

学术委员(按姓氏拼音顺序)

陈越 陕西师范大学

蓝江 南京大学

李洋 北京大学

鲁明军 四川大学

王春辰 中央美术学院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

夏莹 清华大学

杨北辰 北京电影学院

张生 同济大学

姜宇辉 华东师范大学

李科林 中国人民大学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陆兴华 同济大学

王嘉军 华东师范大学

吴琼 中国人民大学

夏可君 中国人民大学

曾军 上海大学

朱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

献给
托瑞尔
我的挚友

- 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1

中国古代，士族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与雅。《礼记》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些便是针对士之潜在人选所开展的文化、政治教育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使之在品质、学识、洞见、政论上均能符合士的标准，以成为真正有德的博雅之士。

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古希腊也存在着类似的德雅兼蓄之学，即 paideia(παιδεία)。paideia 是古希腊城邦用于教化和培育城邦公民的教学内容，亦即古希腊学园中所传授的治理城邦的学问。古希腊的学园多招收贵族子弟，他们所维护

的也是城邦贵族统治的秩序。在古希腊学园中，一般教授修辞学、语法学、音乐、诗歌、哲学，当然也会讲授今天被视为自然科学的某些学问，如算术和医学。不过在古希腊，这些学科之间的区分没有那么明显，更不会存在今天的文理之分。相反，这些在学园里被讲授的学问被统一称为 *paideia*。经过 *paideia* 之学的培育，这些贵族身份的公民会变得“雅而有德”（καλὸς κἀγαθός），这个古希腊语单词形容理想的人的行为，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Ἡρόδοτος）常在他的《历史》中用这个词来描绘古典时代的英雄形象。

在古希腊，对 *paideia* 之学呼声最高的，莫过于智者学派的演说家和教育家伊索克拉底（Ἴσοκράτης），他大力主张对全体城邦公民开展 *paideia* 的教育。在伊索克拉底看来，*paideia* 已然不再是某个特权阶层让其后嗣垄断统治权力的教育，相反，真正的 *paideia* 教育在于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迪，开启人们的心智，与此同时，*paideia* 教育也让雅典人真正具有了人的美德。在伊索克拉底那里，*paideia* 赋予了雅典公民淳美的品德、高雅的性情，这正是雅典公民获得独一无二的人之美德的唯一途径。在这个意义上，*paideia* 之学，经过伊索克拉底的改造，成为一种让人成长的学问，让人从 *paideia* 之

中寻找属于人的德性和智慧。或许，这就是中世纪基督教教育中，及文艺复兴时期，paideia 被等同于人文学的原因。

2

在《词与物》最后，福柯提出了一个“人文科学”的问题。福柯认为，人文科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而这门科学，绝不是像某些生物学家和进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从简单的生物学范畴来思考人的存在。相反，福柯认为，人是“这样一个生物，即他从他所完全属于的并且他的整个存在据以被贯穿的生命内部构成了他赖以生活的种种表象，并且在这些表象的基础上，他拥有了能去恰好表象生命这个奇特力量”¹。尽管福柯这段话十分绕口，但他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方方面面，包括哲学、语言、诗歌等。这样，人文科学绝不是从某个孤立的角度（如单独从哲学的角度，

1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459-460。

单独从文学的角度，单独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我们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相反，它有助于我们思考自己在面对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性时的构成性存在。

其实早在福柯之前，德国古典学家魏尔纳·贾格尔(Werner Jaeger)就将 *paideia* 看成一个超越所有学科之上的人文总体之学。正如贾格尔所说，“*paideia*，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名称，更是代表着这个词所展现出来的历史主题。事实上，和其他非常广泛的概念一样，这个主题非常难以界定，它拒绝被限定在一个抽象的表达之下。唯有当我们阅读其历史，并跟随其脚步孜孜不倦地观察它如何实现自身，我们才能理解这个词的完整内容和含义。……我们很难避免用诸如文明、文化、传统、文学或教育之类的词汇来表达它。但这些词没有一个可以覆盖 *paideia* 这个词在古希腊时期的意义。上述那些词都只涉及 *paideia* 的某个侧面：除非把那些表达综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古希腊概念的范畴”¹。贾格尔强调的正是后来福柯所主张的“人文科学”所涉及的内涵，也就是说，*paideia* 代表着一种先于现代人文科学分科之前的总体性对人

1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1. Oxford: Blackwell, 1946, p.i.

文科学的综合性探讨研究，它所涉及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诸多方面的总和，那些使人具有人之心智、人之德性、人之美感的全部领域的汇集。这也正是福柯所说的人文科学就是人的实证性(positivité)之所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与贾格尔对 paideia 的界定是高度统一的，他们共同关心的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大地上具有了诸如此类的人的秉性，又是什么塑造了全体人类的秉性。paideia，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正如伊索克拉底所说的那样，一方面给予我们智慧的启迪；另一方面又赋予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形式。对这门科学的探索，必然同时涉及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是对经典的探索，寻求那些已经被确认为人的秉性的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学问；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依循着福柯的足迹，在探索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形式之后，最终还要对这种作为实质性的生命形式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即让我们的生命在其形式的极限处颤动。

这样，paideia 同时包括的两个侧面，也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进行探索的两个方向：一方面它有着古典学的厚重，代表着人文科学悠久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良好传统，

孜孜不倦地寻找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人文科学努力在生命的边缘处，寻找向着生命形式的外部空间拓展，以延伸我们内在生命的可能。

3

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不过，我们并没有将 *paideia* 一词直接翻译为常用译法“人文学”，因为这个“人文学”在中文语境中使用起来，会偏离这个词原本的特有含义，所以，我们将 *paideia* 音译为“拜德雅”。此译首先是在发音上十分近似于其古希腊词汇，更重要的是，这门学问诞生之初，便是德雅兼蓄之学。和我们中国古代德雅之学强调“六艺”一样，古希腊的拜德雅之学也有相对固定的分目，或称为“八艺”，即体操、语法、修辞、音乐、数学、地理、自然史与哲学。这八门学科，体现出拜德雅之学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在某一个门类下的专门之学，而是统摄了古代的科学、哲学、艺术、语言学甚至体育等门类的综合性之学，其中既强调了亚里士多德所谓勇敢、节制、正义、智慧这四种美德

(ἀρετή), 也追求诸如音乐之类的雅学。同时, 在古希腊人看来, “雅而有德”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人文学, 最终是要面向一个高雅而有德的品质, 因而在音译中选用了“拜”这个字。这样, “拜德雅”既从音译上翻译了这个古希腊词汇, 也很好地从意译上表达了它的含义, 避免了单纯叫作“人文学”所可能引生的不必要的歧义。本丛书的 logo, 由黑白八点构成, 以玄为德, 以白为雅, 黑白双色正好体现德雅兼蓄之意。同时, 这八个点既对应于拜德雅之学的“八艺”, 也对应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谈到的正六面体(五种柏拉图体之一)的八个顶点。它既是智慧美德的象征, 也体现了审美的典雅。

不过,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 跟随福柯的脚步, 向着一种新型的人文科学, 即一种新的拜德雅前进。在我们的系列中, 既包括那些作为人类思想精华的经典作品, 也包括那些试图冲破人文学既有之藩篱, 去探寻我们生命形式的可能性的前沿著作。

既然是新人文科学, 既然是新拜德雅之学, 那么现代人文科学分科的体系在我们的系列中或许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个拜德雅系列, 已经将历史学、艺术学、文学或诗学、

哲学、政治学、法学，乃至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涵括在内，其中的作品，或许就是各个学科共同的精神财富。对这样一些作品的译介，正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在一个大的人文学的背景下，在一个大的拜德雅之下，来自不同学科的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文字中，去呼吸这些伟大著作为我们带来的新鲜空气。

目 录

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iii

批评的功能 /1

前言 /3

I /7

II /37

III /61

IV /97

V /119

VI /149

索引 /173

批评的功能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前 言

7

或许我通过想象以下情景来描述本书背后的动机最为合适：一位批评家坐下开始研究某个主题或某位作家，忽然他被一组令人困扰的问题给吸引住了：这个研究的意义何在？打算研究给谁看、影响谁、令谁印象深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又赋予这种批评行为什么样的功能？只要批评制度本身被认为不成问题，批评家写作时就会充满信心，而一旦批评制度遭到根本性的质疑，人们往往就以为个体的批评行为会陷入困顿和自我怀疑。今天，批评行为仍在继续，而且完全带有其传统的自信，这一明显事实无疑表明：批评制度的危机要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要么被主动回避掉了。

本书的论点，即批评在今天缺乏实质性的社会功能，要么属于文学产业公共关系分支的一部分，要么就完全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可它的情况并非一直是这样，今天甚至也不必如此，我主要通过考察 18 世纪以来英国批评制度的演变

8 过程来尽力说明这点。作这一简单历史回顾的指导性概念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最初由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1962)中提出,虽然它已被证明绝非无可争议,总是在理念模式和历史描述之间游移不定,面临诸多严重的历史分期问题,而且在哈贝马斯自己的书中,它也不易与某种非常值得商榷的社会主义观点区分开来。“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很难摆脱怀旧和理想化的内涵,它像“有机社会”(organic society)一样,有时似乎是从问世伊始就在不断瓦解。并非我有意要加入这些理论上的争论,我更为关注的是在恰当的时机灵活有效地利用这个概念的方方面面去阐明一段特殊的历史。不言而喻,这种历史回顾绝非对政治毫无兴趣:我研究这段历史,就是为了提出问题,为了说明批评在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在学术界内部保持对统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的作用以外,它还可以再次履行什么样的实质性社会功能。

我要特别感谢佩里·安德森、约翰·巴雷尔、尼尔·贝尔顿、诺曼·菲尔特斯、托瑞尔·莫伊、弗兰西斯·穆尔赫恩、格雷厄姆·皮奇和伯纳德·沙拉特,他们在我撰写此书时都

给予了宝贵的帮助。我也深深感激特里·科利茨和墨尔本大学的戴维·班尼特给予我的温暖与同仁之谊，跟他们在一起时我首次阐述了书中的部分观点。¹

1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政论家, 被伊格尔顿誉为“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约翰·巴雷尔(John Barrell, 1943—), 英国著名学者, 主要研究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的文学、历史和艺术。尼尔·贝尔顿(Neil Belton), 英国作家, 曾任 Verso 出版社编辑, 现为 Faber & Faber 出版社主任编辑。诺曼·菲尔蒂斯(Norman Feltes, 1932—2000), 生于美国, 1960 年代后因政见不同移居加拿大, 他的著作《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生产模式》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颇有贡献。托瑞尔·莫伊(Toril Moi, 1953—), 挪威人, 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写作、文学跨学科研究等。弗兰西斯·穆尔赫恩(Francis Mulhern, 1952—), 爱尔兰人, 曾在不同国家多所大学任教, 现为《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副主编。格雷厄姆·皮奇(Graham Pechey, 1941—2016), 生于南非, 曾任教于英国赫特福德大学, 退休后在剑桥大学兼职, 关注巴赫金及“殖民写作”, 著有《巴赫金: 世界的语词》等书。伯纳德·沙拉特(Bernard Sharratt, 1944—), 英国学者, 历史学家, 曾任《斜见》(*Slant*) 的编辑。特里·科利茨(Terry Collitz, 1940—2009), 澳大利亚作家、学者。戴维·班尼特(David Bennett), 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首席研究员。——译注

欧洲现代批评起源于同绝对主义政权所作的一场斗争。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专制政权内部开始为自己开拓独立的话语空间，倡导理性判断和启蒙批判，抵制威权政治的残酷法令。介于国家政权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尤尔根·哈贝马斯是这样定义的：它包含了俱乐部、杂志、咖啡屋、期刊等社会机构，个体的人聚集在这些社会机构，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流，以实现理性对话，将自己融入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该团体的评议也许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¹ 通情达理的公众舆论总会对抗专制政权的独断独行；一般认为，在“公共领域”这个半透明的空间内，赋予个人一定头衔去发声和作判断的，不再是社会权力、特权和传统，它取决于个体的人通过分享普遍理性的共识构成话语主体的程度。这种理性的规范，虽然自身方式是绝对的，但鄙

1 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Neuwied 1962。——原注

夷贵族权威的蛮横无理；这些规则，正如德莱顿¹所言，“其
10 建立基础是良好的判断力和充分的理性，而非威权”。²

“在启蒙时代，”彼得·霍恩达尔³撰文写道，“批评的概念不可能从公共领域制度中剥离出去。每一个判断都旨在导向一个公众群体；与读者交流是这个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同读者公众有关联，批判性思考不再具有私密性。批评将自身置于争议之中，试图说服却又招惹矛盾，变成了公众意见交流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文学批评的现代概念与18世纪早期自由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密切相关。文学服务于中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助其获得自尊、清楚表达反对绝对主义政权和等级社会的人性要求的一种工具。从前，文学讨论在贵族沙龙里帮助过

1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英国诗人、批评家和戏剧家。他通过戏剧批评和创作实践为英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发生、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欧洲批评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译注

2 《论说文集》(*Essays*)，威廉·P. 科尔(William P. Ker)编，Oxford 1926, p.228。——原注

3 彼得·乌维·霍恩达尔(Peter Uwe Hohendahl)，德国知名学者，美国康奈尔大学德语比较文学教授，著有《重估：战后批评理论转移路线》、《艺术转瞬即逝的承诺：重温阿多诺美学理论》、《建立民族文学：德国案例 1830—1870》、《批评的制度》等书。——译注

宫廷社会取得合法性，后来它成了为中产阶级议论政治铺设道路的竞技舞台。”¹霍恩达尔继续指出，这个过程首先发生在英格兰，但必须强调的是，考虑到英国的特殊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得到巩固，其实更多是受益于其紧随政治绝对主义，而非从内部去反对它。斯蒂尔²的《闲话报》(Tatler)与约瑟夫·艾迪生³的《旁观者》(Spectator)在18世纪早期是该公共领域里的中心机构。这一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确实是生气勃勃，大谈道德修正，对猖狂而又倒退的贵族阶层冷嘲热讽，但其主要动机是巩固阶级，英国资产阶级因此也许会与它的上层社会谈判，达成一个历史性的联盟。当麦考雷⁴评论说约瑟夫·艾迪生懂得如何使用讥讽而又不滥用时，他的意思是，艾迪生既针对统

11

1 霍恩达尔，《批评的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Criticism), Ithaca and London 1982, p.52。——原注

2 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 1672—1729)，英国论说文家。1709年，他创办了著名的《闲话报》，后来又与约瑟夫·艾迪生合办杂志《旁观者》。他在政治见解上倾向于辉格党。——译注

3 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英国论说文家、诗人、剧作家、辉格党政治家。——译注

4 托马斯·麦考雷(Thomas Macaulay, 1800—1859)，英国著名评论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其巨著《英国史》在文学界和史学界反响巨大，至今仍是研究那段英国历史的权威范本。——译注

治阶层、又与其保持联系，不做蒲柏或斯威夫特那样的谩骂然后分道扬镳。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在英国的发展之所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早，是因为英国的绅士和贵族不仅有卷入文化品位问题的传统，还和新兴商业阶层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并不像他们的法国对手那样。对文化、政治和经济念念不忘，这种亲密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表现得更为明显。共识性是英国公共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闲话报》和《旁观者》是英国社会形成新的统治集团的催化剂，既培养商业阶层也抬举肆意挥霍的贵族。这些杂志的日刊或三周刊，还有好几百种更小的类似刊物，见证了一种新的话语在英国后复辟时期（post-Restoration English）生成：阶级价值观密切交流，“融合了清教徒和保皇派最优秀的品质”（A. J. 贝尔雅姆¹），形成了“表达品位举止共同标准的惯用语”（Q. D. 利维斯²）。塞缪

1 A. J. 贝尔雅姆(A. J. Beljame, 1842—1906)，法国作家、学者，曾在索邦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对法国的英语文学研究贡献突出。其著作《18世纪的文人与英国公众》是对18世纪英国文学状况的精湛研究。——译注

2 Q. D. 利维斯(Q. D. Leavis, 1906—1981)，英国文学评论家、论说文家。丈夫是英国著名学者 F. R. 利维斯。她著有《小说与读者大众》一书，专门讨论工业社会里的大众传媒将文化品位标准化和平庸化的现象。——译注

尔·约翰逊¹就发现艾迪生本人的文风“熟而不俗”，打算在其中找出这种意识形态渗透的蛛丝马迹。艾迪生和斯蒂尔都奉行辉格党温和的政治主张；敞开心扉、殷勤但无宗派的品质构成了这种文化共识的基础。该政治群体在大赞辉格党商人安德鲁·福利珀特爵士²的同时，也迁就托利党罗杰·柯弗利爵士³这样的荒蛮乡绅。艾迪生本人既有城市投资，又有乡村宅邸，兼顾地产与金融利益，据他的一位评论者说，“他是该党派中为推动英国商业成功与资本交易最能说会道的辩护者”⁴，但《旁观者》俱乐部

1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巨匠，编纂了第一部《英语词典》，编注过《莎士比亚戏剧集》并作序，又著有《诗人传》等作品。——译注

2 安德鲁·福利珀特爵士(Sir Andrew Freeport)是《旁观者》所刊文章中的一个虚构人物。刊物创办者艾迪生和斯蒂尔为了统一原则，虚构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当时是伦敦社交生活的重要场所)，经常出没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代表着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这些论说文中，艾迪生和斯蒂尔以令人钦佩的幽默和洞察力描写了当代生活的日常场景与事件。——译注

3 罗杰·德·柯弗利爵士(Sir Roger de Coverley)是《旁观者》所刊文章中的另一个虚构人物，18世纪理想化乡绅的典型代表。——译注

4 L. A. 艾利厄瑟夫(L. A. Elioseff)，《艾迪生文学批评的文化环境》(*The Cultural Milieu of Addison's Literary Criticism*)，Austin, Texas 1963, p.48。至于与艾迪生自己的温和性格相配的政治信仰，参见 E. A. 布鲁姆(E. A. Bloom)、L. D. 布鲁姆(L. D. Bloom)，《约瑟夫·艾迪生的社交动物》(*Joseph Addison's Sociable Animal*)，Providence, Rhode Island 1971。——原注

- 12 更是旨在反映所有正派的社会阶层(《旁观者》,第34期)。关于艾迪生,贝尔雅姆热情洋溢地写道:“他的眼睛不仅盯着宫廷,还关注整个社会;他使得每个人都开始关注文学,进而关注他们自己的内心,形成自己的判断;他教会他们去思考,为他们提供有关艺术与人生的基本概念,他把这个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还开设了一门关于文学和美学的课程。”¹简言之,真正有助于联合英国统治集团的是文化,而批评正是这项历史任务的主要承担者。

那么有人也许会说,英国现代批评的诞生颇具讽刺意味,它是政治共识的产物。当然,并非18世纪就完全没有冲突和积怨,也不是我们就应该以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普遍共识的有机社会。论说文家和小册子作者的激烈争辩,恰恰就发生在英国社会一个越来越自信的统治集团逐渐结晶的过程当中,正是这个统治集团后来对那些可接受的言论界限作出定义。莱斯利·史蒂芬²

1 贝尔雅姆,《18世纪的文人与英国公众》(*Men of Letters and the English Public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31, p.33。——原注

2 莱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 1832—1904),英国作家、批评家、历史学家,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父亲。——译注

将18世纪诸如伏尔泰、卢梭这一类的法国文人与塞缪尔·约翰逊这样的批评家进行对照，发现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分享和表达了他们为之写作的公众的意见。¹事实上，这就是启蒙批判的讽刺所在，它对普遍理性标准所具有的吸引力，意味着对绝对主义的反抗，这种批评姿态本身通常是保守的，有纠正作用，能将特殊现象修改和调整为它毫不妥协的话语模式。批评是一个具有改良作用的机制，它严惩偏差，抑制僭越，然而这项司法技术（*juridical technology*）是以某种历史性解放的名义得以实施的。传统的公共领域涉及社会权力的话语重组，负责重新划分社会阶层间的界限，对是否从事理性论证的人加以区分。文化话语领域和社会权力领域密切相关，但并不同源：前者涉及后者区别于其他东西的特性，并将这些特性悬置起来，从而解构后者并用一种新的形式重构它，暂时把它“垂直的”渐变层次转置到一个“水平的”层面。“原则上，”霍恩达尔评论道，“每当公民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共团体时，社会特权就不被承认。在阅读社团和俱乐部中，身份地位被搁

13

1 史蒂芬，《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社会》（*English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 1963，p.33。——原注

置起来，讨论因此可以平等进行。威权式的、贵族式的艺术判断，被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使用的一种话语所取代。”¹ 一个新的文化形态嵌入英国社会传统的权力结构中，暂时消除了自身的社会特性，目的就是要更彻底地巩固其霸权地位。在18世纪的英国咖啡馆（仅在伦敦就有三千多家），“作家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与他们的恩主挨肩擦背挤一起，不论是贵族、地主、商人、专业人士……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社团的一大特色，它们的成员完全是异质的，除了诗人和其他作家，还包括政治家、外交官、律师、神学家、科学家、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演员，等等”²。贝尔雅姆写道：“这些咖啡馆提供了集结的点。人们在此见面，交换意见，形成群体，人数越来越多。简言之，公众舆论正是通过他们开始逐步形成的，此后发展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³ 用维多利亚时代一位艾迪生传记作者的话说，艾迪生是“18世纪公众舆论的‘总建筑师’”⁴。

1 霍恩达尔，p.53。——原注

2 J. W. 桑德斯(J. W. Saunders), 《英国的文学职业》(*The Profession of English Letters*), London 1964, p.121。——原注

3 贝尔雅姆，p.164。——原注

4 W. J. 柯托普(W. J. Courthope), 《艾迪生》(*Addison*), London 1884, p.4。——原注

话语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一般文化向着各个方向传播，”贝尔雅姆眉飞色舞地评论道，“将社会各个阶层联合起来。读者不再被清教徒和骑士、宫廷和城市、大都会和外省这样的防水密封舱隔离在外：所有英国人现在都是读者。”¹毫无疑问，他的话有一点点夸张：《旁观者》在大约五百五十万的总人口中销售数量为三千份左右，那个时候的购书者虽可以以万计数，但大部分英国人都是文盲，或者几乎目不识丁。似乎公共领域这个具有乳化作用（emulsive）²的空间并没有超越教区牧师和外科医生扩展到农场工人或家庭佣人。笛福说：“在这个华丽的城市（伦敦），你会发现很少有哪家咖啡馆里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修理工在评论最重要的时事，评判欧洲最轰动的事件；你在任何一家食品店里都会遇到一个补锅匠、补鞋匠或搬运工批评皇家讲话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的著作。”³他的话肯定是在夸大其辞。尽管如此，贝尔雅姆已经用他自己

14

1 贝尔雅姆，p.315。——原注

2 该词本指由于表面活性剂的作用，使本来不能混合到一起的两种液体能够混到一起。——译注

3 转引自蒂莫西·P·弗利(Timothy P. Foley)，《品位与社会阶层》(Taste and Social Class)(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的方式抓住了要点：礼貌话语在理性主体当中不断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利害攸关的是在标志层面对一个新的权力集团进行巩固。用约翰·克拉克¹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倡导优秀的文学，不仅是对宗教与道德的高度服从，也是对良好政策和公民政府的高度服从”。“提升诗性创作中的美好品位，”托马斯·库克²写道，“同样是在促进美好的行为举止。没有什么比鼓励优秀的作家更能影响一个国家了。”³

15 在这个理性空间内部，口头或书面的东西，都对阶级和阶层的礼仪细节予以充分尊重；但言说行为，即相对于表述（énoncé）的表述行为（énonciation），用本身的形式勾画出一种平等，即与它的阶级内容相抵触的自主和互惠。言说这一行为本身披露了一个准先验性的主体社会，理性交流的一种通用模式，后者威胁要驳斥它所谈及的等级和排外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领域解决了商品社

1 此处可能是指浸信会牧师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 1609—1676), 他是北美宗教自由、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早期倡导者。——译注

2 此处可能是指英国作家、翻译家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e, 1703—1756)。——译注

3 转引自弗利,《品位与社会阶层》。——原注

会的矛盾，解决的方式是大胆将其条件颠倒过来：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尴尬的若是一个过程，自然权利层面上的抽象平等通过这个过程变成一个实际微分的权利体系，那么，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会把这些微分的权利作为出发点，在话语区域把它们转换回来，又成为一种抽象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文化话语本身的那种，当然，它受到一定规范条例的限制，批评家的作用就是管理这些规范，对绝对主义和无政府状态都持拒绝态度。言论的合法性既不是源于作为信息的言论本身，也不是源于言说者的社会头衔，而是因为它作为一个陈述，符合某种铭刻在言说这一活动之中的理性范式。一个人的发言者头衔，得自一个人的话语形式特点，而非他的社会头衔赋予他的话语权威性。话语身份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参与礼貌谈话这一行为本身构成的；也许有人会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洛克式的智慧相矛盾，因为它预先确立有产主体，然后再彼此订立契约关系。相比之下，公共领域不承认任何超越自己界限的给定理性身份，因为算作理性的东西，其实是在其制约范围之内那种清晰表达的能力；理性的人是那些有能力使用某种话语模式的人，但这点只能以利用该话语模式

16 的行为来判断。因此在公共领域，合作就是标准，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有权使用该话语模式，虽然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在 18 世纪即指那些没有丝毫“利益”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来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公共领域的存在并非是为了对那些利益进行直接讨论；相反，那些利益成为公共领域非常隐蔽的问题，成了公共领域非私利查询的一种非常有利的结构。只有那些有利益关系的人才可能做到不带任何私利性。这个领域内所有特定的言论，说出来都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权威，而掩盖这些言论的，正是普遍理性本身的形式和活动，它以一种表述和交换的方式不断再现，这种方式高高在上，对它所沟通交流的局部的、本地的信息指手划脚。所有言说从而在一个政权内游移，这个政权在那个生产点上将它们提高到普遍状态，在它们内部刻写合法性，这个合法性既不先于那个特别陈述存在，也没有全然化简为那个特别陈述，但是，像“能力”（capacity）这个概念一样，它令人难以捉摸，既等同于任何的言说，又多过其言。言语和交流的这种受规则制约的形式，恰恰调节着个人陈述和作为一个整体的话语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个形式，外表上并不接受某个外

部中心的规约，因为政权可能会调节商品生产，同时，它对陈述本身也不完全是有机的。资产阶级因此在话语中会发现一个由自身社会关系构成的理想化的形象：“国家文人（*Literati of the Country*），”迪斯雷利¹在其《期刊论说文集》（*Periodical Essays*, 1780）中评论道，“是一帮独立的自由市民，他们当中存在着一种自然而然的政治平等。”²而戈德史密斯³指出“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一词的意义所在也并非没有缘故。因为还有什么可能比小生产社会更符合资产阶级的自由梦想呢？这个社会无限可用、完全用之不竭的商品，正是话语本身，它公平交换的模式确认了每个生产者的自主权。只有在这种理想的话语领域，没有支配的交换才有可能发生，因为说服并非主宰，有意见更多是一种合作而非竞争。流通在这里

17

1 此处可能是指艾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 1766—1848），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以其论说文著称于世。若如此，则文中所引文献的时间（1780年）可能有误，据维基百科，他是16岁（也就是1782年）开始文学创作的。——译注

2 转引自弗利，《品位与社会阶层》。——原注

3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英国剧作家，其创作多以嬉笑怒骂的形式，讽刺时弊，代表作为长诗《荒村》和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文人共和国”一词源自他的小说《世界公民，或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中国哲学家致其东方朋友们的信札》。——译注

得以进行，没有丝毫的剥削气息，因为公共领域内部没有任何从属的社会阶层——确实，在原则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完全没有社会阶层。根据公共领域自身在意识形态上的形象，在这个领域内岌岌可危的，不是权力，而是理性。其基础是真理，并非权威，其天天用到的是理性，并非专权。正是在政治与知识彻底分裂的基础上，它的整个话语才得以建立起来；正是当这种分裂的合理性愈来愈少时，公共领域就会开始瓦解。

18 世纪初的期刊，是新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正如 A. S. 科林斯¹ 所写，它们“具有非常强大的教育影响力，同时也以广泛的、全国性的舆论影响着政治”²。简·杰克³ 认为这些期刊带有它们“上流阶层的普及性”，是那个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⁴，

1 A. S. 科林斯(A. S. Collins. 1899—?), 英国学者、编辑。——译注

2 科林斯,《约翰逊时代的写作》(*Authorship in the Days of Johnson*), London 1927, p.240。——原注

3 简·杰克(Jane Jack, ?—?), 美国女学者。——译注

4 杰克,《期刊论说文家》(*The Periodical Essayists*), 载于《塘鹅英国文学指南·第四卷: 从德莱顿到约翰逊》(*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vol. 4: From Drydon to Johnson*), Harmondsworth 1957, p.217。——原注

莱斯利·史蒂芬将它们描述为“那个时期最为成功的创新”¹。《闲话报》和《旁观者》标志着过去以来的一个质的飞跃；理查德·P. 邦德²在研究报告中说：“一些早期的期刊已经相当重视有学识的作品，摘要和文摘的使用多过原创批评，有几篇文论已经开始具有纯文学的特征，但还没有杂志试图通过给予艺术作品更大的关注来提升品位；这样的作品多指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既严肃又亲切。《闲话报》是第一份这样做的英文期刊。”³当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批评。斯蒂尔自己的文学评论是有感而发的、印象式的，缺乏理论结构或指导原理；艾迪生有点分析性，但是他的批评一般就像他的思想一样，本质上是经验主义的、情感性的，囿于霍布斯和洛克的模式，关心的是文学作品的实用心理效应，而不太关注更多技术或理论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文学批评总体来说还不是一个自主的专门话语，尽管它存在着更多的技术形式；

18

1 史蒂芬，p.44。——原注

2 理查德·P. 邦德(Richard P. Bond)，应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英文教授里士满·P. 邦德(Richmond P. Bond, 1899—1979)之误。——译注

3 邦德，《〈闲话报〉：文学杂志的形成》(*The Tatler: The Making of a Literary Journal*)，Cambridge, Mass. 1971, pp.125-6。——原注

它其实是普通的伦理人文主义的一个部分，不可与道德上、文化上、宗教上的反思分开。《闲话报》和《旁观者》是资产阶级文化政治工程中的两个项目，这种文化政治的语言是宽容、温和、同质的，能够涵盖艺术、道德、宗教、哲学和日常生活；这里面不可能存在“文学批评的”回应，因为这种回应并非完全取决于整个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批评在此不是“文学的”，而是“文化的”：对文学文本的审查是一个相对边缘的时刻，它煞有介事广泛探讨的是对待仆人的态度、勇武规则、妇女现状、家庭感情、英语的纯洁性、恩爱的特点、感情心理和如厕之道。一个类似的[题材]范围(a parallel range)在同时代笛福所办的那份影响力极大的期刊《评论》(*Review*)¹上也可以见识到，这“是英国第一份知名的论说文期刊，讨论的主题涵盖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和道德”²。批评家作为文化战略家而非文学专家，是必须抵制职业化的。艾迪生在《旁

1 这是笛福 1704 年办的一份期刊，全名“法国事务评论”(A *Review of the Affairs of France*)，每周发行三次，直至 1713 年停刊，期间不曾休止。这份期刊支持哈利内阁，记录下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大小事件。——译注

2 邦德，p.128。——原注

观者》第 291 期上发表评论说：“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对学识的各个环节都不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还自称是‘批评家’，那真是荒谬至极……”文雅之士与迂腐学究打起了口水战：虽然艾迪生是科学实验和新哲学的爱好者，但他赞成这样的追求只是因为他认为它们适合绅士来做。作为文化评论家的批评家承认习语和习语之间、社会实践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之间没有不可侵犯的边界；批评家漫游其中，对每一个反对一般人文主义范式的东西进行测试，因为他就是那些规范的倡导者。灵活多样的杂志和期刊形式，反映了这样一种宽松：虚构和非虚构的材料均匀共存；道德文论极易与轶事和寓言混为一谈；写作过程中积极征求读者的合作。（鉴于题材有枯竭的危险，斯蒂尔一度提醒他的读者，除非他们为杂志供稿，否则他的杂志只能关门大吉。）各种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就像作者和读者之间或是真假记者之间的界限一样，都是不确定的，让人感觉比较自在。《闲话报》和《旁观者》自身就是复杂的改良品种，它们对之前的期刊形式进行回收再利用，这里借用一个策略，那里抛光或者抛弃一种风格，巧妙地将多个源头离散出来的元素重新结合在一起。一些 17 世纪的期

刊（它们毫无疑问是英国最早的“文学批评”）为忙碌的读者登载学术性书籍的文摘或摘要，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成为全面铺开的文学批评文章。早期出版物刊登的淫秽作品和打油诗，已被明智地抹去，这些期刊、杂志传播知识的努力在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手上变得更具倾向性，对时髦的上流社会（beau monde）进行了翔实的描画。像约翰·丹顿¹的《雅典娜信使》（*Athenian Mercury*）这样有影响力的一些期刊，原先为读者提供准科学的咨询解答，这种合作策略现在被调整，还刊登了真实或虚构的读者来信。17世纪的大众媒体对读者需求的精明反应，喂大了读者追求科学知识、道德慰藉和社会目标的胃口，这种精明被保留了下来，但是被升华成一个高级的习惯用语，甚至在培养期间就恭维读者的本领才干。作者与读者，事实与虚构，纪实和说教，谦和与持重：一种单一、严格标准化的语言被构造出来，用以表达所有这些东西，生产和消费之间、反思和报告之间、道德理论和社会实践之间的界限因而越来越

1 约翰·丹顿（John Dunton, 1659—1733），书商。他1691年创办的《雅典娜信使》是英国第一份重要的大众期刊。两年后他又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女性读者期刊《淑女信使》（*The Ladies' Mercury*）。——译注

越模糊。从这个混合了各种文学亚体裁、阶级风格和思想主题的“大熔炉”中出现的，是一个新的文化政治品牌，兼有分散广泛、即时可用以及社会封闭性等特点。

批评家作为漫游者（flâneur）或修补匠（bicolore），在不同的社会景观漫游或转悠，如同在家一般自在无拘束，纵然如此，他还是那个作评判的批评家，只是这样的判断不应该被误认为是一个超自然权威所作的严苛判决。斯蒂尔在《闲话报》第29期上发表评论说：“这是我经常得出的一个特别的观察结论：所有凡人中，当属批评者最为愚蠢；他使自己习惯于检查所有的东西，不论它们是不是结果性的，他从来都不会袖手旁观看热闹，经过时总是会附上一句字斟句酌的判言。也就是说，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同伴，他一直都是一个审查员……一个彻底的批评家在那个彬彬有礼的世界就有些类似于清教徒……”总之，批评这种行为本身，摆出了一个紧迫的意识形态问题：批评总不能陷入宗派主义吧？这种阴沉沉的宗派主义已经致使英国的社会秩序荒芜，它也部分占据了斯蒂尔的刊物，需要对其进行温和的改革。批评中不可避免的负相运动（negative movement）怎么能够庆祝在意识形态

21 上与自己非难的对象达成妥协呢？批评之事本身就带有冲突和纠纷的意味，会主动去破坏公共领域的合意原则（consensualism）；批评家本人站在这个领域大交换线路（great circuits of exchange）的要害之处，散布、收集和循环再利用它的话语，代表着该领域一种可能是难以驾驭的因素。斯蒂尔对这一困境做出的安抚反应是强调“同伴之谊”：批评家不是要谴责自己的同伴，而是要同他们交往，平等共论，他是代言人而不是祸害。作为该公共领域过气的象征性代表，作为仅有的维护该公共领域之自知之明的人，批评家必须从内部去责备并修正他以读者身份签订的原始社会公约，主张没有社会身份或主体地位（二者不会被那些亲密的社会关系自行促生）。

威廉·赫兹利特¹指出，期刊文学“之于道德礼仪，正如实验之于自然科学，都是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方法”²。《闲话报》和《旁观者》在讽刺调侃时的那种轻松、

1 威廉·赫兹利特 (William Hazlitt, 1778—1830)，英国论说文家。他清晰、直接、男子气概的风格极大地影响了一批论说文家。他在《莎剧人物》(1817)、《论英国喜剧作家》(1819)和《论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文学》(1820)中的评论研究因可读性和敏锐洞察力而分外知名。——译注

2 赫兹利特，《全集》(第六卷)(*Complete Works*, vol. 6)，P. P. 豪威(P. P. Howe)编，London 1931, p.91。——原注

和平、彬彬有礼的独特腔调，是这一解决方法的标志。霍恩达尔写道：“原则上，每个人都有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虽然个体环境可能会使每个人的能力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被要求去参加批评；批评不是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专业团体的特权。因此，批评家，即使是职业批评家，也只是来自一般读者其中的一个言说者，他表述的不过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想法。他面对公众的一项特殊任务就是进行一般性的讨论。”¹ 蒲柏对相同问题的阐述则更为简洁：“教导别人必须仿佛没有在教导，/ 别人未知的，要像他遗忘一般来提到。”（《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 ）那默许批评带有假设的优越性的东西，同那允许积攒权力和财产的东西完全相同，也即人人都有能力这样做，这是事实。如果这种能力涉及最文明的技能，它也就是业余的，本性难改：批评类同于一种英国传统概念上的文雅，让人费事区分先天和后天、艺术与自然、专业性和自发性。这种业余主义不是无知或半桶水，而是一个人随意的多形态的专门知识，他对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1 霍恩达尔，p.52。——原注

无所不知——他先是作者然后是读者，先是道德家然后是商人，先是托利党然后是辉格党，然后又绕回去了，把自己仅仅当作一个空着的空间，让这些不同的身份可以在里面聚集和杂交。作者和读者、批评家和公民、多元的文学模式和分散的查询领域，统统都被搅和拌进一种既礼貌又透明的语言，把这些东西拉扯在一起，展现出一种非专业性，它今天对我们而言也许只是部分可以理解，日期提前了是因为它所做的知识分工，而我们自己的业余性对于这种分工会不可避免地做出被动反应。不管怎么说，批评家作为工作人员、中间人、主席，他是接受而不是发明所有语言的核心；正如 T. H. 格林¹所言，《旁观者》是一种文学，“存在于对公众谈论它自身”²；批评家是一面镜子，镜中形成了这个着了迷的自成像。批评家是一般人文主义的调节器和分配器，公众品位的守护者和指导者，他必须作为记者和密探来完成这些任务，心怀最基本的责任，利

1 T. H. 格林(T. H. Green, 1836—1882)，英国哲学家、政治激进者和禁酒改革家，也是英国理想主义运动的一员。——译注

2 转引自伊恩·瓦特(Ian Watt)，《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Harmondsworth 1966，p.53。——原注

用这个仅有的机制或场合，而公众则可以通过它深入想象，与自身统一起来。《闲话报》和《旁观者》是在有意识地通过教育，将一个异质的社会公众培养成具有理性、品位和道德的普遍形态，但它们作出的判断不会是古怪的独裁、技术官僚阶层的绝对命令。相反，它们必须由衷接受这个自己寻求培育的公众舆论的塑造和约束。在我们看来，批评家不是一位知识分子：正像理查德·罗蒂所说的那样，18世纪“有的是聪明人、博学之士和虔诚的教徒，唯独没有品位高雅、学识精深的知识分子”¹。如果批评家都像沉默的“旁观者”先生一样，远离大都市的喧嚣那么一点点，这可不是在展示一种疏离姿态：因为唯有如此，才可能更加敏锐地观察，更加有效地向更专注的参与者报告他所了解的那个世界。有效的批评性论断不是精神脱离社会的结果，而是精力充沛地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成果。正是在同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社会文本进行亲密的经验性的接触中，现代批评才开始成形；从这场轰轰烈烈的经验

23

1 理查德·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sota 1982, p.67。——原注

主义一直延伸到 F. R. 利维斯¹，这条线保持着相对的连续性，沿着这条线，此类批评才会在某一个点上突变为“文学”。

这种“自发的”接触只有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之间发生特别亲密的互动时才有可能实现。18 世纪早期的咖啡屋不仅仅是个论坛，就像一位评论者所说的，在此“一种公共的阅读酿成了愤怒”²。它们还是做金融和保险的重要场地，证券经纪人在此建立起业务，南海公司泡沫（South Sea Bubble）³ 的崩溃在此达到高潮。在以这些充满矛盾的文化

1 F. R. 利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他生于剑桥，且一生都在此度过。1924 年，他完成题为“新闻与文学的关系”的博士论文，但直到 1936 年才成为剑桥大学唐宁学院的院士，次年被剑桥大学英文系聘为讲师，1962 年退休。在剑桥批评传统中，他既是中心人物，也是边缘人物。他一生都特立独行地不懈追求自己深信不疑的人文理想和批评标准。他坚守人文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并为之辩护，强调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跨学科特点及其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的责任，他所创立的《细察》(Scrutiny) 杂志就是一个明证。该杂志 1932 年创刊，至 1948 年停刊，利维斯苦心经营了十多年，将它办成了一份集文学、电影、音乐等文化形式于一体的批评杂志。——译注

2 帕特·罗杰斯(Pat Rogers)，《引言：作家与社会》(Introduction: The Writer and Society)，载于《18 世纪》(The Eighteenth Century)，帕特·罗杰斯编，London 1978，p.46。——原注

3 南海公司泡沫，发生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长期的经济繁荣使得当时英国私人资本不断集聚，社会储蓄不断膨胀，投资机会却相应不足，大量暂时闲置的资金迫切寻找出路，而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是一种特权。在这种情形下，一家名为“南海”的股份公司于 1711 年宣告成立。1720 年春天到秋天之间，脱离常轨的投资狂潮引发了股价的暴涨和暴跌，以及之后的大混乱。该年底，政府对南海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理，发现其实际资本已所剩无几，那些高价买进南海股票的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许多财主、富商损失惨重，有的竟一贫如洗。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民众对于新兴股份公司闻之色变，对股票交易也心存疑虑。历经一个世纪之后，英国股票市场才走出“南海公司泡沫”的阴影。——译注

和务实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俱乐部里，莱斯利·史蒂芬所谓的“政治家和作家那种典型的敦睦友善”日日流行。史蒂芬指出，这样的人会聚集在咖啡屋里，“心照不宣地结成联盟，交换意见，形成当时的整个公众舆论”¹。

“文化的”政治的惯用语不断相互渗透：艾迪生本人既是一位新闻记者，又是一名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斯蒂尔也在政府部门任职。文学和政治的种姓关系很可能比英国近代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亲近。为什么会这样，托马斯·麦考雷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理由。18世纪早期，在报道自由议会的风潮到来之前，议会的演讲效果仅局限于它的直接受众；要将思想传播到这个论坛之外，需要大量吸收这一时期的文学产品，以便进行激烈的政治辩论和强化宣传。麦考雷评论说：“人们很可能质疑，圣约翰²是不是像斯威夫特那样为托利党做了很多，考珀³是不是像

24

1 史蒂芬，p.23。——原注

2 亨利·圣约翰(Henry St John, 1678—1751)，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托利党领袖，第一代博林布鲁克子爵，曾任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译注

3 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 1731—1800)，18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他通过描绘日常生活和英国乡村场景，改变了18世纪自然诗的方向。在许多方面，他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先行者之一。——译注

艾迪生那样为辉格党做了很多。”¹ 如果《闲话报》和《旁观者》本身并不是政治性特别强，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工程就只有通过和政治权力的密切交流接触才能维持下去；如果它们不是政治性特别强，那么正如我先前所说，部分原因就是那个政治时刻所需要的正是“文化”。

麦考雷在一篇著名的评论中写道：“艾迪生让才智与德行达成了和解，它们曾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灾难性分离，在此期间，才智被肆意挥霍误导，美德被狂热引入歧途。”² 艾迪生和斯蒂尔这两个名字即意味着英国式妥协的本质：把优雅与庄重、文雅与道德、修正与巩固熟练融合起来，不可能勾引不到后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今这些人在精神上和生产他们的工业资本主义断绝了关系。在精神上重返前工业化时代的资产阶级——此时它的道德激情尚未被工业的庸俗之气沉重拖累，它以贵族的腔调说话但同时又拒绝其轻浮——这样一个奇葩的解决方法，人们怀疑，如果历史上没有先例，那它就很可能是被臆造出来的。勒

1 麦考雷，《艾迪生的生平及作品》(Life and Writings of Addison)，见《杂文集》(第二卷)(Miscellaneous Essays, vol.2)，London n.d., p.386。——原注

2 麦考雷，p.440。——原注

古伊和卡扎米安¹指出：“此时那种市侩气息还不存在，虽然日后英国中产阶级会因它受到指控，而且不无道理。”²在那些早期的期刊撰稿人眼里，英国的批评有能力瞥见自己的光辉起点，抓住资产阶级获得声望的那一脆弱时刻，因为之后这一声望会再度失去。雷蒙德·威廉斯³曾经说过，大多数文学评论家都是天生的骑士；但是他们大多数人既然也是中产阶级的产物，艾迪生和斯蒂尔的形象也就让他们可以在舒服熟悉的、无可挑剔的“道德”高地上放纵一下自己反资产阶级的敌意。如果艾迪生和斯蒂尔是资产阶级享有声望那一时刻的标志，那么他们也代表着，从那一

1 P. 勒古伊(P. Legouis)和 L. 卡扎米安(L. Cazamian)均为法国学者。——译注

2 勒古伊、卡扎米安，《英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London 1957，p.779。——原注

3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英国著名学者。他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二战”后至1961年，他任教于牛津大学的成人教育班，1974年起，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担任戏剧讲座教授，直至去世。他被誉为“‘二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众所周知，威廉斯的文化批评是从文学批评着手的，这一点，他深深得益于利维斯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和文学的道德批评的大量论述和实践，甚至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观都与利维斯及《细察》杂志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然而，威廉斯并没有跟在剑桥院士之后亦步亦趋，而是和其他出自剑桥的大家一样，对前人的批评传统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继承。其代表著作《文化与社会》(1958)围绕“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等关键词梳理了从浪漫主义到乔治·奥威尔的文学传统。——译注

刻起，原先不体面的新闻体裁变得合法了。沃尔特·格雷厄姆¹写道：“以前的期刊很遭罪，充斥着党派争吵、宗派主义猖獗、品位粗俗以及个人怨恨等弊病。多亏了艾迪生和斯蒂尔，‘文学’期刊才开始受人尊敬；有了文论写作，新闻工作渐渐不再是耻辱之事。”²宗派斗争如我们日后所见，注定是短暂的，从宗派斗争中暂时摆脱之时，就是期刊重生为文学之时：只有写作成功将污秽的政治蜕变成“风格”，以和解替代仇恨，它才有资格成为经典。正因为此，18世纪托利党的讽刺作家对后来的文学监管人来说，常常被证明有些尴尬，他们的行径可谓“极端”暴力：难道斯威夫特的散文和《愚人志》（*The Dunciad*）³作为文物没有遭到他们病态脾气的破坏吗？文学是政治的消失点，文学把政治消解并重构为高雅的文学。对18世纪作这样的判断，其讽刺意义无疑显而易见：高雅期刊的特色就是文化共识，将宗派论战转变为文化共识，正是它们政治上最为本质的功能。

1 沃尔特·格雷厄姆(Walter Graham)，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译注

2 格雷厄姆，《英国的文学期刊》（*English Literary Periodicals*），New York 1930，pp.83-4。——原注

3 蒲柏的讽刺长诗，完成于1742年。——译注

那么，在18世纪早期，资产阶级抽象的自由平等交换原则从市井之地被提升到话语领域，为的就是将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神秘化和理想化。拥有一种被称为“舆论”的商品的小业主们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有规则调控的内部交换，同时用更纯粹的非支配形式模拟资产阶级经济交换，促成那个维持它的政治机构产生。由此建构的公共领域立刻具有了普遍性和阶级性：原则上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这只是因为，界定由阶级决定的有效参与标准，虽然一直都有，但并不适宜。在这个领域通用的东西不是头衔也不是财产，而是理性——一种其实是那些拥有由财产生成的社会利益的人能够表达的理性。但是因为这种理性不属于霸权集团内某个单一的阶级——因为它是那些统治阶级之间激烈对话的产物，是一种话语，《闲话报》和《旁观者》对其而言是特别的名称——人们很可能认为这种话语很普遍，因此会去撬开这个绅士的定义，摆脱过于严格的基因或阶级专有的决定因素。拥有权力和财产会将你置入礼貌话语的某些形式，但那种话语绝不会仅仅是对促进物质利益有作用。相反，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你和你同等资产的对话者进入的交谈是“应酬”，即对话

27 语适当的形式和惯例进行有效利用，而话语的目标无非就是对品位和理性进行愉快的操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独立于物质利益之外，享有自主权；它与物质利益发生关联的地方是显而易见的，就体现在话语共同体这一形式本身，体现在自由、自主、平等的适合资产阶级主体的言语行为上。

18世纪早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或许最好不要被视为一个单一同质的形态,最好是被看作一个交错的话语中心。由《闲话报》和《旁观者》建立起来的合作的文学关系在别处,在塞缪尔·理查德森¹的文字中找到了共鸣,尽管它们的思想基调明显不同。我在其他地方讲述过,理查德森的文本在朋友和通信者当中无休止地传阅,随之而来的是争吵、申诉、修订、对释义的释义,这种流传方式渐渐构成一个完整的话语共同体,一种小型家庭式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内部,在所有那些小摩擦和诠释性交往的焦虑当中,渐渐结晶出一个牢牢凝聚的道德思想主体,形成一种集体感受力(collective sensibility)。²但是在这方面,考察一下蒲柏和其他人的订阅发行情况也很重

1 塞缪尔·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 英国小说家, 保守派作家, 作品有《克拉丽莎》、《帕米拉》等。他关注婚姻道德问题, 多以女仆或中产阶级女性为主人公, 善于描写人物情感和心里, 创设了此后英国家庭小说的一种模式。在文学史的意义上, 他的作品《帕米拉》开了英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先河。——译注

2 参见伊格尔顿, 《强暴克拉丽莎》(*The Rape of Clarissa*), Oxford 1982, 引言。——原注

要，订阅发行把读者转变为集体赞助人，将他们与文本另外的被动“核心”关系转化成了写作项目中一群慈善参与者的会员制形式。一位像理查德森这样的作家会积极构建自己的读者群：帕特·罗杰斯¹认为，蒲柏为争取订阅用户，致使他自己去定义，去争取，最终去创造自己的读者。²苏珊·斯德乌斯³已经指出：“蒲柏的订阅名单中可以见到新的上流阶层——领主、低调绅士(private gentlemen)、医生、律师、银行家、出版商、演员、淑女，这些人在名单里有时按字母顺序，有时按社会等级混在一起。所有订阅用户都是按姓氏的首字母先后排序，首字母相同的再按等级高低排序。”⁴这份名单里保存的等级差别，与公共领域的理念和理想完全相反，但是姓氏首字母相同的，还是保留在同层群体当中。斯德乌斯称，蒲柏因此“参与到那个混杂的新阶层的形成过程中，他们的名字显示在他印制的订阅名单中”；随着18世纪的时间推移，

1 帕特·罗杰斯(Pat Rogers)，当代学者，曾任教于英国威尔士班戈大学，现受聘于南佛罗里达大学。——译注

2 罗杰斯，《蒲柏与他的订阅者》(Pope and his Subscribers)，见《出版史·卷三》(*Publishing History* 3, 1978)，pp.7-36。——原注

3 苏珊·斯德乌斯(Susan Staves)，当代学者，现任教于美国布兰迪斯大学。——译注

4 斯德乌斯，《改良》(Refinement)(未发表的文章)。——原注

关键性的社会差别“并不在贵族与平民之间，而是在举止文雅的绅士淑女与粗鄙的俗人之间”。根据斯蒂芬的说法，蒲柏的征订技术意味着他是“接受了来自上层阶级的一种委托”去执行他的工作；传统的个体赞助被“集体赞助这种股份制机构”所取代。¹

临近 18 世纪，文学生产力的迅速扩张超出并颠覆了社会生产关系，当时，像早期这样的期刊、杂志已是遍地开花。到了 1730 年代，文学赞助逐渐衰弱，书商力量随之崛起；随着财富、人口和教育规模的扩大，印刷出版技术的发展，以及中产阶级对文学的渴望日渐增强，艾迪生时代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时尚之都伦敦的小众读者也日渐壮大，支持从事专门写作的作家群体。然后大约到了 18 世纪中期，写作这门职业已经被社会认可，文学赞助只是垂死挣扎；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速度明显加快，科学著作与文学作品广泛传播，1750 年代和 1760 年代，文学期刊真正是爆炸性增长。塞缪尔·约翰逊估计埃德蒙·卡夫²主编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31

1 斯蒂芬，p.51。——原注

2 埃德蒙·卡夫(Edmund Cave, 1691—1754)，英国印刷商、编辑和出版商。他创造了英文 magazine (杂志)一词。——译注

Magazine) 发行量在一万册左右;伊恩·瓦特¹认为这种杂化的、非传统的形式有助于培育贪婪的小说读者群。²丹尼尔·笛福在 1725 年指出:“写作……正在成为英国商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书商就是生产厂家或雇主。为数不多的作家、作者、抄写员、代写人以及所有其他与笔墨打交道的人员,都是受雇于这些所谓的生产厂家的工人。”³格拉布街⁴这个名字应当告诫我们不要对 18 世纪的文学产品进行任何过于衰颓论调的解读,虽然公共领域的黄金时代过后文学便灾难性地陷入商业的包围;格拉布街廉价的雇佣文人都是艾迪生和斯蒂尔的同代人,不是他们的继承者。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追踪资本在这个世纪展开的过程中对文学生产逐步增强的渗透作用;塞缪尔·约翰逊是这个时代主要的一

1 伊恩·瓦特(Ian Watt, 1917—1999), 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 斯坦福大学教授。——译注

2 瓦特, p.53。——原注

3 转引自瓦特, p.55。——原注

4 格拉布街(Grub Street), 位于伦敦西区墨菲尔德, 是为生计挣扎的独立作家、新闻记者和出版商的传统聚居地, 也是英国出版业的一个中心。格拉布街诞生于 17 世纪末, 在 18 世纪逐渐成为中产阶级获取消息、评论时事的主要渠道, 成为英国重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18 世纪英国政坛上活跃的辉格党与托利党的政治家都把格拉布街作为舆论宣传、阐发各自理论的阵地。——译注

位批评家，他的散文体风格与这种物质发展或许有着间接的关系。

威廉·赫兹利特把约翰逊的文风描述为“散文中一个押韵的物种”（“每一句都围绕着句子重心来构成自身，就像一个押韵的对句，每一段都自成一个诗节”）¹，这种文风可以看作一个商标或品牌名称，是在文学生产日益匿名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为了保留“个性”的一种固执而又特立独行的尝试。然而另一方面，这种风格又可以理解为是文学知识分子转向内心，摈弃事务紧迫的物质生活，在约翰逊那些阴郁的作品（oeuvre）中，这种物质生活是令人十分恼火的分心事，不是激发生命活力的忙碌喧嚣。约翰逊在创作上体现了那种极为自恋自负、声音洪亮的公共话语所特有的怪僻；它标志着语言的日益厚重，在这个过程中，按照赫兹利特的观点，是语言凭着自身权利变成了物质对象，从而表明某种社会错位，与早期的期刊撰稿人那种清晰透明的文风形成对照。约翰逊既可以被尊为圣人，又可以被称作“无产阶级化的”雇佣文人；他作品中这些不协调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是最引人注目

32

1 赫兹利特，p.102。——原注

的。人们可以发现，后者的社会异化以一种替代形式存在于前者纷乱的冥想中；而且不仅是以替代形式，因为约翰逊一个经常性的主题正是讲述商品统治下的文学生产模式中作者身份的危害性和挫折感。没有了物质保障，雇佣的批评家发表各种警世名言，以艳丽的个人风格对这种耻辱进行补偿和报复。在摒弃大众舆论的那一刻，约翰逊用说教式的、忧郁的、形而上的文论对整个社会进行批评（据鲍斯维尔¹所说，他“十分尊重大众舆论”）；莱斯利·史蒂芬指出，他是一个道德家，“确实盯着现实生活不放，但是他也会独自站在一旁惆怅数小时”²。圣人尚未被逼迫到彻底放弃社会现实的地步；但是约翰逊身上还是出现了一些不祥的症状，因为他个人社交能力的问题，他的文学认知越来越脱离他所使用的物质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如后来的批评家，不像艾迪生和斯蒂尔那样为社会所接受，原因是他“粗野的生命活力”和“顽固的现实主义”有点类似于沉闷的说教，那些喜

1 詹姆斯·鲍斯维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苏格兰作家，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他二十三岁成为约翰逊的忘年交，并立志把这位文坛巨擘生涯的点滴挖掘出来，出版了以翔实著称的《约翰逊传》。——译注

2 史蒂芬，p.93。——原注

欢骑士风度的批评者总是不惜一切代价与这种沉闷的说教保持距离。英国人喜欢有特点的人，但他们更喜欢有地位的老爷，具有迷人骑士风度的 G. S. 马尔¹ 曾评论说，约翰逊“更像头熊，而艾迪生更像是绅士”²；事实上，鲍斯维尔自己也说过，如果艾迪生更像是一个“伙伴”的话，那么他的朋友就更像是一位教师。人们可以在这种朝着道德教条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发现，早期的期刊撰稿人与读者建立起来的那种轻松友善正在弱化，变得令人困扰，而艾迪生的那种亲切的业余性也变了味，成了被利用的职业人士酸溜溜的牢骚。莱斯利·史蒂芬特别关注斯莫利特³ 主编的《批评》(*Critical Review*)，提到在 18 世纪的英国出现了职业批评家，一种“新式法庭或文学明星室”兴起了，在那里，咖啡屋文人学士的那种人际话语逐渐取得一席之地，职业评论家的一个苦差就是对所有新书进行解读评述。⁴ 一位为约翰逊撰写传记的现代作家将他描

1 G. S. 马尔(G. S. Marr)，英国学者。——译注

2 马尔，《18 世纪的期刊论说文家》(*The Periodical Essayis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 1923，p.131。——原注

3 托比亚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 1721—1771)，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史学家。——译注

4 史蒂芬，p.88。——原注

述成“超级棒的雇佣文人”¹，只为钱写作，挣钱才是硬道理，要不就是个傻瓜。《漫步者》(*The Rambler*)²的语调比以前的期刊要悲观很多，它损失了自发社交的某种影响力，不适合广泛流行，一期售出四百份左右——相当于T. S. 艾略特主编的《准绳》(*The Criterion*)³的发行量。另一方面，《漫步者》用于批评的版面比以往任何一本杂志都要多；约翰逊最显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向大众读者普及一种从前与迂腐和人身攻击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批评，他的《诗人传》(*Lives of the Poets*)十分畅销。能够形成这种大众趣味的部分原因在于约翰逊广为人知的“常识”：对于他来说，就像对艾迪生和斯蒂尔一样，文学批评行为虽然栖身于非常自主的审美领域，然而它又是与“一般意识形态”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同常见的经验和评判风格不可分离，与一个生活世界(*Lebenswelt*)紧密相连，这个生活世界的存在先于所有专业学科差异的出现，并且涵盖它们。此时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可分离的技术还不是时候，

1 约瑟夫·伍德·克拉奇(Joseph Wood Krutch),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London 1948, p.88。——原注

2 约翰逊于1750年创办的一份期刊，每周二和周六发行，至1752年停刊。——译注

3 文学杂志，于1922年10月创刊，至1939年1月停刊，形式为季刊(1927—1928年例外，为月刊)。——译注

尽管我们正和约翰逊一起走向文学知识分子与社会形态之间的裂隙，一种十分专业的批评最后一定会从这个裂隙中出现。从艾迪生的文化政治到“书面文字”的跋涉过程中，塞缪尔·约翰逊的哲学时刻——这个人仍在“业余地”表示自己有权评估所有的社会经验，但现在已被隔离被抽象，与那个忙于实证的艾迪生形成对照——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导致传统公共领域逐渐解体的诸多因素中，有两个与英语批评史有特殊的关联。首先是经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市场力量渐渐开始决定文学产品的命运，我们不再可能去假定“品位”或“教养”是文明对话与合理争辩的成果。文学评定如今正在从其他地方——从公共领域本身的前沿撤出，被置于市民社会的商品生产法则之中。公共领域的有限空间被明显是“私人的”商业和经济利益大举入侵，导致其自信的合意原则出现裂隙。从文学赞助到市场法则的突变，标志着从作者可能会把自己的作品真的认为是与精神上平等的人协作交流的产物这种情况转变到另一种情形：“公众”现在作为一股匿名的、毫不妥协的力量出现，与其说它是作家的艺术共主体(co-subject)，倒不如说是个客体。公共领域衰落的第二个原因是政治性的。像所有的思想意识形态一样，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要蓬勃发展就必须无视它自身的参数。它的空间可能是无限的，能够与整个“文雅”阶层合并；没有什么重大利益是它无法取得的，因为能够被算作是重大利益的标准在于它的垄断占有。国家——整个社会——实际上等同于统治阶级；只有那些掌握头衔、理性说话的人，因此只有有产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成员。正如约翰·巴雷尔所说的那样，绅士被认为是唯一的社会成员，他说的是一种可以被普遍理解的语言；他使用的语言很“普通”，既不是一种地方方言，也没有受到任何特定的艺术术语的感染。¹相比之下，普通民众的语言不能真正算作是“普通语言”：约翰逊在他的《词典》前言部分写道：“关于民众辛劳重商的那部分，用词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可变的……这种短暂、难以捉摸的下层黑话总是处于一种增长或消亡的态势，不能算作是一门语言的任何耐久性材料，因此同其他不值得保存的事物一样必然遭受覆灭。”正如巴雷尔所指出的那样，普通民众因此“并不属于那个真实的语言共同体”，所以他们也不真正构成那个政治共同体。从真正的意义上说，有产阶级的利益全都是

1 巴雷尔，《英国文学史 1730—1780：一次公平而宽泛的考察》（*English Literature in History 1730-80: An Equal, Wide Survey*），London 1983，p.34。——原注

政治上存在的那种；公共领域的界限根本不是什么界限，因为在它们之外，就像在宇宙空间的弧形之外，什么都不存在。

因此这样一个领域将无力承受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突然闯入，因为这些利益与其自身“普遍的”理性规范会发生明显冲突。这些利益在某种意义上是得不到承认的，因为它们超出了公共领域自身的决定性话语；但是它们也不能就这样被忽略，因为它们对那个空间的延续存在构成了真正的物质威胁。哈贝马斯认为英国的这一时刻要从宪章运动的崛起算起，就像他从1848年的二月革命确定了法国的这一时刻一样。但至少在英国，他说的时间肯定有点为时已晚。因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就是E. P. 汤普森¹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书中所记述的发生激烈阶级斗争的整个时代，英国正在出现的不啻为一个“反公共领域”。在通讯协会²、激进的新闻界、欧文主义³、科贝特⁴的《政治纪事》(*Political Register*)周报、潘恩的《人

36

1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作家、社会主义者、和平活动家。——译注

2 通讯协会(Corresponding Societies)是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激进组织,成立于1792年,致力于改革英国的政治制度。其主要成员多是工匠、商人和店主,在鼎盛时期,该协会共有大约三千名缴纳会费的成员。——译注

3 欧文主义,即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的空想社会主义。——译注

4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斗争。——译注

的权利》(*Rights of Man*)、女权主义和持反对意见的教会中，期刊、俱乐部、小册子、辩论和学院构成一个完整的对抗网络，入侵占主导地位的一致，威胁要从内部瓦解它。一位评论家在 1793 年沮丧地发现“最底层的民众也能读书识字，为适合最底层的民众阅读而编写的关于政治和所有其他主题的书，都在竭力引起这些民众的关注”。他补充说，新闻报纸“将参议院反对派的辩论公之于众，公共政策(即使局限于一个秘密会议)如今在乡村小屋、工厂车间和最底层的平民狂欢场所受到仔细审查。这种扩散直接导致了公众发生思想巨变，这些巨变必然产生公众创新”。¹

在这方面，不妨把 18 世纪早期的期刊语气和 19 世纪早期的杂志腔调作个对照，你会发现这种对照其实很有趣。有一位评论家将那种使后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报刊出名，但事实上几乎是使其不朽的东西，总结为它的“党派偏见，那种谩骂，那种教条主义，那种司法腔调，那副全知和斩钉截铁的模样”，它就是这个样子进行它的批评业务的。²《爱丁堡评论》

1 威斯希姆·诺克斯(Vicesimus Knox)语，转引自弗利，《品位与社会阶层》。——原注

2 马尔，p.226。——原注

(*Edinburgh Review*)¹ 和《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² 的谩骂和宗派毒性仍在历史记忆中弥留不去，与艾迪生和斯蒂尔那样的普世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些影响力十分广泛的杂志中，公共领域此时谈不上是一个达成温和共识的空间，而是激烈竞争的场所。从总体来看，在社会阶级斗争日益升级的压力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出现裂隙，被扭曲，被破坏，带有一种怒气，威胁要剥夺它的思想可信度。当然，一般性的社会阶级斗争并非直接反映在各种文学有机体之间两败俱伤的对抗当中；这些不合时宜的争吵更像是将那些更广泛的冲突折射成统治阶级的文化，它分化与否取决于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性镇压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不会出现起义的风险。辉格党杂志《爱丁堡评论》的编辑弗朗西斯·杰弗

1 历史上共出现过四种同名杂志：第一种，创刊于1755年，停刊于1756年；第二种，创刊于1773年，停刊于1776年；第三种，创刊于1802年，停刊于1929年；第四种，前身是1969年创刊的《新爱丁堡评论》，1984年更名，明确地去掉“新”字。此处指第三种。它是19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由弗朗西斯·杰弗里等人创办，季刊，主要刊载文学和政治评论。该杂志助推浪漫主义（却又大肆攻击浪漫主义文学，比如湖畔派诗人，尤其是威廉·华兹华斯），支持辉格党，呼吁政治改革。其主要竞争对手即是支持托利党的《评论季刊》。——译注

2 文学和政治期刊，由伦敦著名的约翰·默里出版社创刊于1809年，于1967年停刊。其创办之初的目的是对抗《爱丁堡评论》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该刊秉持坎宁派的自由-保守立场，反对重大政治变革。——译注

里¹“丝毫没有终止土地所有权的主导地位或实行民主的意愿。他只是害怕，如果政府机构不屈服于大众压力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政府机构这么做只是为了保存一个社会，如若不然，(他认为)这个社会就有完全被颠覆的危险”²。带有强烈党派偏见的《爱丁堡评论》不久就被激怒了，与托利党的《评论季刊》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³开始与过度政治化的竞争对手决裂，斥责《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⁴ 那些年少气盛的论战，不知不觉

1 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 1773—1850), 苏格兰法官, 文学评论家, 《爱丁堡评论》创办人之一。——译注

2 约翰·克莱夫(John Clive), 《苏格兰评论家: 1802—1815年间的〈爱丁堡评论〉》(*Scotch Reviewers: The Edinburgh Review 1802-1815*), London 1957, p.122。——原注

3 文学艺术杂志, 18世纪创刊, 迄今已历五个阶段。此处指它的第二个阶段(1820—1829)。该阶段的第一任主编是约翰·斯科特, 他按照《布莱克伍德杂志》的形式来编排这份杂志。正是在这一阶段, 该杂志迎来了文学繁盛期, 发表了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伟大诗人的作品。斯科特1821年去世后, 该杂志由第二任主编约翰·泰勒接手, 同时, 赫兹利特和兰姆等人也参与到编辑工作之中。由于泰勒坚持窜改诗人的作品, 这份杂志逐渐失去了它的影响力, 终于在第十个年头再次停刊, 第二阶段结束。——译注

4 即《布莱克伍德的愛丁堡杂志》(起初叫“爱丁堡月刊杂志”), 创刊于1817年, 于1980年停刊。这份杂志被视为辉格党所支持的《爱丁堡评论》的竞争对手, 而相较于托利党所支持的《评论季刊》的稳重调性, 它显得激进好斗。它的这种风格应主要归功于它的首席作者克里斯托弗·诺斯(本名约翰·威尔逊), 以及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后来去了《评论季刊》当编辑)和威廉·玛金(后来主要为《弗雷泽杂志》撰稿), 他们的文风辛辣讽刺, 大受欢迎, 使杂志迅速收获了大量读者。除此之外, 该杂志还发表过雪莱、柯勒律治、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爱伦·坡和康拉德(《黑暗之心》就首发于这份杂志)等人的作品。——译注

就卷入了一场争吵，随后导致主编约翰·斯科特¹在决斗中被杀。激进杂志《审查者》(*Examiner*)² 的编辑约翰·亨特³ 和利·亨特⁴ 因为涉嫌诽谤摄政王被监禁⁵；《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⁶ 成为侮辱人的小报，里面充斥着打油诗和不留情面的滑稽讽刺。罗杰·柯弗利爵士和安德鲁·福里珀特爵士不再是同一家俱乐部的酒友，他们成了死对头。使这些论战

38

1 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 1784—1821), 苏格兰记者、编辑和出版人，曾任《伦敦杂志》主编。洛克哈特曾用假名 Z 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毁谤斯科特的撰稿人(包括济慈、赫兹利特、利·亨特等人)，并讽刺后者为“伦敦佬诗派”。1820年5月，斯科特写了一系列文章回击，称洛克哈特为“骗子、流氓”。1821年2月，洛克哈特的代理人乔纳森·亨利·克里斯蒂发出挑衅言论，斯科特则做出决斗的回应。该月16日，双方在一个农场展开决斗，决斗进行了两轮(第一轮克里斯蒂没开枪，但由于双方助手之间存在争议，于是进行了第二轮)，最终斯科特被击中腹部，十一天后辞世。——译注

2 由利·亨特和约翰·亨特两兄弟于1808年创办的一份周报。头五十年里，它是一份鼓吹激进主义的卓越智识刊物，发表过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作品。但1865年后，它反复改变政治立场，导致读者流失，失去影响力，于1886年停刊。——译注

3 约翰·亨特(John Hunt, 1775—1848), 英国印刷商、出版人。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绝不妥协的激进者，他不止一次因出版被认为具有诽谤性和煽动性的书刊而遭监禁。——译注

4 利·亨特(Leigh Hunt, 1784—1859), 英国批评家、论说文家和诗人。1813年，因涉嫌诽谤摄政王，他和哥哥约翰被判两年监禁。服刑期间，拜伦、摩尔、兰姆等人曾来探视过他，他们的相识影响了他后来的职业生涯。——译注

5 参见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 《审查利·亨特的〈审查者〉》(*Leigh Hunt's 'Examiner' Examined*), London 1928。——原注

6 大众文学杂志，创刊于1830年，于1882年停刊。——译注

从早期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斗嘴争吵中凸显出来的，是它们的阶级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讲就是对公共领域本身受到威胁的种种反应，这种威胁来自公共领域以外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利益。

早几年，批评不过是一个泡芙，让书商的器皿勉强隐藏了起来，现如今，如果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滑入那个经济枷锁，它这么做只是要把那样一种沉迷换成政治性的罢了。批评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介入了政治：那些杂志往往只挑选出它们可以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篇目来进行评论，它们对文学品头论足，由于匿名而更具权威，可以有力地服务于它们的政治目的。批评仍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专家”的产品：为《爱丁堡评论》撰稿的大多数律师、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时不时就对文学性的主题发表评论。¹《评论季刊》则猛烈抨击济慈、赫兹利特、兰姆²、雪莱、夏洛蒂·勃朗特；

1 参见 R. G. 考克斯(R. G. Cox), 《评论与杂志》(The Reviews and Magazines), 载于《塘鹅英国文学指南·第六卷：从狄更斯到哈代》(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vol.6: From Dickens to Hardy), Harmondsworth 1958, pp.188-204。——原注

2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 英国散文家，早年受法国革命影响，结交了一批思想激进的朋友，一同著文办刊，与反动保守势力斗争，同时也受对方攻击。其代表作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和《伊利亚随笔》。——译注

《布莱克伍德杂志》对聚集在《伦敦杂志》周围的“伦敦佬派”(Cockney school)展开了恶毒的诽谤;《爱丁堡评论》的杰弗里自命为公众品位的守护者,他谴责湖畔派诗人,认为他们倒行逆施,无比荒谬,对传统社会地位和资产阶级道德的高度严肃性构成了威胁。利·亨特被这种争斗弄得沮丧不已,他怀念旧日时光,回顾世纪之初那些更为沉静的岁月,宣称自己希望以“尽可能不批判的一种旧时尚精神”去批评他人。利·亨特感叹道:“真相就是,批评本身多半是一件讨厌之事,一种无礼之举:性格善良、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人成不了批评家。如若不然,则更为糟糕。”¹在利·亨特看来,期刊论说文家是“一个自称与公众特别亲密的作家”;但是“期刊哲学时代”日益式微,遭到报刊广告和“商业精神”的驱逐。“我们之前的期刊政治家……通过写作来确立自己的见解,获得声望;而我们现在的期刊政治家只是为了钱……”²1831年的一期《旁观者》为传统公共领域进行了抗辩:“新闻报刊只不过是用来表达公众舆论的。试图搞一言堂的报纸只有死路一条。”³

39

1 《利·亨特的文学批评》(*Leigh Hunt's Literary Criticism*), L. H. 霍钦斯(L. H. Houtchens)、C. W. 霍钦斯(C. W. Houtchens)编, New York 1976, p.387。——原注

2 同上, p.88。——原注

3 同上。——原注

事实上，这种高屋建瓴的思想，在一个阶级冲突激烈的时代，早就被具有分裂性的公共舆论、商业化的文学生产和处理公众舆论的政治命令所取代了。即使是利·亨特，虽然他相信自己哲学真理的追求不带有任何私利性，也不得不艰难地承认写作不能做到完全直言不讳：“要发展公众舆论就得对它进行培养。”¹ 其言外之意就是，对这种尚未开化的读者进行培养，需要使用一定的外交辞令。理想中，批评家是一面镜子，但事实上，他是一盏灯：他正在成为一个最终站不住脚的角色，“表达着”他遮人耳目或明目张胆操纵的舆论。

那么，批评已然成为政治争执的场所，而不是形成文化共识的地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好好评估一下19世纪诞生的“圣人”(sage)。有人或许会说，圣人所代表的是将批评与文学从让利·亨特忧心忡忡的肮脏的政治内斗中拯救出来的一种尝试，是去构建它们，而不是作为知识的先验形式。唯心主义美学由柯勒律治和卡莱尔²引入英国，它在欧洲相伴着这个策略一步步发展。从柯勒律治后期的作品

1 《利·亨特的文学批评》，p.381。——原注

2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家，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共三卷)、《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译注

到卡莱尔、金斯利¹、罗斯金²、阿诺德³和其他许多人，文学摆脱了现实政治的舞台，提升到一个境界，用一位维多利亚时代评论家的话来说，“一切都可能相遇并且共同阐述”⁴。只有当文学甩掉一切政治手段，超越齷齪的历史智慧，成为一个共同的人类智慧之库时，它才能最有效地履行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即使圣人为历史所驱，被迫体验超验性的孤立，因预见到文化倒退而开始发表预言性的言论，却又没有合适的听众，但他仍然能把这种孤立化为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从历史的必然性中得出一种德性。如果他不再能够通过健全的公共

1 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英国教会牧师、大学教授、社会改良者、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1842年受牧师职，后参与发起基督教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同情宪章运动，主张对现实社会进行改良。所著长篇小说《酵母》和《阿尔顿·洛克》，描写雇农和手工业者的困苦处境。还著有历史小说《向西方》和儿童读物《水孩子》等书。——译注

2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1843年，他因《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一书而成名，书中他高度赞扬了J. M. W. 特纳的绘画作品。他一生著述颇多，共计三十九卷，使其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趣味的代言人。——译注

3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他曾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阿诺德主张诗要反映时代的要求，需要有追求道德和智力“解放”的精神。其代表作有《评论一集》、《评论二集》、《文化与无政府主义》等。——译注

4 H. G. 罗宾逊(H. G. Robinson)，《论教育工作中的英国古典文学的使用》(*On the use of English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the Work of Education*)，载于《麦克米伦教育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1860(11)。——原注

标准来验证自己的评判，他可以一直将这些评判随之而来的神秘性解释为神的启示。卡莱尔是圣人中最睿智的圣人，他虽然为《弗雷泽杂志》撰稿，但也认为它就是“一团乱糟糟的发酵的垃圾堆肥”¹，梦想着有一天他将自由“独立地”写作。他在写给未婚妻子的信中说：“我不会堕落成那种可怜虫，自称是一个作家，为不义之财在当今的期刊里涂鸦。”² 萨克雷在赞美卡莱尔拒绝批判言论必须服务于政治偏见的做法时说：“祈祷上帝，我们不久将开始为艺术而爱艺术。卡莱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努力赋予(艺术)独立性。”³ 圣人不再是他读者的平等共论者，他的意见被他们迅速达成一致看法的意识冲淡了；现在批评家的立场相对于他的读者来说是先验的，他的言论是教条的、自我验证的，他对待社会生活的姿态是消极的，令人心寒。批评撞到阶级斗争的岩石上，分裂成了杰

41 弗里和卡莱尔，他们一个是政治走狗，一个是似是而非的先

1 转引自约翰·格罗斯(John Gross),《文人的起伏》(*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 of Letters*), London 1969, p.16。——原注

2 转引自路易斯·杜德克(Louis Dudek),《文学与报刊:印刷、印制媒介及其与文学关系的历史》(*Literature and the Press: A History of Printing, Printed Media and Their Relation to Literature*), Toronto 1960, p.212。——原注

3 转引自格罗斯, p.28。——原注

知。看来，替代猖獗的“利益”唯一可行的是虚假的“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

然而，浪漫主义时期的“无私利性”不只是假的。在一个名叫赫兹利特的人笔下，“人心中这种天生的无私利性”成了激进政治的基础，是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学和社会实践的一种批判。浪漫主义者“感同身受的想象”，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无私利性，是一个强大然而偏离中心的人类主体的产物，它在理性交流的协议框架内不能被形式化。在浪漫主义时代，批判的深度和广度等同于一个被政治风暴肆虐的社会，在其传统意义上完全超越了批评的效力。批评的功能相应地转移到诗歌本身——诗歌，用阿诺德后来的话说，是一种“对生活的批评”，艺术是对既定社会现实做出可以想象的最为绝对且根深蒂固的反应。如果不让自身与社会秩序保持这种无可改变的距离，不让自己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发表言论，任何批判都逃脱不了合并的命运。但这个强大的赋能距离（enabling distance）也是浪漫主义的悲剧，因为想象力快乐地超越现实，只是为了用它心存愧疚的自我隔离方式来消耗自己和这个世界。从传统意义上说，批评不再可能是根据共有的公共规范来发表可验证的评判这么一回事，因为评判

行为现在被一个极为可疑的理性所污染，并且规范性的假设正是艺术的否定力量试图颠覆的东西。因此，批评要么必须成为艺术的敌人，就像杰弗里之于华兹华斯，为了自己把诗歌本身的一些创造力逼入死角，要么就必须转变为对创造性行为的本质和成果进行准哲学的冥思。浪漫主义批评家实际上是个诗人，他在本体论上证明自己的实践，阐述它的深层含义，反思自己艺术的理由及后果。一旦文学生产本身出了问题，批评就不再可能仅仅是一个行为，对一种自大现象作出判断；相反，它是一个积极的原则，对想象力这种不自在的做法，对艺术本身这种非常明显的自知之明，进行辩护、展开、深化。这种准哲学性的自我反思永远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如果真理不过就是诗歌，那么非诗意的话语怎么能期望抓住它言说的现实？它深陷理性的圈套，社会话语本身的那种理性——寻找真理，但永远不能等同于真理。批评家首先不再是法官、集体规范的管理者或理性的启蒙者；他也不是第一个文化策略者或政治催化剂，因为这些功能也在传递到艺术家那边。批评家根本不是介入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传递者，因为如果该作品达到了它的效果，那也是通过一个直观的、闪现在它自身和读者之间的即时性来达成的，这种效

果如若通过批评的话语来传递，只会消散殆尽。如果这部作品没有成功，那就是因为诗人是在黑暗中歌唱的一只夜莺，因此，还是没有位置留给一个中介体。如果必须积极构建这样的读者，那么根据华兹华斯 1815 年的《作为补充的论说文》(Supplementary Essay) 所写，诗人自己在这项任务中就必须担负最重要的责任，批评家实际上是这项任务的死敌。现在批评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如果艺术是其自身自我依据和自我验证的真理，如果社会话语无可救药地不合群，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倾听的读者，又怎么可能会有批评家产生呢？随着文学赞助和传统公共领域的衰落，人们放弃文学转向市场，再加上社会的匿名化和城市化，诗人或圣人失去了已知的读者，没有了一大堆熟悉的共同主题；同任何永久的特定读者断绝关系，是一种在商品生产支配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这种做法随后可能转换成那种对先验自主权的幻想，讲的不是地道的土语，而是通用语言，不带阶级口音，而是用人的口吻说话；它鄙夷地转身，离开一个确实是“群体性的”公众，它的演说对象只是它自己，不是人民，不是未来，不是某种潜在的大众政治运动，不是埋在每个胸怀中的诗仙，不是既定社会秩序内部固有的一大堆先验性主题。“理性”批评在这

里站不住脚，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的演变是对（政治）绝对主义的一种形式所做的回应，而且在超验的精神领域面对自我依据的绝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时，它发现自己同样不知所措。

19世纪即将产生一个把圣人和雇佣批评家很不自在地拴在一起的类别：“文人”（men of letters）。这是一个难以描述而又有意思的术语，比“创作者”（creative writer）一词更宽泛、更模糊，又不完全与学者、批评家或记者同义。T. W. 海克¹就认为这个术语在19世纪的英国最接近“知识分子”这个显著缺失的类别；“知识分子”的现代意义要到1870年代才开始通行。²文人像18世纪的期刊撰稿人一样，是思想智慧的一般载体和分配器，而非某种专业知识技能的讲解员，他没有被任何狭隘的技术兴趣模糊视野，能够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整个文化知识景观进行考察。这种综合威信在某一方面把文人和圣人联结在一起，但是，圣人的共景（synopticism）是先验性超脱的一种功能，文人的视野像他一样宽广，是因

1 T. W. 海克（T. W. Heyck, 1938—2014），美国学者，曾在西北大学任教四十多年。——译注

2 参见海克，《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智识生活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London 1982，p.13。——原注

为物质上的必要性迫使他成为一个零工(bricoleur)、半吊子、杂而不精的人，为了生计在一个非常商业化的文学圈摸爬滚打，卡莱尔就对那样的圈子不屑一顾，轻蔑地走了。文人所知甚广，因为他不能单靠一门知识专长来谋生。到了19世纪中期，公众阅读人数增长，期刊市场随之扩大，职业写作的机会也就略有增加；G. H. 刘易斯¹ 適切地认为写作能够成为一种职业得益于期刊的发行。从这种意义上讲，文人就是雇佣写手；但在意识形态上，他又是一个像圣人一样的权威人物，人们会发现，这种让人不自在的共存，在维多利亚时期，通常都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对于这个矛盾，托马斯·卡莱尔希望通过把文人提升至英雄来加以解决，可他的姿态在我们看来只能说是十分矫情。在《作为英雄的文人》(The Hero as Man of Letters) 一文中，卡莱尔提到印刷在传播议会之词(“文学也是我们的议会”)时的力量，提到新闻业已经取代了教会讲坛和参议院。² 印刷

1 G. H. 刘易斯(G. H. Lewes, 1817—1878)，英国哲学家、文艺批评家。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生活及精神伴侣。——译注

2 参见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及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London 1841。——原注

带来了(事实上,卡莱尔暗示,它其实造就了)民主,创造出一个文化人群体——“文人”,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他们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整篇文章都充满了怀旧情绪,竭力重塑传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赞美话语影响政治生活的力量,提升议会记者的地位,将其与先知、教会牧师和君王并置。然而也有焦虑与意义模糊的一面:卡莱尔用一种现实的态度问他自己:如果文人的影响力不可估量,那为什么他们会落得如此沮丧、不被承认的下场?卡莱尔的答案可以预料:“文学阶层”(Literary Class)是“无组织的”,社会性分散,混乱无序,还不如行会那样的企业社会团体。毫无疑问,这里面令人联想到柯勒律治晚年对居无定所、落魄失意、心怀不满的一班知识分子的恐惧,他认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卡莱尔大肆流露的情感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到底文人是社会的拯救者还是未受重视的雇佣写手?——这是人们熟悉的浪漫主义的矛盾:诗人是不被承认的立法者,是一个与声称是实际的描述不断相左的权力之梦。传统公共领域依然存在吗?抑或,它已经解体?

47

如果圣人的评判超然而独断,文人,附属于一个或多个维多利亚盛世期刊,仍力图将一个拥有开明的资产阶级话语

的公共领域焊接在一起。他就像艾迪生和斯蒂尔一样，是评论员、线人、媒介、译者、宣传员；像他 18 世纪的前辈一样，他必须巩固并且反映公众舆论。海克说：“吸收和理解的能力是比报道专门知识的能力更高的一种素养。”¹在一定程度上，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在这项任务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可以说已经以某种形式存活了下来，并进入到 19 世纪中叶。海克指出，倘若 1867 年之前选民数量很少而且基本上是由中产阶级组成，那么任何重要的小说、历史作品或社会争议，完全有可能到达“很大一部分执政精英”手中。他补充说：“文人通过他们的报纸、期刊和书籍，直接为所有在决策中说话算数的人捉笔代刀。”²此外，他们中许多人都与掌事者和统治阶级很熟，私人关系甚是密切。因为与读者享有共同的标准，他们出于本能就会写出那些受欢迎的、能被理解和接受的东西。莱斯利·史蒂芬认为，文人必须“成为整个文雅阶层都真正感兴趣的思想代表，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展鲜活的文学，而不是仅为成为一个犀利的批评家而

1 海克，p.42。——原注

2 同上，pp.36-37。——原注

写作”¹。在一篇关于“《爱丁堡评论》首批评论人”(The First Edinburgh Reviewers)的论说文中，他皱眉蹙额地提到杰弗里对《威廉·麦斯特》²粗暴、不屑一顾的评判，正是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批评家疏远其读者的共同情感，它有百害而无一益。“这样处理是在猥亵一部当代经典，肆意漠视普遍的舆论共识……人们希望现在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做法。”³

正如彼得·霍恩达尔所说，批评家的困境在于，究竟代表广大民众还是代表少数人作出他的判定；而答案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文人来说并不是简单直白的，如同史蒂芬对公众共识的信心似乎表明的那样。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氛围是意识形态极为混乱，令人没有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与读者对话时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他的任务是指导、巩固和安慰——为受到困扰、思想上迷失方向的读者群提供当代思想的普及性总结，从地质学的发现一直到释经学的“高级评经”(Higher Criticism)，这种普及性总结有可能会遏制思想困惑

1 史蒂芬，p.56。——原注

2 歌德的长篇小说。——译注

3 史蒂芬，《图书馆中的时光》(第二卷)(*Hours in a Library, vol.2*)，London 1892，p.257。——原注

带来的对社会的破坏性浪潮。正如海克所说，文人“被期待去帮助读者渡过经济、社会和宗教上发生变化的难关”¹；其作用是解释和找出这种变化的规律，并尽力去反思它，从而使它在意识形态上不那么可怕。文人必须积极地重新创造出一个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之前遭到破坏是因为出现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内部开始撕裂；迷茫无组织的、渴望得到信息和安慰的读者群在增长；“文雅的”见解不断被商业市场颠覆；知识分工的加速导致了显然是不可控的知识爆炸和碎片化。也就是说，文人跟读者的关系，必须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主体对主体的关系；对公众舆论神经紧张的反应，势必会体现在对读者姿态所采取的一种迂腐的、秘密宣传式的姿态中，在提供知识时对知识进行处理。

从这个意义上，文人是夹在了圣人的威权主义和18世纪期刊撰稿人的共识主义中间，非常矛盾，这种双重立场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杰弗里已经在《爱丁堡评论》上抱怨：“发现人们接受真理及合理因由的速度非常缓慢，即使是这个社会的阅读阶层，情况也是如此，确实令人恼火。”²对于这

1 海克，pp.37-38。——原注

2 转引自克莱夫，p.128。——原注

个问题，瓦尔特·白芝浩¹在1855年写的一篇关于“《爱丁堡评论》首批评论人”的论说文中也有过十分有趣的表述：

我们必须教导如此之多的人，这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大特色。在政治上，在宗教上，更不用说在所有不那么重要的话题上，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能力思考（实际上是在用某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思考）。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教会他们正确——思考。即使我们有一位思想深邃、极富远见的政治家，但如若我们不能够把对这些深思远见的信心给予众多有影响力的人，给予协助国家议事的那些非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人士、那些非选定的委员，那么，这位政治家深邃的思想和深远的眼光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用处。如今，宗教所激发的，不是学者做学术的兴趣或隐居学士咬文嚼字的热情，而是深沉

1 瓦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 1826—1877)，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和公法学家，也是杂志《经济学人》历史上最伟大的主编之一。他一生的著述都采取了评论的形式，文风简洁明晰而又机智风趣，时有警句。这些文章后来被编为五本文集，即《英国宪制》、《物理与政治》、《隆巴特街》、《文学研究》与《经济研究》。——译注

的情感、确切的感受，以及所有思考着、希冀着的人的艰苦奋斗。而这种对许多人的激励必然带来一个后果。我们必须给许多人讲，这样他们就会听——他们会喜欢听的——他们会明白的。用科学的形式、严密的准确性或详尽而沉闷的讨论来对他们演说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黎民百姓受够了体制，形式套路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他们渴望简洁。¹

白芝浩继续补充说，提供这种指导的就是“像评论一样的论说文和像论说文一样的评论”。在这段文字中，他所害怕和感到遗憾的事情，正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协助国家议事的那些非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人士”——的衰落，那是个一知半解和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时代，“非选定委员”已经扩展到可靠的开明人士之外，包括了一个尚未定形、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文化上很市侩的中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仍然和作者本人一样，都是“有影响

1 《国家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 1855年10月; 重载于《瓦尔特·白芝浩: 文学研究》(第一卷)(*Walter Bagehot: Literary Studies, vol.1*), R. H. 赫顿(R. H. Hutton)编, London 1902, pp.146-147。——原注

力的人”，至少是在以某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来进行正确的思考。但是，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术语来说，他们也是一大群有影响力的人，写不到几行字就已经退化成一众“黎民百姓”。即使他们随随便便就能思考正确，他们仍然必须学会正确思考：“现代人必须要知道思考些什么，”白芝浩在同一篇文章里评论说，“简言之，他必须要学，毋庸置疑。”必须一词背后体现的政治焦虑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启蒙这项事业上，中产阶级读者群体现在还算不上是批评家的平等合作者，他们现在不过是一个匿名的客体，其情感和意见都是由简化知识的技术塑造而成的。对技术话语“业余性的”回避现在还构不成（就跟艾迪生的情况一样）真知的本质，不过是扩散它的一个战略战术而已。大家依然认可传统公共领域这一理念，只是重建它的政治紧迫性使得批评家自己的语言变得固执教条，可能与这个理念本身产生了矛盾。究竟是传播被公认为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思想呢，还是仅仅激起对他们的普遍信心呢，目前尚不清楚哪个更势在必行；是给予中产阶级群众知识上的启示，还是仅仅让他们振作起来，要他们安心？白芝浩对待中产阶级“有影响力的人”，就好像他们是工人阶级：

肆无忌惮、愚笨无知、感情用事、头脑简单。传统的公共领域肯定是混乱的，因此才有了批评家的角色。那么文人必须是像圣人一样的权威人士，同时又是一个精明的宣传员；是高尚的知识精英，而非精明的知识推销员。约翰·莫雷¹是《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²的编辑，他说他的供稿人都被赋予了“形成公众舆论的重大任务”³，虽然他所说这个目标对于公共领域来讲比较传统，但是“重大”一词意味着完成该任务的前景很惨淡。如今，对公共舞台而言，批评家是既在其内、又在其外，他用心回应只是为了更有效地从某个优越的外部制高点来管理和塑造舆论。这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姿态，会颠倒《闲话报》和《旁观者》中明显的校正与协作的优先等级，在这两份期刊中，校正只能在协作的基础上才得以进行并被容忍。

在这方面，19世纪的阅读公众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时代，“上流社会”和其余

1 约翰·莫雷(John Morley, 1838—1923)，英国政治家，曾任记者、报刊编辑和国会议员，最高职务为印度事务大臣、枢密院议长。——译注

2 19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创刊于1865年。G. H. 刘易斯是第一任编辑，莫雷是第二任编辑，后者的任职期也是该杂志的鼎盛期。——译注

3 莫雷，《往事重拾》（第一卷）（*Recollections, vol.1*），London 1917, p.100。——原注

国民之间的界限划分严格，清晰可见。18世纪的英国人自然文化程度也多有不同；但是“读书”一词在一定意义上与文雅的思想观念密不可分，能读书的人与不能读书的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19世纪的文人必须容忍对这个相当精确的界限进行模糊和混淆。现在最成问题的不是不识字，那毕竟是一种绝对的、确定的条件；现在最成问题的是那些能够读书又不能够“读”的人——那些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能够阅读，但是在文化价值方面不能够阅读的人，他们威胁要消除“有影响力的人”和“黎民百姓”之间固有的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最具破坏性的事情就是“读书识字”，一种能超越盲目和有洞察力的边界的读书形式，整个国民都能够读书识字，但不是你所说的意义上的读书识字，因此既不是读书善断，也不是目不识丁；既不是坚定地属于一个类别，也不是稳稳当当地属于其他类别。正是在这个解构性的点上，在这个读书识字的难点（*aporia*）上，批评家发现自己面对的读者既是又不是与自己对等的人。他勉勉强强置身于知识精英和市场大军之间，代表那种要把这些领域缝合在一起的最好的历史企图；当商品生产的逻辑把这些努力化为明显的乌托邦时，他将适时地从历史的视野中消失。20世纪的文人比起他维多利亚时期的前任来说，是一个更加需要注意的“少数”分子。

到了 19 世纪中叶，正如白芝浩在那段文字中所述的那样，巩固资产阶级读者群体的动机越来越带有防御性。公共领域受到外来利益的包围和攻击，结果出现严重的困惑，内部出现分裂，迫使它将自己的活动置于意识形态之光下来加以审视。面对巨大的政治危险，提供社会信息或道德教育与阶级团结的意志不再可以毫无干系。知识和权力不再淡然分手，不相交往；启蒙思想的传播本身不再按艾迪生的方式可以构设一个快乐的结局，成为文雅谈话本质上的自我愉悦，而是内疚地与原则上应当超越的那些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如我们所见，对于 18 世纪而言，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理性都是真的；因为这个问题普遍存在；因为毕竟彬彬有礼地说话只有在其内部才行得通，因为此时比起维多利亚时期更不必担心男男女女不会“正确地”说话。他们所说的东西，他们形成的特定陈述，很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有礼貌的说话行为受到某些理性礼仪的支配，就其本身而言已经是一种正确行为了。一旦批评家开始担心如果听任他的对话者自行其是，他们可能偏离正道，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严重错误，他就绝对不能够相信如果任由自由的话语市场自行发展，它会派送恰当的道德商品和知识商品。大家再也无法和塞缪尔·约翰逊

一起去相信“对于那些公众长时间思考的事情，公众通常都能做到思考正确”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²的《论自由》(*On Liberty*, 1859)所体现的义无反顾的勇气，恰恰就是这种在最后关头表现出的信念，相信让舆论自由，如果没有受到“邪恶利益”的钳制，比起对任何话语市场进行集中整治这一做法，最终将产生一个更丰富、更持久的真理。不过，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对于密尔来说，“公共领域”的概念现在十分消极——是一个专制力量，它危及的是“公共领域”自身，讽刺意味十足。他在文章中提到“多数派的专制”，提到“公众舆论在国家事务中的支配权”，把它当作一种危险的、同质化的力量。“各种使人固守其上而无视群众意见的社会高地逐渐被夷平；讲求实际的政客在人们积极认识到公众也有意志时，渐渐打消了抵制公众意志的念头；不再有任何社会力量支持非主流派——社会上任何实质性的权力，本身都反

54

1 约翰逊，《艾迪生传》(*Life of Addison*)，载于《英国诗人传》(第二卷)(*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vol.2*)，G. 伯克贝克·希尔(G. Birkbeck Hill)编，Oxford 1945, p.132。——原注

2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又译约翰·穆勒，英国著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赋予了自由主义完整的理论形式和哲学基础。——译注

对数量优势，感兴趣的是将那些与公众舆论相左的意见和倾向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¹公共领域的这项原则反而对其本身十分不利：统治阶级开明的演说主体被迫将特许权下放至“黎民百姓”，与特许权一起延伸的还有公共领域的界限，这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自己领域内不受保护的少数派——这都是工人阶级拥有表决权之前的事。早期的边沁功利主义者都坚信公众舆论的力量，现在看来这是十分天真的。密尔在他那篇关于边沁的著名文章中写到，边沁已经指出“局部的、邪恶的利益（在欧洲）是多么唯一的统治力量，只有公众舆论才能对其实施这样的检查，在万物现有的秩序中，公众舆论永远被明显视作是善的来源，天生的局限性导致边沁夸大了公众舆论的内秀本质”²。因此，与这篇关于边沁的文章成为姊妹篇的，是那篇关于柯勒律治的研究论文，柯勒律治为启蒙知识精英所做的工作或许可以缓和那个如今十分暴虐的公共领域造成的最坏影响。然而《论自由》有效利用了对公共领域这一原则的信任来反对该领域日益令人沮丧的现实。在这

1 密尔，《论自由》，London 1901，pp.138-139。——原注

2 密尔，《边沁》（Bentham），载于《密尔论边沁和柯勒律治》（*Mill on Bentham and Coleridge*），F. R. 利维斯（F. R. Leavis）编，London 1950，p.89。——原注

种情况下去任由话语自由发挥，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但是密尔非常清楚这一错误，如果要完全保留这个资产阶级主体的深层话语结构——自由、平等、自主、互惠，意识形态上的动荡和政治上的脆弱也许是必须付出的代价。马修·阿诺德一如既往，不愿付出任何这样的代价：人道未开，天道先行，以个人自由的名义进行国家镇压，在他看来，这两者都是自由主义的口号，自由主义一边看着这个公共领域最后土崩瓦解，一边稳步走向专制独裁。阿诺德为了它的社会内容之故，准备牺牲传统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话语形式；而密尔则不太相信公共领域自发交易之外产生的真理，会具有同这种交换所体现的形式真理一样宝贵的价值。 55

如果文人的任务是用普遍人文主义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每一个门类新鲜的专业知识，那么越来越清楚的是，这样一项事业无法顶住英国社会中脑力劳动分工不断细化的压力。G. H. 刘易斯是《领袖》(*The Leader*)¹的编辑，在莫雷接手《双周评论》之前也曾是该杂志的编辑，他似乎比他的任何同行都要厉害，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一统到他自己身上，既是演员、

1 19世纪在伦敦出版的一份周报，创刊于1850年，停刊于1860年。——译注

戏剧评论家、业余科学家、记者、哲学家，还执笔热腾腾的滑稽闹剧；但这种折衷主义也是焦虑的来源，并不能令他感到满足。他曾经抱怨说：“真是没几个文人会思考！”¹ 威尔·拉迪斯洛² 身上各种吸引人的才华在 1832 年还是足够有活力的，但是到了《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出版那会儿，需要的可不是一点点的粗浅涉猎。文人身上这种普遍的“业余”人文主义精神，越来越不能够为英国维多利亚晚期那种冲突性话语的形成提供一个貌似合理的凝聚中心。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因为对伦理责任、个体自主以及自由先验的自我怀有信心，渐渐受到一些它试图处理并化解的智力发展的猛烈攻击。纽曼³ 做了最后一搏，去重建神学，试图恢复神学在中世纪作

1 转引自格罗斯，p.74。——原注

2 威尔·拉迪斯洛(Will Ladislaw)是 19 世纪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中的一个理想人物形象，女主人公多萝西娅第一任丈夫卡苏朋的表外甥，在卡苏朋去世后成为多萝西娅的第二任丈夫。——译注

3 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后改奉天主教。纽曼在 1824 年被授予英国国教会的圣职，四年后他成为牛津大学教会圣玛丽教区的牧师，任职至 1843 年，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十卷布道集。1833 年英国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兴起后，积极撰写文章与之配合，探索英国国教会的独立之道。后来纽曼越来越为罗马天主教会所吸引。1845 年他正式加入天主教会，后升任神父和红衣主教。发表《为自己一生辩护》一文，历述自己宗教信仰变化的经过，广受天主教人士赞誉。其著作还有《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与信徒谈信仰》等。——译注

为元语言 (metalanguage)、科学皇后 (queen of sciences) 和万意之意 (meaning of meanings) 的角色，但注定以失败告终。莱斯利·史蒂芬以怀旧的心情回顾了前一个世纪，那时的文学文化显然更具有同质性。他认为，这种同质性到了约翰逊的时代已经有了压力，即使那个时候英国社会“仍然足够小，俱乐部里只有一个代表机构，只有一个人(约翰逊)作为独裁者”¹。在后来的时代，卡莱尔和麦考雷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代表性的人物，但他们“只能是一个单一群体或部门的领导者，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已经变得较为复杂了，尽管还是没有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文学阶层如此众多和混乱”²。如果史蒂芬是以怀旧的心情去回顾的，他这样做也带有一定程度的谦虚。尽管他非常倾慕艾迪生，他还是忍不住认为艾迪生的道德、审美和心理在思想上很肤浅，正如马修·阿诺德切实指出的那样：“一个会讲这种话题的人现在必须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家，已经消化了所有的哲学书籍。”³ 总之，艾迪生不专业、够天真：他身上有着“圣洁的单纯”，不觉得自己已经“智穷

1 史蒂芬，p.115。——原注

2 同上。——原注

3 同上，p.43。——原注

才尽”。莱斯利·史蒂芬这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文人，为了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理由，也许会抵制专业化，但是专业化令他印象深刻，对他有足够的影响，使得他认为18世纪的批评是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或许发现它身上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戏仿：他自己也是越来越多余。这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文人身上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困扰着英国的批评制度，事实上，甚至今天也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要么是批评在公众舆论吧里努力调整自己，保存对文化的一种普遍人文主义责任，但是它的业余性，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将被证明是越来越不符合时宜；要么是它将自己转化为一门技术专长，从而确立其职业合法性，放弃更广泛的社会相关性。莱斯利·史蒂芬后期的作品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文人的最后一个孤独时刻，之后这一矛盾的全部力量都得到了释放。

那么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作为媒介或中间人的批评家，负责塑造、规范和接收一个共同话语，他在意识形态上很专横，随着各种知识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他还要对抗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和迅速壮大的教育程度不均的读者群体，这是一项越来越不可行的工程。正是那些导致这样一个角色存在的条件，最终否决了它存在的可能性。在其他意义

上，批评家作为媒介的传统角色，也被证明是多余的。例如，狄更斯就不需要在他自己和他的读者公众之间有个中间人；受欢迎的作家自己承担起批评家的某个功能，塑造并反映那种消费他们的感性。尽管批评家可能会和文学商品法则发生争执，但是他打败不了它们。用批评话语在期刊里对这些作家作“司法性的”评判虽然仍然合适，衡量的是特定的文学作品违反或符合一定审美意识形态规范的程度，但这种话语必须发生在距离市场很远的地方，因为市场上可不是批评话语在占上风，决定着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在维多利亚社会中，这两个机构——商业的和司法的——相交最有力的地带是在两个双胞胎式的人物身上，人们很可能把他们称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查尔斯·穆迪¹和W. H. 史密斯²。他们作为两大流通图书馆的主人，十分苛刻、喜欢说教，有效地垄

1 查尔斯·穆迪(Charles Mudie, 1818—1890)，英国出版商，穆迪借阅图书馆和订阅图书馆的创始人。他高效的配送系统和文本供应在当时彻底改变了图书流通的方式，既降低了人们阅读的代价，也拓宽了各种图书的销路。——译注

2 此处指的应该是小威廉·亨利·史密斯(William Henry Smith, 1825—1891)，英国最大零售书店(世界上第一家连锁书店)WH史密斯公司曾经的经营管理者。这家公司的前身由其祖父亨利·沃尔顿·史密斯与其祖母安娜·伊斯托于1792年在伦敦创立。他们去世后，公司由其最小的儿子老威廉·亨利·史密斯接管。1846年，小威廉·亨利·史密斯加入，公司更名为“W. H. 史密斯与儿子”(W. H. Smith & Son)。——译注

58 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生产，掌握着文章的生杀大权。他们两个都积极介入图书馆的图书选择，并把自己视为公共道德的保护者。¹ 面对经济和文化上如此大规模集中的权力，构建传统的公共领域连想都别想。

批评家变得越来越多余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批评的任务更关乎道德而非智识，是一件有关指导、振奋和安慰一个沮丧的中产阶级的事，那么还有什么比文学本身更能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呢？萨克雷说：“道德礼仪，我们认为，是小说家最好的主题；因此，我们喜欢读浪漫小说，因为它们不讲代数、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的抽象科学。”² 最善于搜寻、最为活络的社会批评家是作家本人；相比那些向瓦尔特·白芝浩寻求精神慰藉的人，阅读《亚当·彼得》(*Adam Bede*)³ 或者《悼念》(*In Memoriam*)⁴ 的人更多。一旦批评确

1 参见格内维尔·戈里斯特(Guinevere Griest),《穆迪的流通图书馆和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Mudie's Circulating Librar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Bloomington, Ind. 1970。——原注

2 转引自海克, p.38。——原注

3 乔治·艾略特的小说, 出版于1859年。——译注

4 英国诗人丁尼生怀念去世的剑桥挚友哈兰姆而创作的诗歌, 写了十七年, 完成于1849年, 包括一百三十一首短诗, 外加一篇序言和后记, 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挽歌之一。——译注

定了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提供意识形态上的保证，它就面临着说服自己不要工作的危险——因为这正是文学本身有意提供的东西。乔治·艾略特为《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¹撰写的，都是一个杰出女文人的那些东西；但她偶尔在这里交易的专业知识只有以虚构的形式丰满起来，才会真正奏效。作为一名女性文人，艾略特时不时为少数派的“进步”意见充当党派发言人；作为小说家，她可以超越这种偏见，将它们聚集到那个多面的总体，也即文学现实主义。正如白芝浩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中产阶级的群众只能受到形象的、简洁的、非系统性的形式的熏陶，还有什么比文学更好的启蒙介质？那么，它又把批评家置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59

一般来说，世纪中的批评派性跟早几十年相比没有那么凶猛了，但不论是在功利好斗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和思想自由激进的《双周评论》中，或是在保守的《季刊评论》中，它还是对批评必须给自己布置的共识任务构成了障碍。当焦

1 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派的一份季刊，由杰里米·边沁于1823年创办，停刊于1914年。该杂志第一期刊载了詹姆斯·密尔与其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多篇文章。直到1828年，詹姆斯·密尔都是该杂志的背后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乔治·艾略特曾任该杂志的助理编辑。——译注

急的中产阶级读者转向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又公开就最根本的问题相互掐架的时候，中产阶级读者怎么会在意识形态上被左右、被同质化呢？《双周评论》曾试图打破旧期刊猖獗的宗派主义，把自己作为“一个平台，用纯粹的理性来讨论所有问题，只接受不偏不倚的智论”¹。另一个试图做到“无私利性”的尝试是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²创刊时开始的，在这个刊物中，批评努力做到一劳永逸地脱离公共领域。编辑贝雷斯福德·霍普依照自己的喜好经营《星期六评论》，它是牛津高雅文化的一个机构，十分势利，蔑视像狄更斯这样的通俗作家。用研究这个刊物的史学家的话来说，它的撰稿人“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绝对正确的姿态，说话的口吻完全是在宣布神谕，而非是辩论性的”³。《星期六

1 莫雷，转引自瓦尔特·霍顿(Walter Houghton)，《期刊文学与表达阶层》(*Periodical Literature and the Articulate Classes*)，载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期刊出版：抽样调查》(*The Victorian Periodical Press: Samplings and Soundings*)，J. 夏托克(J. Shattock)、M. 沃尔夫(M. Wolff)编，Leicester 1982，p.13。——原注

2 由贝雷斯福德·霍普(Beresford Hope, 1820—1887)于1855年在伦敦创办的一份周报，停刊于1938年。后文将霍普的角色定位为编辑，似欠妥，这份周报的编务工作更多是由他人承担。——译注

3 M. M. 贝文顿(M. M. Bevington)，《1855—1868年的〈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1855-1868*)，New York 1941，p.47。——原注

评论》以一种典型的枯燥、吝啬的消极论调，对通俗趣味和大众文学市场大肆冷嘲热讽；它回到“18世纪的贵族对待文人的态度”，十分懊悔让职业作家阶层成长起来，而他们在公共事务领域却没有起到任何重要作用。这是“高级新闻”(higher journalism)一个最好的例子，克里斯托弗·肯特认为，它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文化权威介质，随时准备为大学刚刚觉醒的雄心抱负服务”¹。世纪之交的新闻报刊在当时声望很低，杰弗里在接受《爱丁堡评论》编辑一职时还曾经犹豫过。后来，正如肯特所评述的那样，“新闻报刊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手段，大学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国家发表意见。”²然而，他们跟国家所讲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傲慢无礼的责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某些期刊杂志拉入清高的、远离社会的学术界的轨道，标志着传统公共领域的解散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与其说“高级新闻”意味着这个领域的复兴，还不如说它被一个阴沉的反社会的批评部分吞并了。

1 克里斯托弗·肯特(Christopher Kent),《高级新闻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精英》(Higher Journalism and the Mid-Victorian Clerisy),载于《维多利亚时代研究》(Victorian Studies),1969年第13期,p.181。——原注

2 肯特,p.183。——原注

面对大众文学和职业作家,《星期六评论》体面地撤退到传统主义的文化,这是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危机所做出的一个激烈回应。然而,就像文人的角色一样,这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战略。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困境就是,两条通往它的途径——大致上说就是雇佣文人之路和圣人之路——都是死胡同(cul-de-sacs)。正如我们所见,文人正处于被知识专业化攻克的那个点上。还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就是,他试图培养的公众品位现在由市场说了算。对于这种惨淡的情形,圣人做出的部分反应是,把自己从这个社会舞台上转移到污染较少的高地,但是这样做又只是陷入到无能的理想主义。关于这点再也找不到有比阿诺德的作品中更生动的描述了。即使《星期六评论》足够自欺欺人,认为自己是无私利性的,对阿诺德来说,它还是不够无私,他认为它的语调过于独断,观点过于粗鄙,不适合作为一个真正不偏不倚的智力堡垒。¹阿诺德本人希望有一种批评公正客观,没有派性,可以超越所有特殊的社会阶级和利益,如其所是地看待事物。为了这个目标,批评家必须坚定地拒绝进入那个与思想领域完全不

1 参见阿诺德在《学术界的文学影响》(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Academies)一文中对《星期六评论》的评述。——原注

同的社会实践领域；它必须寻求最好在人类思想中建立起“无关实践、政治和这一切的一切”¹。期刊宗派主义论战中的批评政治化是心灵自由发挥的一大障碍，因此，批评必须退出，至少暂时退出一段时间，进入学术领域，远离外围那个不能做出精分细判的社会。在这个安静的有利位置上，它将平等审视一切利益，没有任何超越求真意志的倾向性。但是它的话语变得越是宽广普遍（“完美”、“轻松融洽”、“最深邃的思想和最精练的话语”），它就越会陷入彻底的虚无。批评或者文化，有能力对每一个社会经验领域发表演说，前提是它必须彻底清空自己（kenosis），失去所有明确的身份，这样，它在对各个社会经验领域发表演说时，那些领域才会心服口服，绝对无话可说。它的身份认同将是完全否定性的：不论是什么，都是任何特定社会利益的对立面。因此，它的作为一个（非）概念的优越性和抗毁性将直接与它的无能性成正比。文化是对所有打着总体性旗号所做的特别声明的否定，这个总体性因此纯粹就是空洞的，因为它不过是一个总体化的否定

1 阿诺德，《当前批评之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载于《马修·阿诺德：诗歌与散文》（*Matthew Arnold: Poetry and Prose*），约翰·布莱森（John Bryson）编，London 1954，pp.359-360。——原注

时刻。为了保存自己的有效性，批评必须让自己完完全全脱离自己介入的区域，在自己精纯的火光中燃烧殆尽，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的有效性。它的无私利性的纯度相当于一个密码的空白度，只有极端疏离社会生活，它才有希望与其富有成果地联系在一起。文化，就像上帝或是东方的 *neti neti*（非此非彼），既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它超越所有明确表达的利益，难以形容，没有扩展，只有在那些负有盛名的“试金石”凄厉的共鸣声中才可辨识，作为一个丰富的生命内在，最终完全逃避话语。

然而同时，文化或者批评，又根本不可能是这么回事。文化一旦面临无政府状态，就必须不仅仅是瞎扯谈，还应该化作一股奋发的社会力量，一个社会实践和教育改革的方案，一个变革项目，将东区与白厅¹焊接成一个统一体。批评对于阿诺德，跟它对于艾迪生和斯蒂尔是一样的，都指向阶级团结，建立一个开明平等的社会。正如本雅明所说的，批评

1 东区(East End)，即伦敦东区，临近码头，曾是拥挤的贫民区，居民大多是卖苦力的穷人和外来移民。白厅(Whitehall)，伦敦的一条街道，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这条街及其附近设有许多政府机关，因此白厅亦是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译注

家是“文学战场上的军事家”¹。阿诺德迫切希望通过公立学校这个机构为19世纪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贵族价值观的渗透进行彻底改造，18世纪早期的期刊也对此做出过努力。莱斯利·史蒂芬提到艾迪生时说他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化的真正先知”²，并把这个典故式的阿诺德术语回溯到较早的一个时期；尽管对于两位作家来说文化都涉及阶级团结，但阿诺德是在同有史以来利益都不可调和的各社会阶层打交道，这个事实迫使他的文化观念进入到《旁观者》非常陌生的超验主义领域。在资产阶级后期，这个重要差别就是，霸权社会集团内部的文化协作已经成为一种神经质式的防御：其主要目的是要收编一个不守规矩的无产阶级，这点阿诺德说得足够清楚：

一个国家的情感基调和精神庄严度要降低或钝化，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这本身不啻为一场严重的灾难。但是，中产阶级一如既往狭隘、苛刻、愚

1 瓦尔特·本雅明，《单向街及其他论说文》(*One-way Street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79, p.66。——原注

2 史蒂芬, p.44。——原注

63 蠢，在精神和文化上无聊又无趣，他们几乎肯定不能够成功塑造下层群众，或者同化他们。现在这个时候，这些下层群众的同情心实际上比中产阶级自己的还要广泛，也更加自由。如果我们把这些都考虑进去，这场灾难就更加严重。这些群众，他们来了，渴望占有这个世界，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红火。在这个背景下，他们的发展势不可当，他们天生的教育者和教导者就是那些直接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中产阶级。如果中产阶级不能赢得他们的同情，不能在方向上引导他们，社会就有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危险。¹

不同于艾迪生和斯蒂尔，对于阿诺德来说，此时资产阶级领域之外还不存在“组织化的利益”；巩固这个领域的动力与打破并整合它们的意愿是不可分的。文化必须是“无阶级的”，并且“文化人必须是宣扬平等的真正使徒”，因为现在有了无产阶级；批评的语言必须有欠明了，足够含混，方能涵盖它们。统治阶级的价值必须调整成隐喻，

1 阿诺德，《法国的大众教育》(The Popular Education of France)，载于《民主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R. H. 休珀(R. H. Super)编，Ann Arbor 1962，p.26。——原注

质地足够松散，方能掩盖他们的阶级根源，作用于东区的效果与西区相同。就是这个十分紧迫的政治形势迫使阿诺德进入他模糊的诗学主义，他的深度焦虑令他采取了明显的温和态度。平民百姓是一个异类，他们必须但却不能够被纳入文明的话语；因此，阿诺德要么必须把那个话语延伸，让其将所有的阶级用语清除出去，但是，一起清除的东西也包括所有的政治物质；要么讲一种更易识别的阶级语言，言辞尖锐、切实有力，代价是可能疏远平民百姓。显然在任何情况下，批评依然别无选择，它夹在声名狼藉的阶级利益相互勾结和对它们不成功的“超越”之间。诗性的阿诺德总是要么在拥挤的城市人群中无法呼吸，要么在山顶因为缺氧奋力挣扎，这并非是无因之果。¹他坚定地认为批评必须“斯文有礼”，而不是进行冗长的道德说教；但是这种斯文有礼与艾迪生和斯蒂尔所沉迷的都市喧嚣相去甚远。这种写作脱离了物质基础，阿诺德渴望重新设定它的温和音调，把文化带到东区，同时又把它藏在学院里。如果有可能，一个法国式的学院会在英国建立起一

1 参见 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上帝的消失》(*The Disappearance of God*), New York 1965, p.257。——原注

支“精心打造的舆论力量”¹，传统的公共领域有可能被改造成知识精英的形式，然后它无疑会将自已的影响力扩散到整个社会。然而，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是相抵触的：从柯勒律治起，知识精英在传统公共领域的废墟上兴起，作为对那个领域“水平”权力关系的“垂直”重组。阿诺德的学院不是公共领域，而是一种防御手段，针对的是实在的维多利亚时代公众。他向代表正当理由的国家呼吁对文化问题进行国家干预，这点反映出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向死亡，因为在经济萧条的19世纪最后几十年，国家开始深深介入商品交易领域。正如哈贝马斯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国家干预对传统公共领域是致命性的，传统公共领域繁荣的基础正是国家政权同公民社会的分离。随着现代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国家社会化，随着私人 and 公众之间的传统界限被逾越，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迅速萎缩。

那么，批评可以选择不受欢迎地去保存一项政治内容，因而在社会关联中取得它因偏好所失去的东西，但这种偏好

1 阿诺德，《学术界的文学影响》，p.252。——原注

破坏了它试图构建的那个公共领域。批评也可以选择去假设一个超越那个领域的先验性立场，从而维护其完整性，但代价是社会边缘化和知识的无效性。文人在这些选择之间表现出一种尴尬的犹豫。而实际发生在19世纪进程中的情况是：批评进入那些机构，阿诺德转向那些机构寻找期刊中所缺乏的和谐文化：大学。我曾在其他地方说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达成了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目的。除此之外，“英语”是一个研究项目，旨在安抚并改组无产阶级，在社会阶层之间产生同情性的团结，构建一个民族文化遗产，从而可能有助于在社会动荡时期巩固统治阶级的霸权。¹从这个意义上说，“英语”这门学科的出现，使圣人的事业得以实现，把文学作为一种先验的查询对象建立起来。但英语作为一门大学学科的成立也需要将文学研究专业化，而这项工作与圣人的“业余”观是格格不入的，而比文人更坚定的专家却能够担负得起。所以说，文人是一个空谈的学究，不属于大学，是“校外培训部”的学者，响应的是公众世界的需求。批评的学术化为批评提供了一个制

1 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引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Oxford 1983，第一章。——原注

度基础和职业架构；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标志着批评最终脱离公共领域被封存起来了。批评通过政治自杀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其学术制度化的那一刻，也是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力有效消亡的那一刻。在学术英语内部，“业余”与“职业”之间的冲突仍将持续，被置换成了“批评”与“学术著述”之间的争吵：大学的文学学术著述从维多利亚时代起就快速发展为一项技术专长，而大学的批评则保留了对“生活”和“文学”的执着关注。然而，这种分歧大部分都是内部争端，发生在一个机构内部，这个机构允许批评家的声音在社会其实听不到的层面上是“无私利性的”。

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见证了专业知识分子的杂志——《心智》(*Mind*)¹、《笔记和质询》(*Notes and Queries*)²、《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³——的创

1 一份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为心智协会(Mind Association)出版的同行评议学术季刊，创刊于1876年。该刊以前专注于分析哲学传统，现在则兼容并包，并不囿于某一哲学门类、风格或流派。——译注

2 一份于1849年在伦敦创办的学术期刊，其最初为周刊，后来变成了季刊，现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刊主要刊载英语语言与文学、词典学、历史学和文物古物学方面的短文。——译注

3 一份创办于188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行评议学术杂志，是英语世界最悠久的历史学术期刊。——译注

办，各种知识的日益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和区分化(compartmentalization)在这些杂志中都有直接的体现。文人传统的权威性被作为研究中心的大学削弱，事实上他们也被大众读者忽视了。正如海克评论的那样，现在管事的是智性而非“智性加道德”；文人因为其肤浅的折衷主义、派性和道德伪装，遭到 19 世纪后期学术圈的鄙视。¹ 莱斯利·史蒂芬曾经是《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² 的编辑，该杂志既发表亨利·詹姆斯³ 这类作家的“高雅”文学艺术，也刊载通俗的浪漫小说；随着该杂志的读者量逐步下跌，它的中产阶级趣味与史蒂芬自己的知识兴趣发生冲突，编辑一职被一位流行小说家取代，史蒂芬便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上。也就是说，他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解体的受害者，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夹在大学和市场之间，夹在文学学术化和商业化之

1 海克，p.228。——原注

2 一份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杂志，创刊于 1860 年，停刊于 1975 年。亨利·詹姆斯的《华盛顿广场》和《黛西·米勒》等作品最初即刊载在这份杂志上。——译注

3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1915 年加入英国国籍，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代表作有《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等。——译注

间，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彼得·霍恩达尔写道：“阅读公众瓦解成为广大群众和‘受过教育的阶层’，这一事实阻止批评家认同任何的普遍共识，不让他在那种情况下对自己的角色作出定义。”¹ 19世纪末(fin-de-siècle)，纯粹的“文学”评论杂志激增，它们一本正经，具有异国情调，在温室里生长，以自己的方式将文学同社会关注割裂开来，比如《萨伏伊》(*The Savoy*)²。20世纪即将看到这本“小杂志”取代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期刊读物，它如同艾略特的《准绳》一样，往往足够自觉地成为一个精英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现代，批评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一个传统角色；因为现代主义写作与《准绳》和《自我者》(*Egoist*)³ 这类型的评论杂志相关，其难度在于要求不辞辛劳地调解和解释，塑造读者的感性去接受这

1 霍恩达尔，p.55。——原注

2 一份于1896年1月在伦敦创办的文学、艺术与批评杂志，仅出过八期，于同年12月停刊。W. B. 叶芝、约瑟夫·康拉德等人在上面发表过作品。——译注

3 一份于1914年在伦敦创办的文学杂志，于1919年停刊。该杂志宣称“不承认任何禁忌”，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早期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比如当时广受争议的《尤利西斯》节选。除此之外，该杂志还发表过T. S. 艾略特的批评名作《传统与个人才能》，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如今，这份杂志被认为是“英国最为重要的现代主义刊物”。——译注

样的作品，而狄更斯或特罗洛普¹的写作则不需要。然而，这种调解不再针对广大的中产阶级读者，不再通过可能对大多数统治阶级有影响的期刊进行；它仍然是学术界内部的一场交易，并不是学术界和社会之间的交换。

1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英国作家，善于用写实手法揭露和讥讽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上层社会，代表作为《巴彻斯特养老院》和《巴彻斯特大教堂》。——译注

这个让批评最终搁浅的矛盾，这个介于不成熟的业余性和边缘化的专业性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刻写在了批评的内部。约翰·巴雷尔已经表明，这样一种矛盾早在18世纪就可以在人们对绅士的定义当中看出端倪。18世纪的绅士不是一份确定的职业，也正是这种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出世态度，才使得他能够平和地审视整个社会景观。绅士是综合观点的托管人，代表着一种多面的人性，任何的专业知识只能使这种多面的人性枯竭。但是这种对社会特殊性的超越也是一种局限——因为绅士怎么能够对其撇清关系的特殊性作权威性的发言呢？巴雷尔论道：“如果绅士被描述成一个没有确定职业的人，他对社会事务任何程度的参与就必定会连累到他……但是如果他什么都不做，他也就什么都不能得知。”¹到18世纪中叶，随着劳动力分工逐渐深化，人们在工作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看法，那就是认为社会对综合考察不再是开放

1 巴雷尔，p.38。——原注

70 的；巴雷尔认为约翰逊的期刊论说文体现了对这样一种认知的广泛回应，即“社会和社会知识现在如此复杂，任何个体的人都不可能从总体上去把握它……约翰逊的期刊——《闲人》(*The Idler*)¹和《漫步者》——名称都带有几分修辞性的反讽。利用这种反讽修辞，约翰逊既能承认、又可以应对一个一般性观点的丧失”²。约翰逊在《漫步者》第19期中写道：“似乎有的人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有的就适合什么都不要做；有的适宜翱翔于天，视野开阔；有的就只能匍匐在地，局限于狭窄的一隅。”人们几乎无法想象这位批评家的种种不幸是怎样巧妙构设出来的。正如伊丽莎白·布鲁斯³所指出的那样，约翰逊闷闷不乐地意识到他自己这种“业余性”说教在一个越来越专业的社会里是相对无效的。她写道：“因为他的判断依然可以诉诸一般性的原则和共同的公共标准。关于约翰逊的权威性没有什么含蓄或神秘的东西，不需要什么深奥的学

1 实际上，这是一个包含了一百零三篇论说文的系列，除约翰逊的十二篇外，皆于1758年至1760年在伦敦的周刊《环球纪事》(*Universal Chronicle*)上刊载。而《环球纪事》可能是专为此系列创办的刊物，因为在该系列开始刊载之前，这份刊物仅出过一期，而随着刊载的结束，该刊物也停刊了。后来，该系列以书籍形式出版。——译注

2 巴雷尔，pp.40-41。——原注

3 伊丽莎白·布鲁斯(Elizabeth Bruss, 1944—1981)，美国学者。——译注

科知识或是特殊专长来证明他的好恶是有道理的。事实上，约翰逊的批评有一种强烈的公民感，有一种越来越平衡的表达模式，这种模式表明目前写作者（无论写诗还是写评论）和阅读者之间公认的区别非常之少。但他对任何类型的专业化都直言相抗，他那种想将道德、心理学、科学和美学的标准联系起来而偶尔所做的努力，表明这种平衡极其不稳定，已经受到了威胁。”¹

这种平衡在 20 世纪也依然是不稳定的，《细察》运动将确认这一点。E. R. 利维斯在他的文章《约翰逊和奥古斯丁主义》(Johnson and Augustanism)² 中赞同地引用了约瑟夫·克鲁奇³ 对 18 世纪会话艺术的评论，评论基础是“一个假设：只要主题是完全可以讨论的，那就最好用一般称为‘常识’（没有更好的定义）的东西来讨论；任何一个聪明的、受过良好教

71

1 布鲁斯，《漂亮的理论：当代批评中的话语奇观》(Beautiful Theories: The Spectacle of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Baltimore and London 1982, pp.30-31。——原注

2 奥古斯丁主义，指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学说，涵盖宇宙论、恩宠论、圣事论、教会论、历史论等神学和哲学领域。——译注

3 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 1893—1970)，美国作家、批评家、自然学家。——译注

育的绅士，不管他有什么特殊才能，在解决哲学问题、神学问题甚至是科学问题时，都跟其他任何人一样能干”。克鲁奇把“常识”定义为“对当前的某些假设、传统和价值标准的接受，它们还从未遭到过质疑，因为质疑很可能会需要对政府、社会和个人行为作出更彻底的修正，还没有人愿意去思考这些东西”。¹ 利维斯赞同这个定义，但他指出，“较之于‘常识’告诉我们的，这个定义所指出的东西更为确定”；他承认约翰逊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但强调约翰逊关注的仍然是“高于普通人级别的”标准。利维斯虽然同意克鲁奇的看法，认为约翰逊“并不认为自己的批评应该在本质上不同于对生活的一般性批评，那是他一开始就作为正事来干的事情”，不过，利维斯感觉有必要对这个说法进行限定：约翰逊（和克鲁奇）都正确地看到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文学价值”，但是“对于批评者而言存在着一个相关性的问题……并且这种相关的能力，就文学艺术作品而言，不只是判断力好坏的问题，它意味着对语言资源、传统习俗的本质以及组织的可能性的理解，这种理解只能从密集的有分析习惯相伴的文学

1 利维斯，《约翰逊与奥古斯丁主义》，载于《共同追求》（*The Common Pursuit*），Harmondsworth 1962，p.103。——原注

经验当中获得。”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克鲁奇自己也“够不上是一个批评家”。¹

这一矛盾自始至终都存在于利维斯的这篇文章当中,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利维斯反对技术官僚和学院主义的批评形式,他必须坚持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没有什么基本断点——批评这种行为与一般性的道德判断和文化判断是无法分开的——即使到了可能会赞同、崇拜温文尔雅的业余性这一步,利维斯也一定不会那样做。如果文学批评家仅仅是一个敏感而又聪明的判官,那他的“职业”主张又是怎样的呢?批评不能仅仅是“判断力好坏”的问题,它必须利用分析模式和“普通读者”得不到的各种形式的专业经验。如果它植根于一个普通的社会世界,它也就不可避免地远离了这个社会世界——就像对于利维斯而言,约翰逊自己既是一个异常丰富的文化传统的载体,舒舒服服地待在它规范的形式和惯例中,但是他“稳健、活泼的个性”里也有比一个德莱顿或一个康格里夫²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业余性”

72

1 利维斯, p.114。——原注

2 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 英国剧作家, 作品以活泼生动、对话高雅为特色, 其风俗喜剧《以爱还爱》曾轰动伦敦。——译注

和“专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利维斯思想内部的社会性与个体性之间同样紧张的关系融合了。他在“奥古斯丁主义”中所崇拜的恰恰是一个有营养的公共领域，而一直以来他自己却被剥夺了这样一个领域。“这个(奥古斯丁式的)文学知识分子能感觉到自己在与经验搏斗时得到了社会的支持，他不仅把社会作为理想的传统，还把它作为自己持续关注的对象；他能感觉到它，无须去意识到它。”¹ 约翰逊因此在他自己的社会占有了一席之地，不难看出利维斯也渴望自己能够如此：“(他)像那个浪漫主义诗人一样，不是社会的敌人，而是有意识地成为它的代表，成为它的声音，这么做是因为他有实力——某种与他的伟大密不可分的东西。”² 利维斯提醒我们，18世纪的文学形式“与礼貌行为(Good Form)密切相关”——但是他刚开始实施这个正面观点就遭到了其负面推论的打击：“这么表述它就是要记起高雅文学(Polite Letters)那些极其糟糕的可能性——这个别有意味的词语勾起的肤浅和自满。”³ 利维斯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他坚持文学的社会

1 利维斯，p.110。——原注

2 同上，pp.104-105。——原注

3 同上，p.103。——原注

性，认为它不会有利于轻浮的非专业性，后者只是觉察到约翰逊的饭后谈天与他的文学评判之间有个温和的连续区，如此一来，利维斯如何去反对那些研究文学的学者呢？他对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态度明显是矛盾的，既欣赏他们的交际能力，又本能地厌恶他们那个阶级惯有的那种腔调：“我们在读《闲话报》和《旁观者》时所看到的正面的、集中的、自信的文明，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没有必要去作深入的分析，从那些乏味的书页中揪出一个文化的弱点，正如安妮皇后的奥古斯丁主义(Queen Anne Augustanism)所做的那样，这个文化把作为绅士的绅士(the Gentleman qua Gentleman)当作了它的标准。”¹ 利维斯在另一篇文章中持有类似的矛盾态度：“当艾迪生说‘哲学家，也就是我所说的绅士’，他真是这么认为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位绅士，别的活动如果不能体现这一成果就不值得追求(因此有了对‘大师’[virtuoso]和任何种类的专家的不屑一顾)。这种测试，这个标准，这种意义，一直都存在于这个显露的社会世界——这个常识世界，存在于礼貌的非专业化交往层面。”² 在这句话的结尾处，最初那

1 利维斯，pp.103-104。——原注

2 利维斯，《18世纪的英国诗歌》(English Poet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细察》(第五期)，1936年6月1日，p.22。——原注

种对崇拜温文尔雅的负面反应，已经转变成对植根于社会的批评的一种更加积极的认可。18世纪的文化在利维斯身上激起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倒退与进步之间发生冲突，他既怀念那个可以看作同质的前工业社会，又十分做作地反对崇拜那样一个社会所牵扯的温文尔雅。约翰逊的道德个人主义是一种必要的补救方式，可以挽救那些“力量越来越弱的常规习俗，比如禁止培养个人情感，杜绝一切诉诸具体事物的活动”¹。在塞缪尔·约翰逊这样一个人物身上，《细察》的意识形态当中所有自相矛盾的对立——普通读者和职业批评家、公共领域和专家精英、文明交往和防御性隔离、文化传统和独立见解——都可以方便地得到解决。

这些对立反映出《细察》杂志的矛盾本质。因为如果它一方面注重维持一个“业余性的”自由人文主义，需要一个权威头衔来评判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它在另一方面就会加入到一个两败俱伤的斗争中，将一个名声不好的业余文学学术团体“专业化”，把批评确立为一种严格的分析话语，令其超越普通读者以及公共休息室中的机智妙语。它仿照 18

1 《约翰逊与奥古斯丁主义》，p.111。——原注

世纪公共领域的规矩，拒绝任何深奥的美学语言，认定文学与批评同道德文化经验堆叠在一起；但定义和识别文化价值观的过程此时已是一个“质地”密实的事件，是一个专业化的训练有素的智力运作，这个智力以其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艰辛劳作取得的见解，更有点像工匠而不是贵族的味道。批评不仅仅是“文学性的”：它按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方式将自己的霸权扩展到了政治、哲学、社会思想以及日常生活。然而对艾迪生和斯蒂尔来说，文学是除了这些以外的又一个区域板块，现在它成了《细察》最重要的试金石，其他板块都将交由它来评判，正是这样，一个宽厚的“文化”批评观可以与一个质地严密的“文化”批评观不协调地结合起来。《细察》的批评方法“专业性”过硬，它代表着广义道德人本主义在面对一个如今几乎不可恢复地超出了这种命令覆盖范围的社会时所做的最后一次反抗。其批评技巧中审慎的经验主义（“实用批评”）让其看似十分熟练，具有专业水准，实则经常被其劣质的不精确的形而上学（劳伦斯¹式的活力主义 [Lawrentian vitalism]）所削弱。

75

1 此处所指应是英国小说家 D. H. 劳伦斯 (D. H. Lawrence, 1885—1930)。——译注

《细察》所代表的不过是一种尝试，试图重塑传统的公共领域，而当时传统公共领域的物质条件确实都已经消逝了。丹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对《爱丁堡评论》那段时期进行了一个回顾，并认为，如果要缓解“我们目前的困境”，就必须重新创造出那样一个“公众团体，它聪明，受过教育，道德上负责任，政治开明”。¹R. G. 考克斯(R. G. Cox)赞同那些共享的文化范式，称赞阅读那些“伟大评论”的相对同质的公众，他们在他们中间发现了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会把他们作为艾迪生和约翰逊的合法继承者标记出来。考克斯宣称，这样的评论“在为他们同时代的作家创造出一个知情的、智慧的、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这样一个团体，任何文学都不可能长久，而这样一个团体在今天却是如此明显地缺乏”。²《细察》的批评理想是文明的、协同的探索类型：“共同追求正确的判断”，把利维斯典型的批评观点当作示范。然而，《细察》的历史现状刚好与此相反：它不是公共领域，而是旷野的先知；批评家不是文明的合作者，而

1 丹尼斯·汤普森，《一份周刊的前景》(Prospects for a Weekly)，《细察》(第二期)，1933年12月3日，p.250。——原注

2 R. G. 考克斯，《伟大的评论》(The Great Reviews)，《细察》(第六期)，1937年9月2日，p.175。——原注

是不与人交往的圣人。总之，这份杂志是我们考察过的启蒙运动和各种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混合物，因为真正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已经瓦解，迫使该领域的辩护者开始信奉精英主义，而精英主义又因为威胁要摧毁整个意识形态模式而遭到围困。合作、合理的查询、审慎的支持和反对，都可以保存在《细察》本身这个圈子的内部，作为一个脆弱的记忆或某个更广泛的共识的轮廓；这个团体对整个社会的立场则相反，教条、独断、充满戒备心。如果利维斯把自己的一部作品命名为“共同追求” (*The Common Pursuit*)，他也就为它刻写了一组几乎自始至终都是否定的、断绝关系的、论战式的题词；如果他想重塑爱交际的 18 世纪，他也就赞同了亨利·詹姆斯致力于“绝对独立的、个体的、孤独的美德，以及……其宁静而又孤僻的(或者，如果必要，略微阴沉、忧郁的)实践”。在莱斯利·史蒂芬的剑桥传统中，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论证，而非牛津风格那样神秘不可言喻；但在开明的话语中，这种信任一旦遭遇理性的反对，就会经常陷入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或者维多利亚时代的圣人的那种无可置疑主义 (*apodicticism*)。利维斯典型的批评构想形式，是将对话的开放性与满怀信心期待回答“是”的某种权威性的坚持融合在一起，这甚是巧妙。

政治社会充满了阶级矛盾，文化由商品主导，经济已经超越一度使公共领域成为其集权垄断之舞台的自由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试图重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显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幻想。可是在《细察》中，这个幻想还与另一个混合在了一起：因为《细察》运动力争从那些早已把批评从该领域切断了了的机构内部重建公共领域：大学。批评打算冒险从学院进一步扩展到广告和流行文化这些艳俗之地，但是因为它赋予这种现象的各种价值在本质上是“文学性的”，是学术界自身形成的，所以它总是会不可阻挡地回到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在幻想中，它压根儿就从来没有外出冒险过。《细察》也许会挑战文学经典，但不会挑战“文学性”的构成方式，或是作为“活力中心”的大学。它没有成功挑战那些学术机构是缘于另一个神话：它对理想大学的坚定信仰，坚信剑桥的精神实质与那个忙于抨击和抑制其工作的剑桥截然不同。《细察》渴望一个复兴的公共领域，在双重神秘化的过程中，它这种理想主义的基础是一个理想化的大学，也即那个萌芽中的公共领域。“英语文学”在学术上已经制度化了，替换了参与社会事务的批评，而不是作为一个批评发射基地，因为在《细察》这个案例中，它是一个致命的盲点。一言以

蔽之(in nuce), 一个看似公共领域的地方, 实际上就是一块防御飞地, 用以对抗文学真品的消失。《细察》可以期待批评家、教育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之间有一种新的公开的对话, 而且确实相当成功地确保了这种对话。但这样一种话语性的公共领域, 不像 18 世纪英国的咖啡屋社会, 绝不会建立在整个社会的政治架构中。利维斯和他的同事们与学术权力的杠杆离得足够远, 更不用说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距离了; 利维斯本人对这一困境有足够的意识, 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写下: “一个被绝缘的少数派持有的意识, 对统治世界的权力没有一点影响, 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功能。”¹

78

被困在一个带有敌意的学术界和一个公共领域梦想之间, 《细察》成为了弗兰西斯·马尔赫恩²所谓的“元政治: 它的作用是以‘人’的名义监督政治领域, 不以自身的权利进入该领域”。就是说, 它尝试成功越过我们已经在批评制度中检查过的, 出现在难以下咽的党派意识和无菌分离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尔赫恩所指出的那样, 这本杂志代表了“英国

1 利维斯, 《确保连续性》(For Continuity), London 1933, p.72。——原注

2 弗兰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 1952—), 英国学者, 现任《新左翼评论》副主编。——译注

资产阶级文化几乎闻所未闻，对其而言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一种知识分子形态：也即经典意义上的‘知识阶层’，一个脱离了每一种既定社会利益的知识分子团体，以其舒服便利的附属性指向原则，只被其选定的文化活动联合起来”¹。《细察》人(Scrutineers)作为历史上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公共领域的衰弱而脱离了文化或政治权力，在那个公共领域内，有一段时间他们本可以找到一个家，随意坚持主张(用利维斯的话说)一个“自由的、非专业化的、一般性的智力”，具有18世纪的“业余”批评家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的重要传统。然而，像斯蒂尔或艾迪生那样非专业的一般性智力当然是永远不得“自由”的；相反，它总是深陷在特定的文化利益和政治利益当中。正是这些利益可以被视作与整个公共领域共同扩展，所以绝非是乖僻的或宗派性的。一旦批评随着公共领域的衰落被迫处于守势，它“自由的、非专业化的、一般性的智力”势必与持异议的激情和好辩论的精力产生矛盾，有了这种激情和精力，它会痛骂那些社会力量，认为它们应该为自己的有效无能(effective impotence)负责。在这种

1 马尔赫恩，《〈细察〉时刻》(The Moment of 'Scrutiny'), London 1979, p.326。——原注

情况下,《细察》成为杂交品种,介于《爱丁堡评论》和《星期六评论》之间,融合了前者言辞辛辣的冷嘲热讽与后者思想高尚的公正无私。《细察》作为名义上的公共领域和少数派,作为精神中心和预言外围,把我们调查研究过的批评的某些历史趋势矛盾地统一起来,而且,这样做时,它成了一个僵局,自由人文主义如今在其外仍然无法动弹。

彼得·霍恩达尔在其著作中写道:“倘若大家认为一般的公众审美意识不够充足,只有少数人是值得交流的话语伙伴,那么此时,文学批评的一般效力就不再是由文学公共领域来加以确定的了。”¹简言之,这就是《细察》所处的困境,它矛盾地希望去重建一个公共领域,深信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作出真正的区分。有些时候少数派被视为一个更广泛的公共领域的先驱,它将使其变为现实;另一些时候少数派又和公共领域有着共同的术语,可以进行有效的对接。传统公共领域的常态是理性,不是强权,它的“无能”与被剥夺继承权的那派人的无能杂交。传统公共领域中“无私利的”理性,其基础是自主权,这种自主权是早期资本主义商品化的过程赋

1 霍恩达尔, p.55。——原注

予文化的：只有当文化从宫廷或教会的功能中释放出来，可以通过市场来得到，文化才可以生成一种批评性的“通用”话语，不仅关注手工制品即时的社会使用价值，也关注它们抽象的真实与美。启蒙运动的抽象规则和类别在这个意义上是与重商主义的抽象交换价值同源的。一旦文化商品向每一个人冷漠地展示自己，批评行动显然会丢弃它“利益相关”的特点从而变得与个人无关；这个批评行动核心部分的“无私利性”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商品本身的混杂性的对立面，没有专门的搭档，只是与所有对手尽情嬉戏。相反，像阿诺德或利维斯这样的人的“无私利性”，是文化商品化后一个阶段的产物，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已经有效侵蚀了一个有自主权的艺术的整个概念。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当监管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力领域的市场法则也渗透到为私人保留的公共领域时，*Räsonnement*（批评性论断）就倾向于将自身转变成消费行为，公共传播的环境便分成以个性化接收为一致特点的各个行动。”¹简言之，就是这些使得现代批评成为现实的物质条件，也是将以先进的形式招致其消亡的条件。一旦“公众”（*public*）成为“大众”（*masses*），受到商业化

1 转引自霍恩达尔，p.165。——原注

文化的操纵，“公众舆论”沦为“公共关系”，那么传统的公共领域必然要解体，身后留下一个孤立的文化知识界，它对“无私利性”的呼吁其实是一种解散公众而不是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行为。只要文化被认为独立于物质利益之外具有自主权——矛盾的是，这种情形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的增长成为可能——特殊文化利益的冲突就可能会包含在这个整体框架内并在其中得到解决。但是，一旦这些文化利益被视为是由强大的经济力量支配和决定的，或者当文化延伸到那些有实际或潜在利益的地方，超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界限，这个领域和所谓的艺术自主性就会同时遭到破坏。利维斯早期的著作——《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其实就是这一伤感时刻的认知标志；《细察》可以把批评专业化的驱动力解释为尝试去改善那些可能修复这种可怕局面的认知工具，同时也可以解释为退出其最不能容忍的方面从而进入一个封闭的话语小圈子。

然而这种“专业化”的矛盾都很严重。如果它有助于给批评一个现在被剥夺的合法性，那么使得这一举措成为必要的条件，也同样阻止了它的可能性。批评需要这样的合法性，

因为以前使其合法的公共领域崩溃了；但是没有这样一套共同的信念和规范，也就真没有了批评可以授予自身权力的权威性。其话语因此被迫自我生成、自我维持，在这个非常时刻，它在某种意义上将自己弄成可以合理论证的样子，在对公共对话者演说的时刻，又成了一个直觉主义者，转了一圈又回过头来。一方面是科学实验室的蛮干实证主义，另一方面是不着调的主观主义，二者之间是利维斯的批评实践概念占领的“第三领域”，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这个方面：批评性论断必须是公共的，但是被论述的“他者”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自身，配有一个人自身的直觉必然性和“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s）。当然，传统的公共领域也是这样；然而尽管利维斯那些批评性论断首先是“个人的”，一场公开讨论的接手又使其成为一个二次运动（a secondary movement），让它们在本质上具有自身同一性，传统公共领域却没有批评回应这样一个概念作为外化的内在。相反，公共性是批评性论断的来源和基础，而不仅仅是它的性质；用原始结构主义者（proto-structuralist）时髦的话来说，礼貌语言的礼仪和种类解构了作为主体的批评家、文学对象和话语共同体三者之间的立场。这正是利维斯在“奥古斯丁主义”里所担忧的

反人文主义，它本身就与“自动化的”客观反应串通在一起，因此利维斯的注意力从艾迪生那里转移到约翰逊那里，在约翰逊强大的独立性中，他能看清楚自己顽固的个人主义的影子。但是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约翰逊的独立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挥了松动传统公共领域典型的社会关系的功用，因此，利维斯为了神化般解决掉自己的烦恼所诉诸的历史，已经是这些困境的前史了。不过在这方面，约翰逊与利维斯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差异。两位批评家的教条主义都可以反映一定的社会分裂，但是对约翰逊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风格的事情：他的判断极具强制力，仍植根于利维斯特别警惕的“常识”。约翰逊的直觉吸引力萃取了这个公共领域的共同智慧，即使它们作为苦思而得的格言暴露了一个在该领域不再舒服自在的个体自觉意识。利维斯的直觉主义恰恰相反，它最终是形而上学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翰逊的不是；在其中言说的是“生活”，它只能在经验主义的细节中表现出来，同时又是经验主义“常识”的敌人，公共社会的他者。

《细察》的批评“专业化”，既是对文学学术界的“业余”创作(belletrism)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由人文主义危机做出的一种反应，自由人文主义的阿诺德式虔诚在面对资本主

义文化产业时要求更加精确的特殊规划。然而，这两项事业最终都弄巧成拙。因为，将批评“专业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重返自己反对的学术界，毕竟这个圈子都是专业的国家工作人员，但身上又具有那种文雅业余的(*genteel-amateur*)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专业化只能在加强学术机构建设时达到极点，《细察》对那些机构的批评是相当正确的。“实用批评”或许为精神救赎提供了一条路径，但它也较为中肯地给出了一个方法，批评利用这个方法可以令自身作为一个有效的智力“学科”合法化，从而有助于重现这个在各种社会势力中将“生活”拒之门外的学术机构。至于将某种锋芒借给虔诚的自由人文主义，事实也证明这个策略可能是自我解构性的：因为将这样的话语“专业化”，会时时遇到风险，破坏形成其基础的“自由的、非专业化的、一般性的智力”。批评再一次直接陷入僵局，介于无效的笼统性和令人讨厌的专业性之间。

然而，沉着应对这个初始矛盾是《细察》所取得的显著成果。这的确存在着某种意义，而且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整个计划的依据是一个含蓄的否定，即“技术”和“人文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相抵触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它们是互补

的：批评对文学对象的拷问越严格，它所产生的感性具体性和至关重要的价值设定就越丰富，二者都具有普遍的人类相关性。这一信念，是英国批评制度所见证过的针对批评之结构困难的最有力“解决方案”；《细察》很多巨大的影响直接来自它。一个策略终于得到改进，利用它，技术专家和绅士学者、科学主义与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轻浮可能同时被包抄；接下来的几十年，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不是根据这一策略进行实践的批评运动，都将无法取得主流地位。一方面是“科学的”心理学，建立在新实用主义的“欲望”微积分基础上，另一方面是对任何自主审美领域的拒绝，坚持文学和“生活”之间的连续性，怀有对诗歌具备救苦救难的社会潜力的阿诺德式信念，I. A. 理查兹¹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了。人类经验的纤细纹理遭受了工业化的蹂躏，更新这种纹理的任务却被美国新批评(New Criticism)强行套用了细腻的文本分析的种种复杂技巧，美国新批评意志坚强的形式主义在每一点上都与宗教人文美学耦合在一起，这种耦合的铰链是技术

84

1 I. A. 理查兹(I. A. Richards, 1893—1979)，又译I. A. 瑞恰慈，英国文学批评家、诗人，曾在剑桥大学(1922—1929)、清华大学(1929—1930)、哈佛大学(1944—1963)任教，新批评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文学批评原理》、《实用批评》和《科学与诗》等。——译注

上同步而神秘的悖论观念。诺斯洛普·弗莱¹利用一度看似几乎不可战胜的合成法，将一个“科学的”不断分类化的批评方法与宗教人文主义的看法结合起来，这个宗教人文主义视文学为超验欲望(transcendental desire)的神话外形。对于一般的人性与专业的批评智力之间、诗意的温雅与某种更慷慨的包罗万象的社会氛围之间所进行的那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不相称的竞争，只有威廉·燕卜苏²保持警惕，他固守自己的“田园”(pastoral)观，似乎与这种最强势的批判正统背道而驰。

1 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开创了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代表作有《批评的剖析》、《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等。——译注

2 威廉·燕卜苏(William Empson, 1906—1984), 英国文学批评家、诗人，代表作有《朦胧的七种类型》等。——译注

在理查兹、弗莱和新批评那里，有可能使批评在学院内外都合法化的理想平衡并没有得到适当的维护。理查兹毫无生气的新功利主义，新批评脱离尘世的唯美主义，以及，弗莱不受外界影响的系统性，都使得这种平衡危险地朝着技术专家统治的批评集团倾斜，这个集团威胁要驱逐自己正式推动的各种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督教的、保守派的）。1960年代那场发生在社会上和学术界的骚乱，赤裸裸暴露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只要学术界保持其传统的合法形象，作为一个有点脱离社会、但又与其在人文意义上隐约相关的机构，批评就不可能因为资质问题而受到审查，因为这个机构的模糊性完全符合它自身的条件。它同时又是一个有点深奥的、自我专注的追求，适合作为一门大学学科，但在紧要关头，为了造成富有成效的社会影响，它又能够集齐某种普遍的情形。然而，在1960年代，学术机构异乎寻常地成了社会普遍不满的焦点；因为无法维持它们一贯作为可容忍的无私利

性查询飞地(tolerable enclaves of disinterested enquiry)这一自我形象，学术机构反倒暴露了它们原来被锁定在灭绝人性的官僚机构更为宽泛的结构中，同时又作为这个结构的一种范式，与军事暴力和技术剥削同流合污。学生团体更具有社会异质性，它是“大众文化”而非“高雅文学”的产品，往往在意识形态上本能地与学术统治阶层的种种臆断发生冲突，威胁要分裂并破坏自由人文主义者的共识，而这个共识实际上正是批评唯一的根据。伊丽莎白·布鲁斯在北美大学运动这个背景下曾经说过：

人们很容易就能挑出促成这动荡不安和猜疑情形的种种因素：就在隐蔽的政治活动和一场显然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大学与军方进行合作；学校人口（包括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上层人口迅速增长；除了人口体量问题以外，还有一个突然发生在传统上受到限制的高等教育小圈子里的关于民族遗产、种族、阶级的新异质性问题……一致性也受到学生组织的威胁，这个学生组织缺乏的是常见的预备训练和高等教育圈子的共同经验，甚至不懂教

师们曾经能够采用的那种统一的语言。这样一个环境使得“常言”（ordinary language）和“常识”（common sense）之类的概念越来越成问题，那些默认的一贯支配课堂教学步骤和课程设置的利益和假设，突然就暴露出来，让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同时，被补贴的教师队伍正在不断扩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学问，达到同样前所未有的专业化程度，使得能够获取相同信息的“学者共同体”（community of scholars）完全不可能形成。补贴这一事实，为所有这种扩展提供经济担保，使得学院认为自己是在扮演国家牛虻的这一传统主张听上去相当空洞。¹

布鲁斯雄辩的论述中有一点十分突出，它几乎一点一点地再现了那些对传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侵蚀负有责任的因 87
素。随着国有资本的渗透以及被直接锁进它传统上与之保持距离的权力结构，公共领域逐渐“分层”；一个“自主

1 布鲁斯，pp.16-17。——原注

的”文化空间随之缩水，它曾经习惯在公共领域和物质利益之间进行调解，这些利益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清晰可见，令人反感；“公众”变得日益异质化，内部出现意识形态的利益与大家接受的共识不相容的现象；传统的知识界内部在专业化的压力下出现了知识碎片化：似乎在高等教育背景下，对公共领域逐渐退化的叙事正在戏剧性地重新上演，形式十分紧凑。有人可能会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以瘦削的身形迁移进入，学院现在处于这些力量的包围之中，这些力量曾经摧毁了启蒙运动的梦想。利维斯坚信可以从大学自身推出一个翻新的公共领域，这种信念到了1960年代露出真容，成为一个特别怪诞的讽刺。

随后的批评危机正如布鲁斯所指出的那样，部分导致了在整个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更普遍的信誉失败：

在这里，害怕“理性化作技术暴力”，以及“反对工业社会利用客观性”，成了进行正直的社会斗争的基础。长期与人文主义卿卿我我的浪漫，将人类形态巧妙强加于自然混沌状态的喜悦，都已经变酸……驾驭手段似乎已经超过人类欲望，在没

有主观承诺的事实领域和没有权威统治的新主体性之间，出现了凶险的裂口……电视也许是唯一剩下的通用之物，是这个复杂而又分裂的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唯一可以分享的东西，然而通过它，社会关系变成了可观的景象，现实被定义成了消费的对象。人们感觉到个体的孤立和被动，感觉到社会的冷傲、神秘、难以驾驭，感觉对掌握知识技术的追求已经自立自足并能自造目的，而这是件很危险的事，因此，为了对抗这种普遍的感觉，1960年代形成的各种政治运动和学生运动应当更多地参与集体生活的所有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固定的等级制度、普遍接受的传统、各种类型的秘密知识，都应当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东西。¹

当代文学理论的种种关注，正是从布鲁斯所描述的这种纷繁巨变中产生的。文学理论，从我们现在了解的各种形式来看，就是1960年代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生出的一个孩

1 布鲁斯，p.17。——原注

子。理论往往被认为是一个神秘而又复杂的追求，而且这一点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要将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回溯到1960年代，就会让我们想起所有的理论冒险其实都很天真。理论尚未完全在实践当中提出问题时，总是表现出几分孩子般的困惑；只要那些实践尚未变得“自然化”，这个孩子就会依然感觉到它们那种神秘的、也许甚至是滑稽的随意性，并继续提出那些关于理由和动机的最根本、最难对付的问题，让听到提问的大人感觉又好气又好笑。那些大人会试图用维特根斯坦式的道理来安抚这个孩子的困惑：

89 “宝贝，我们做的事就是提出问题”；但仍然感到惊喜的孩子会成长为理论家和政治激进分子，他们需要一个正当理由，不只是用来解释这样或那样的实践，还要用来解释限制他们自由活动的物质生活整体形式——制度基础；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不可能去做一些不同的改变。维特根斯坦说过，有一个哲学问题是“我对这里的路还不熟”，言下之意就是给一张地图就会改正所有这种暂时性的盲目乱闯。但尚不清楚大人知不知道周围的路，即使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知道似的；也可以这么说，孩子在活动中觉察到的随意和晦涩不过是他自己半生不熟的特性，而不是这

些活动本身的特性。孩子会长大，像大人们一样，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将语言游戏完全内化，在这些游戏中找到自己；或者他可能成长为一个布莱希特式的演员，他的行为让这些语言游戏陌生化，直至它们的随意性，还有它们由此产生的可转化性，都突然变得清晰可见。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理论问题一直是非常脱离实际的，它试图将一系列常规做法这种十分有利的情形都上升到自我反观性的高度，这么做也许不可能成功。虽然我说过这样的问题很幼稚，但是把它形容为造作的幼稚也许更准确，更实事求是。孩子提出的这些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肯定都不再天真，它们确实体现了某种求知动力；同样，理论家的问题与其说是大眼天真，不如说是修辞巧妙，与其说是米兰达¹屏住呼吸又惊又奇，不如说是对愚人顽固不化之蠢行表示厌世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理论问题本身就是愚蠢的。但是愚人都早已接受了这种必然的神秘化，而激进的理论家却还在用一种意味着改变有必要的曲折修辞来雕琢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有礼貌的一句“怎么了？”，还不如说是一句不耐烦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90

1 米兰达(Miranda)，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主角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在孤岛上抚养长大的女儿，象征绝对的纯真。——译注

伊丽莎白·布鲁斯写道：“每当批评的功能本身有问题时，理论活动……就会增多。”也就是说，理论不是在任何历史时刻都会出现的。只有在既可能又必要的时刻，当社会实践或知识实践的传统理论基础已经被打破，需要新的合法形式的时候，理论才会诞生。罗伯特·J. 马修斯¹评论道：“在理论活动的某个时间点上，进行这些活动的简单事实不再充分。现有的制裁必须由一个理性的制裁取代。”²应当说，“必须”这个词的力度并非无可争议，但是像布鲁斯一样，马修斯已经掌握了最有效的区分“理论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的方式。1960年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这一时期结束于1974年³)，学院内部的自由人文主义受到挑战，被认为是精英主义、理想主义，去政治化，位于社会的边缘。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它被视为与社会再生产的正式体系串通在一起；作为一个“业余”话语，它被认为在历史上已经被废弃。这个由“技术”和“人文主义”合成的东西，是批评从自

1 罗伯特·J. 马修斯(Robert J. Matthews, 1926—2009)，美国宗教教育家、学者。——译注

2 转引自布鲁斯，p.19。——原注

3 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一个政治问题》(Pleasure: A Political Issue)，载于《快感的形式》(Formations of Pleasure)，London 1983，p.5。——原注

已饱受困扰的过去夺来的，原本就不稳定，它在这个意义上被再次分解。批评既是再现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的积极力量，却又与它有助于维持的社会形态不甚相干，无能为力，因此它是有罪的。1960年代产生的新“知识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可能以时兴的辩证方式既揭发了批评在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米歇尔·福柯的术语)网络中串通一气，又曝光了通过这种勾结方式继续存在的社会边缘性。这种矛盾性不在批判行为中，而是批评自身的本质所固有的。因为那时候同现在一样，学术批评的任务是培养学生有效利用某些技术，迅速掌握某种话语，以此作为认证他们在知识上是合格的统治阶级新雇员的一种手段。为此，“文学”或“审美”的教育内容几乎完全不重要，可能很少有人会发现熟读波德莱尔对人事管理是绝对必要的。1960年代学生人数的扩增，连同随之而来的教学方法理性化和具体化，以及成套的个性化学习，无情地暴露了这种培训的抽象“交换价值”；但是它用同样的手法，令人尴尬地凸显出文学教育形式上的“交换价值”和内容上大肆吹嘘的“使用价值”之间的明显差异。文学教育是一种商品，恰好到目前为止都是前者主导后者；对性爱的复杂性或对人类状况的荒谬性作出正确而敏感的反应

是一种行为机制，学生藉此可能在白厅获得一个称心如意的职位。然而，一旦坐到那里，这种文学人文主义的使用价值绝非是不言自明的——这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社会功效。文学人文主义的话语当然是晚期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边缘现象，但这恰恰就是它正式授命的地方。它的作用就是成为次要边缘：扮演成那种“过剩”，扮演成那种对社会现实的补充，以德里达的风格，既暴露、又掩盖一种缺失，在把自己添加给一个显然很饱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又揭穿它的中心有一个空缺，那里可以隐约检测到被压抑的欲望在搅动。这当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后期“高雅文化”的真实轨迹：既不是装饰性的不相干，也不是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既不是结构性的，也不是多余的；而是一个适当的边缘存在，标记出那个边界，社会在那里遭遇了自身有致残能力的缺席，又将那些缺席驱逐。

新批评的文学人文主义认识论尝试过向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理性主义发出某种挑战。这是批评的任务，通过其对诗意模糊性的复杂感知，重新恢复这个世界被此种理性主义夺走的感官特殊性，其目的就是抵制它对经验进行无情的抽象和商品化。但是，如果主体对客体的关系由此重新获取了被

具体化的社会秩序压制的象征性情感维度，这种具体化也就得到矛盾的再现：阅读主体在用严格的客观主义词汇定义的文学文本面前摆出一副沉思的姿态。批判性分析抵制工业资本主义的具体化习惯，但同时又模仿这些习惯；“无私利性的”审美观照戏仿它外出挑战的那个科学主义。文学人文主义的阅读主体经过严格的一成不变的测试，即将在一个规整的结构内成功取得自由的、丰富的、自我反思的、有自主权的身份，这个结构把阅读主体描述得很被动、很无能。文学人文主义生成的主体性形式重新制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典范例，与那个十年要求有出入，后者正在将主体重新改组，使其变得主动、机动，是多重性的、集体主义的、参与式的。这个起源于1960年代的文学理论大部分因此都统一在它所奉行的激进的反客观主义中——简言之（tout court），就是往往用客观性来混淆客观性的具体化形式的一种冲动。现象学将文学作品变成一个有自身特点的主体，把阅读认识论本身，也就是社会现实中到处都没有的那种主体与客体的情色耦合或合并，作为对商品化造成的苦难的一种寂寞补偿。读者一反应理论强调读者对文本的主动建构，在批判领域戏剧化再现那些如今在政治社会得到释放的民主参与力量；这个理论更

为激进的表现是将文本的客观性完全消解，在梦想中如愿以偿地掌控一个昔日顽抗的世界。各种精神分析批评把握文本，将其作为一个单纯的中转设备或场合，阅读主体通过它绕回来端详自身更为迷人的心理场景。暗中打击客观主义，往往就是在颠覆那种相关的具体化，颠覆文学的自主性：正是在这个平等、多元、反抗等级制度的1960年代，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虚构话语和非虚构话语之间、舞台悲剧和电视剧之间的差别进行解构，首次成为当前关注的问题。结构主义对漠然横穿这些划分对象的代码的识别，为这项民主化工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94 一方面是揭露它越来越不合时宜的晚期资产阶级制度，另一方面是政治反对派的各种势力，文学人文主义夹在它们中间左右不是，它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学生运动之间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然而，文学理论并不是没有它自己的政治模糊之处，随着1970年代的临近，它的这些模糊之处会变得更加明显。这种理论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答应应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结构矛盾，我们看到这种结构矛盾一开始就刻写在资产阶级批评内部。因为理论在技术上是细致劳神的、复杂的，完全鄙视一切逃入“常言”的“业余性”，同时它又牢牢地与人

类文化最一般的基础结构结合在一起，它专业性的惯用语表达了极具深度和广度的主题：主体、无意识、语言、意识形态、历史、认知、整个符号系统。按照艾迪生的说法，它认为知识和实践的离散区域可归入单一的元语言，这是知识业余主义的一个标志；总的来说，理论拒绝这样一个幻想，它把自己构建成技术话语的一个复杂的重叠，不能简化为一个中心本质。将那些话语统一一起来的东西同任何单一的教义一样，都是它们批评的、结构的、去神秘化的思想风格；没有一个逻辑上说得通的理由能够解释一个符号学家应当说服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去做发展，然而这些思想交流就是该领域的特点。

如果这是文学理论的一大收获，那么整个 1970 年代，它都证明带有一个显著的缺点。一句话，事实证明理论具有异乎寻常的让人盲目迷恋的特性。说这个并不是要重申一下理论所驱逐的、为文学所代表的一贯的人文主义平庸——理论从极其卑微开始，渐渐变得极度自大，完全覆盖掉了它本来要调解的东西。那种声称只有直接阐述文学文本的理论才可接受的论调是一种厚颜无耻的监管姿态。在“理论”支持下，现在有点随意组合起来的那些迥然不同的先入为主的想法足

95 够丰富，各自确保“独立的”知识状态；它们仅仅被当作享有特权的文学作品的一面镜子是不可容忍的，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含义都远远超过这样的作品。历史哲学有其自身正当的关注，只要这些关注有助于直接让特拉法尔加战役(the battle of Trafalgar)¹ 曝光，就不需要得到认证。历史可能确实时不时就成了这种研究的直接对象，但它也可以作为这种理论调查的“原材料”，然后成为对历史本身的一种反思，而不是反照。除非这样的理论调查导致了某种实际后果，否则，从唯物论的观点来讲，它当然毫无结果；但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关系会得到相当多的调整，超出了那些就文学理论而言力求把理论贬谪为文本的卑微侍女的人的想象。要决定到底是理论在阐述文本，还是文本在发展理论，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或有必要的事。对文学理论的监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错觉，因为这种理论首先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对于那个已知为文学的难以捉摸的本体论对象来说，也绝不是先天就可以限制的。主张“文学理论”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不一定是从文学文本中得来的人，不会掉进理论主义的泥淖；这种说法

1 1805年10月21日，英法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外海展开的一场战争。此役让法国海军精锐尽丧，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译注

是要认识到它可能有的实际影响将扩散到表意实践更广的领域。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并不是一种迷信；它具有让人盲目迷恋的特性，是因为它有助于为一个逐步失信的批评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从而转移注意力，不再关注批评的社会功能中更为根本的问题。从广义上讲，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有两种反对和包抄自由人文主义共识的方式。第一种是转变为一种激进的、而非自由的人文主义，要求批评与社会相关，谴责脱离社会的学院精英主义，大力发展一种更加民主、参与性更强、更加以主体为中心的学习。第二种是完全驱逐主体，甚至拒绝激进的人文主义，认为它不过是自由派对手极左的变调说法，并且反对学院朦胧的业余主义这样一个果敢分析的方法库。也就是说，“业余”与“专业”之间、人文与技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对抗性批评的流派内部复制自身——例如，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卢卡奇和阿尔都塞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没有新意。对于“科学的”阵营来说，激进人文主义者的特点，就是站在当时盛行的、有问题的、他们所反对的东西的镜像之最边缘；对于激进人文主义者来说，“科学的”批评者希望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欢心的那种非常具体化的、技术官僚的话语模式来拆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是辩证的。从症状上看，激进人文主义者在越南战争期间对“参战”的谈论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点确实表明这样的谈论所代表的各方势力的组合很不稳定，它们很大程度上是耦合在一起的。然而同时，激进人文主义在结束越南战争这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结构主义和它的兄弟姐妹们在自己“鼎盛”时期的确讲求科学性，它们将自己完全抵押给了这个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而这个社会秩序却将它们定义为是颠覆性的；可是，结构主义极端的哲学传统和反经验主义，大多都是更加去神秘化的事务。因此，必须给出一个辩证的说法，来说明结构主义是如何既利用自己的科学主义、功能主义、理想主义、强迫性整体论、对历史与主体性进行的清算，以及从社会实践到具体过程的还原，从而立时成为一种非常适合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同时，它又以其百分之百的传统主义、对“自然”进行无情的去神秘化、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虚伪虔诚的拒绝，以及对“生产”即真理的揭露，成了对这个社会秩序的有限批判。随着 1970 年代的展开，结构主义和它的后辈在这件事中将证明是霸权性的。这点不足为奇，不仅是

因为激进人文主义被收卷起来，随同妇女解放论流行的 1960 年代末逝去，消散在危机四伏的 1970 年代中期；还因为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话语，而不是一种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它多为学院专用，而不是学生力量一方的谈论。这个结局后果严重，早期的激进人文主义提问时咄咄逼人，表现夸张，而实际上这个制度问题并不属于理论。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这一点上基本保持沉默，它让女性主义批评，在某些方面，也就是让 1960 年代后期激进人文主义的继承者和（至少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里）极力反对结构主义的人，将这个问题一直留在理论的议程上。

解构主义的出现让批评的问题有望得到某种暂时性的解决，尽管解构主义本身打算抵制任何这样的“封闭”建议。因为在战略上有令人钦佩的花招，所以解构主义既反科学、又反主体。因此，它给那些不再对高大的结构主义的形而上预设抱有幻想、却依然把它的反人文主义视作宝贝的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立场。它现在有可能一网打尽自由人文主义、激进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因为这些主义之前都曾试图各自包抄对方。然而，这种大胆的超越也存在着许多困难。解构主义的根在法国，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随意借鉴

一种体现在其学术机构等级森严的专制本性中的形而上理性主义。在这个背景下，德里达拆除二元对立以及颠覆超验能指的重任有一种激进的潜在相关性，而该相关性在解构主义输出到国外时并不总是能够存活下来。简言之，这个信条在外不怎么行得通：它被移植到自由经验主义者身上，而不是英美的理性主义文化当中，它与自由人文主义往往大肆勾结，其程度又同等于它对自由人文主义的大肆攻击。我想讲讲我自己之前对这点所作的评论：“与理论、方法和体系适度断绝关系；对支配、统摄和明确指代的反感；特别优待多元性和异质性，反复犹豫和不确定；钟情于滑行和过程、滑移和运动；厌恶权威性——这样的用语在盎格鲁-撒克逊学术界如此迅速地被吸收，原因不难想见。”¹事实上，最后一点有些言过其实，把一种趋势与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混为一谈了：此种吸收目前绝非是英国或美国的规矩；而且这一评论也忽略了解构主义那些令主导意识形态不安的东西。某些解构形式激进好斗，它们的认识论怀疑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与学术正统完全对立，动摇了学术客观性的根本基础。或许这么说

1 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London 1981, pp.137-138。——原注

更为准确，以英语为母语的各种解构主义在挑战主流批评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那一刻，就与它的自由主义重新聚在一起了——这样的解构主义，简言之，就是没有主体的自由主义，并因此成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恰当的观念形态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传统的自由主义总是被自我的自主性与它的多元性之间的冲突拖垮，寻求在前者的调整统一当中将后者倒折起来；资产阶级社会后期以人为本的自主原则越来越不合乎情理，声誉扫地，此时解构主义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矛盾，而且大胆牺牲掉传统的自由主义口号，为的就是一个可能刚把意识形态甩开的多元性。意识形态上的封闭性可以不再遭到个体自由积极的自我实现的反对；但它可能会受到能指更为消极的自由发挥的攻击；这个能指可以逃脱某种恐怖意义的致命拥抱，恰如自由的自我曾经绝望地相信它可能如此。令人感到好奇而又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自由主体的死亡现在对保存那个改变了风格的自由主义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解构主义将主体的异质性从它的实体化中解救了出来，但却是以清算主观能动性为代价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或许可以在政治上而非文本上结合那些首先需要这一策略的意识形态系统。正因为此，它再现了一种沮丧与兴奋、允准与请辞

融合的情形，这是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特点。在利维斯的“伟大传统”中，没有什么比意识形态过滤这个做法更为引人注目，它针对该状况所选择的文学文本，既富有自由主义主体对自身逾越力量那种令人眩晕的感觉，又带有这个主体无可阻挡地服从于压迫制度的麻痹性意识。解构主义既坚决服从形而上学的不可避免性，又被一种承诺粉碎整个外壳的快感(jouissance)或嵌套式结构(mise-en-abyme)迷得如痴如醉，这种双重情感毫无疑问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它混合了1968年之后的左派悲观主义和一种可以说是继续保持革命温度的话语。但是它也呼应了传统自由主义本身那种撕裂的情感，传统自由主义为了采纳保罗·德·曼的构想，分裂成一个“存在于不真实状态的经验自我和一个只存在于语言形式当中的自我，这种语言明确断言有关这种不真实的知识都是真的”¹。对德·曼而言，这样的人类处境所具有的讽刺意味事实上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封锁的产物，解构主义就是其继承者。唯一真实的资产阶级主体是那个认清超越是个神话的人。这个典型的无期徒刑犯接受对自己的宣判，放弃了一切翻墙

1 保罗·德·曼，《盲目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Minnesota 1983，p.214。——原注

越狱的愚蠢念头。资产阶级的超越之梦往往是愚蠢的谎言，德·曼认识到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他不承认的是反讽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这个反讽出神地盯着整个不真实的场景，苦笑地意识到它自己无可逃避地与自己所看到的东两共谋，被还原成了一个不过是对介于自己的言语行为和经验性自我之间的一个虚空进行命名的事实。实际上，再也设想不出一个更为熟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了；从艾略特、詹姆斯和福斯特¹ 那类残废的、边缘化的、自我反讽的人文主义者，到反人文主义者的解构主义者，这样一条线是笔直的、不间断的。正是因为德·曼坚持不懈地将历史性变成空洞的临时性，他才错误地把后期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困境置入一个对话语本身来说是结构性的反讽当中。

似乎只有这样的反讽才有望甩掉意识形态。但到底是哪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呢？在所谓的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实践背后，隐约出现的似乎不是北美实用主义和自由经验主义，而是一个更具有威胁性的阴影，大屠杀的阴影。哈罗

1 此处应分别是指 T. S. 艾略特、亨利·詹姆斯、E. M. 福斯特。——译注

德·布鲁姆是犹太人；杰弗里·哈特曼¹有中欧犹太人的血统；德·曼的叔叔是一个彻底幻灭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卷入过政治。只有J.希利斯·米勒²是个例外。意识形态对耶鲁学派来说，似乎首先是指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人们以为他们对超验能指、总体化系统、历史目的论、不言而喻的真理以及意识突发事件“自然化”这些东西的焦虑，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这种创伤性的经历。正是因为这点，而不是因为他们对胡塞尔和宾斯万格、布朗肖和本雅明的非美国式(unAmerican)熟悉，耶鲁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欧洲人。鉴于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耶鲁派在某些方面跟它很相像)在一个所谓庞大僵化、从严“管理”的美式资本主义当中发现的只是一个逃避法西斯主义的模糊去处，耶鲁的解构主义者已经有能力在北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对德里达的某种选择性阅读之间实现一种更富有成果的交流(commerce)。这种选择性阅读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抹除了德

1 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 1929—2016)，美国文学批评家，生于德国，是法国解构思想在美国的最初阐扬者之一，耶鲁学派成员，代表作有《荒野中的批评》等。——译注

2 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1928—)，美国文学批评家，耶鲁学派成员，代表作有《小说与重复》等。——译注

里达作品中所有的政治性痕迹。即便如此，至少在形式上他们希望打败的不是政治性的东西：哈特曼已明确否认这样的指控，而且有证据表明德·曼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成为敌人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不是政治上的东西。但是选择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原型，是彻底的还原主义和实在论的行为。因为，以某种结构上一成不变的态度去相信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严重依靠绝对的真理、形而上的根基、目的论的见识，以及对差异的暴力消除这些非常极端的模式，就像它们将表明的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情况绝非如此：一切意识形态都在“自然化”——这是耶鲁学派从卢卡奇那里继承来的一种死板的强调——或者，具有讽刺意味的自我间隔的结构可能不会被嵌入它的中心。意识形态的内隐模式由大多数解构主义提出来，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稻草做的靶子，严重低估了意识形态操作的复杂性和“文本性”。没有哪个二元对立可以简单地建立在“意识形态”——被设想成不断封闭、自我同一、完美无缝——和书写(écriture)之间。解构主义未能够消除这样的对立，这种失败其实是解构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特性最确定的标志，也是它与自己想要为难的自由人文主义共谋最确定的标志。如果被放逐的法兰克福

学派受到意识形态经验的折磨，然后错误地把这种经验扩展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那么被几乎同样的模式给迷住的耶鲁学派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那些不属于这一类别的意识形态实践。

如果批评处于危机之中，那么，就像保罗·博维¹所指出的那样，“难道解构不是大学对这场危机（而不是它的缘由）所做的完美回应吗？难道它不是以一个保存自我的举动（这个举动就像唐纳德·皮斯²所说的，是用机构本身的无能来刺激机构）将这场危机带到学院的一个策略吗？”³人们想起那个老虎的人类学故事，说老虎经常跳到部落仪式的中间打乱仪式，不一会儿，老虎就被纳入了这场仪式当中。将以英语为母语的解构视作那个危机，然后将其理论化、经典化、内化，作为一套新的文本技术聚集到学术界，或是作为新注入的知识资本以弥补其日益减少的资源，这当然是很诱人的。

1 保罗·博维(Paul Bové, 1949—)，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1994—1999)。——译注

2 唐纳德·皮斯(Donald Pease)，美国学者，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现为达特茅斯学院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译注

3 博维，《权力变奏》(Variations on Authority)，载于《耶鲁批评家：解构在美国》(The Yale Critics: Deconstruction in America)，J.阿拉克(J. Arac)、W.高吉克(W. Godzich)和W.马丁(W. Martin)编，Minnesota 1983，p.6。——原注

解构主义对权威的否认显然与 1960 年代的政治形势是一致的，然而，它也不像那种认为演讲是一种暴力形式的看法那么简单。毕竟还有什么比这样一个话语——它抽掉对手们脚下的地毯，给它们奉上一个瘦削得无从下手打击的轮廓，它不会被击倒，因为它一直就无可奈何地趴在地板上——更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呢？除了詹姆斯晚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之外，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清空自己(kenosis)更咄咄逼人的形态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解构重返传统的自由人文主义，它安安静静放纵自己的迷惘，这种状态一直都是那些可以不去弄明白之人的特权的一个准确无误的标志。那种仅因为总是已经到位而能牺牲掉自己的权威，是不值得羡慕的——它能品味文本不可知论的乐趣，恰恰是因为在制度上它是安全有保障的，也许它越是招摇，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盲目性，就越有可能加强这种安全感。别人或许不知道，但知道无人知晓就是可设想的最有特权的知识，非常值得换取一些关键因素。有一个时期，随着公共领域的衰败，批评的传统权威性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那种权威性急需要得到重申，但是又不能凭着直觉信心十足地采取重塑经典的知识精英这一形式，因为这种模式不可能比《细察》存活的时间更长。因此，

自我调戏和自我克制就成了权威唯一可以容忍的姿态——它既霸道地告诉你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又谦卑地承认这个说法出于同样的原因是完全可疑的。就这样，解构能够包抄打击现有的每一种知识，让它们失去一切功用。它就像另一种现代哲学，一路废止又让一切都保持原样。为了保护自己的激进性，它不能将就着接受自己不过是一套传统的自由主义的警告(caveats)，对一切不当的绝对化行为发出谨慎的告示，如果是那样，它又如何在实际区别于莱昂内尔·特里林¹式的或者约翰·贝利²式的语言呢？然而，假如它试图超出于此，毫不妥协地远离自己那些令人尴尬的同贝利的唯名论、反极权、非理论的独特意识形态的默契感，那它就有风险了，就可能会削弱自己那些反绝对主义的警告，并发表“更狂野的”言论——真理、身份、连续性、意义都只是幻想——它们都只不过是消极的形而上的东西。因此，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述过的那样，解构的难点(aporía)就是一个对立的僵局，一会儿分为“改革派”，一会儿分为“极左派”，无休无止，无法解决。

1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美国批评家、作家，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成员，著有《诚与真》、《文学体验导引》、《知性乃道德职责》等书。——译注

2 约翰·贝利(John Bayley, 1925—2015)，英国评论家、作家，著有《献给艾丽斯的挽歌》等书，还编辑过亨利·詹姆斯的《鸽翼》和两卷本短篇小说选集。——译注

挺过耶鲁解构批评明显摒弃权威这一做法而幸存下来的，是对文学和其他话语之间的关系看法，至少在德·曼的著述中是如此，这种看法是自由人文主义正统观念的一个精确镜像。文学的中心性里不存在将这种正统观念的信仰去除的问题；相反，文学之所以变成其他所有话语的真理、本质或自我意识，正是因为它不像那些话语，它知道它不知道自己正在讲什么。的确，它在茫茫大海上越无望，就会变得越极端中心；这位自由人文主义者对文学“内容”的看法被撤销了，而他对文学与其他惯用语之间的形式关系的那种感觉被再现了出来。矛盾的是，文学成了中心，所有的集中行为都从中受到谴责；文学成了真理，所有的真理都可以用它来解构。文学一度代表总体性，现在又成了它的解体；如果说文学改变了它的功能，但却并没有移动它的核心。对《细察》而言，文学是最主要的试金石，揭露了所有其他语言由于底气不足而缺席，无法将自身的抽象化为具体的在场。而对于德·曼而言，文学揭露出自己的话语伙伴形象令人厌恶、憔悴萎靡，因为它们陷在那个衡量它们的不真实性的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的困境当中。那么，无论文学主张消极的还是积极的知识，它仍然持有绝对的特权，而且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和解构之间的连续性就此而言没有间断。

从批评就像语言本身一样不知为什么总是处于危机之中这个观念里，变体的耶鲁派所做的纯粹的“文本”解构至少吸取了两点好处。一方面，此举有助于阻断批评现在所面临的历史性危机的特定性，将其化解成一个一般化的话语讽刺，从而缓和对历史性自我反思责任的解构。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这一事实确保了解构有一个安全的（其实是无尽的）未来：这个解构姿态，希利斯·米勒认为总是失败的，“因此它必须反复进行，没完没了……”¹。这当然是一种肯定会遇到的失败——它答应让你永远留在工作中，不像那些研究项目，它们在你即将获得进展的时候却令人沮丧地失去了动力。既然没有哪个解构性的批评文本会被清除掉一些主动性的因子，那么就会需要进一步拿出一个文本将它们都融化掉，而且只要空白的页面像学术出版物那样不可接受，这个文本又会不堪一击，轮着受到另一个的攻击。如果这种解构的效果是学院无休止的再生产，那么，就会有一个解构性的左翼出现，虽然它名义上承认对机构本身的解构是有问题的。

106 这种左翼解构政治已经具有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怀疑权

1 转引自博维，p.11。——原注

力、权威和制度形式本身，这种怀疑会再次成为自由主义一个激进的转折点。这样一种制度性的批判注定是形式主义的、抽象的，同时它还是一种偷偷摸摸的道德说教，但它也有可能认为某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权力执迷就是对一个真正的历史问题的反映。因为一旦学术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受到质疑——一旦假定这样的自由人文主义的确越来越不合时宜，是个时代错误，那么大学如何有助于再生产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关系，就算这个问题本身没有被粗暴地斥为“功能主义的”(functionalist)，也不容易看得确切。换句话说，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类机构是在利用权力，它们就是自动加油的机器，它们的权力斗争有一个纯粹的内部参照，而这一时期大学和社会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比许多早期所谓的激进模式更为复杂、模糊和不透明。如果解构是在告诉大学的自由人文主义，说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它是否在做任何事情，又或者它是否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在做什么，那么，这不仅是因为话语本身具有热情的、虚构的本性，还因为学术人文主义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当中存在一种历史的不确定性，这种历史的不确定性，既不会被学术人文主义、也不会被大多数解构完全承认。

我在本书开篇就认为，现代批评诞生于反对绝对主义政权的斗争。而实际上，它最终不过是一小撮人评论彼此的著作。批评本身已经被纳入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无报酬的公共关系，是任何大型事业单位需求的一部分”¹。批评在18世纪初期关注的是文化政治，有过度泛化的危险；在19世纪，它一心想着公共道德；在我们自己这个世纪，它成了一个“文学”问题。罗伯特·魏曼²抱怨“学术批评几乎已经放弃了批评的广义教化功能”³。但是，批评从来只是在它涉足文学之外的问题时——在“文学”不管出于什么历史原因突然被置于显要位置，作为媒介来表达一个时代的一般知识、文化及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至关重要的关注时——才有意义，这

1 霍恩达尔，《当代及未来文学批评的使用价值》(The Use Value of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Literary Criticism)，载于《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第7期，1976年冬季号，p.7。——原注

2 罗伯特·魏曼(Robert Weimann, 1928—)，德国学者。——译注

3 参见魏曼，《结构与社会》(Structure and Society)，London 1977，尤其是第二章。——原注

108 个说法也值得商榷。启蒙时期、浪漫主义戏剧以及《细察》杂志发行的时候，都是典型的例证。只有在批评谈及文学，发出有关整个文化的形态和命运的横向信息时，它的声音才引起广泛的关注。只有当“文化”成为一个紧迫的政治项目，“诗歌”成为社会生活质量的一个隐喻，语言从整体来看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典范时，批评才可能获得任何严肃的名头而存在。今天，除了通过大学院校再现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这一边缘角色，它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涉及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利益，而且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它几乎完全是自我确认和自我延续的。在一个核时代，我们很难相信出版对罗伯特·赫里克¹的又一项研究有什么样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批评消亡吗，又或是，我们可以为它发掘出某种更具生产性的作用吗？

“二战”后英国最为重要的批评家一直都是雷蒙德·威廉斯。然而，“批评家”这一称号就其当代意义而言对威廉斯来说是一个有问题的描述，他已明确拒绝文学批评家这一称号

1 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 1591—1674)，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复辟时期的“骑士派”诗人之一。“骑士派”诗主要写宫廷中的调情作乐和好战骑士为君杀敌的荣誉感。不过赫里克也写有不少清新的田园抒情诗和爱情诗，如《樱桃熟了》、《快摘玫瑰花苞》、《致水仙》、《疯姑娘之歌》等，成为英国诗歌史上的名作。——译注

有好些年了。其他常规标签，如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哲学家、文化评论家，也都不能彻底或完全概括他的工作。跨界是他写作中一个经常性的隐喻，覆盖戏剧和语言学、文学和政治、教育和大众文化、电影、生态学和政治民族主义。介于“批评性”写作和“创造性”写作之间的前沿同样遭蔑视：威廉斯是小说家、剧作家、（他职业生涯的早期还是）电影编剧，他的非虚构作品带有强烈的“想象性”指责和经验独特的强调，因而很容易转向进入修辞和叙事领域。除了“文化研究”这个有点信息不明的名头，威廉斯所栖息的领域尚未有一个确切的命名，在这个领域中，他其实是一名建筑师。他不是“话语理论家”或符号学家，虽然语言是他最持久的关注对象之一，他一直不肯让语言研究脱离对社会文化机构的整体调查。通过这种方式，一如通过其他方式，威廉斯的工作已经预见到了平行的左派立场的兴起，并以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先行抑制住它们的发展势头。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风靡的时候，威廉斯顶住潮流，一心关注“非话语”（non-discursive），因而看到先前的结构主义拥趸重新加入他，积极发掘沃洛希诺夫¹和福柯。在其他的唯物主义思

109

1 V. N. 弗洛希诺夫(V. N. Voloshinov, 1895—1936)，苏联学者、语言学家，著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马克思主义批评视角的弗洛伊德主义》等书。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认为被归在弗洛希诺夫名下的部分著作，实际上应是巴赫金的，或者，至少巴赫金参与了的，但这一争论迄今尚无定论（某些巴赫金作品集也收录了被归在弗洛希诺夫名下的著作）。——译注

想家(包括我自己)都转而研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威廉斯则坚持他历史主义的人文主义,结果发现,这方面的理论家在已改变的政治环境下正回过头去检查这个案例,如果不是不加批评地赞同,却也少了些傲慢。威廉斯对物质的文化制度的兴趣领先于热门的文化研究,就如同他那时对自然环境的关注虽然并不时兴,但却预见到了生态运动。几乎从一开始他的作品就隐含了这样一个“语义唯物主义”(semantic materialism)的课题工程,同时还隐含着对任何纯粹“文学的”焦点的一种拒绝态度:他最早的文本中就有两种分别贡献给戏剧和电影。

即便威廉斯算不上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理论家,但他也不能被贴上一个业余者的标签。也许他的著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技术知识的不足、缺乏严谨的理论化等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威廉斯并不通过对一种元语言的调配将自己扩展到这些非常不同的领域,以使它们全都可以顺利归入这种元语言。就他关注的全球道德而言,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继承者,继承了他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中所记录的19世纪道德家的血统;的确,这本著作的结论部分非常精彩,其广

度、深度和政治智慧都可圈可点，呼应了这个传统最好的一些宣告。但威廉斯的概括能力大部分都与一种极为细致的文化历史知识密切相连，方法——如果其腔调并不总是偶尔庄严——与那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圣人完全不同。威廉斯提纲挈领的观点不是那位先验观察者的类型，那位先验观察者掌握的是整体性的本质，但他的观点却源于对不同符号系统和实践之间的表达进行的考查。他早期的“情感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 概念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确实在一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即适合这些关系的一般文化意识形态模式)和让这种模式得以实现的主体性(尤其体现在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当中)特定形式之间进行调解。如果说威廉斯有一个“领域”的话，那么它无疑是一个由社会关系、文化制度和主体性形式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空间。这个领域的名称可以留给学术界来决定。

对于旋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针对自己的文化观点所作出的探讨，威廉斯回应说：

我曾认为工党政府有一个选择：要么支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重建文化领域，要么资助大众化教育

和大众文化机构，它们本可以经受住资产阶级新闻界势头正猛的政治运动。事实上，他们还是迅速选择了种种常规的资本主义优先权；拒绝资助纪录片电影运动就是一例。我仍然相信，当1940年代仍有大众化教育和大众文化存在时，在文化上没有对工人阶级运动进行资助就成了1950年代工党立场快速瓦解的一个关键因素。我认为你们理解不了1950年代后期美国新左派的那些计划，除非你意识到我和爱德华·汤普森¹这样的人尽管有分歧，但我们是在假定再造这种联合。也许到那天它就不再可行了。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观点即使很难实现，但仍然是合理的。²

威廉斯对“二战”后工党政府的种种期望在政治上到底有多现实，这当然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但是他在此所反映的大众文化教育机构的缺失将对他自己的工作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威廉斯早期最有开创性的一本书，《文化与

1 即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译注

2 威廉斯，《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1979, pp.73-74。——原注

社会：1780—1950》,就是在有效的政治隔离状态下——在“(他)能够察觉的任何政治、文学或文化的集体项目崩溃”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项工作的显著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带有“令人厌恶的退缩成分……退出合作的所有即时形式,还兼有——这点最终导致了极大的不同——一种因为它们不可行的强烈的失望感”¹。随着1950年代的临近,威廉斯将经历与新左派崛起的这种合作,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带给他们一种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复归,这将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某种背景。然而,早期因怀疑而分裂所造成的疤痕却永远不会彻底消除:这种经验可能被证明过于格式化,过于明确,所以,即使是威廉斯在政治环境对行动与合作更有利的时期写成的后期著作,也都与那些活动领域继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也就是说,威廉斯的写作以其典型的风格,有时是以特别极端的形式,将今天摆在所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面前的主要问题戏剧化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面向一个空缺的反公共空间,一个建立在大众文化和教育机构之上的

112

1 威廉斯, p.106。——原注

空间，可是“二战”后英国没有出现这样的机构。如果这样一个概念没有被当作左翼学术幻想而遭驳回，那么或许有必要迅速回顾一下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情形。在魏玛共和国，工人阶级运动不仅是一股不容轻视的政治力量，它还配有自己的剧院和合唱社团，俱乐部和报纸，娱乐中心和社会论坛。正是这些条件才使得布莱希特或本雅明的出现成为可能，才把批评家的角色从孤立的知识分子转移到政治职能上。在1930年代的英国，（对左翼政见进行）宣传鼓动的（agitprop）团体、团结剧院、工人电影和摄影联盟、工人戏剧运动、左翼图书俱乐部的分支机构、伦敦工人电影协会以及很多其他机构，都反映出这种丰富的反文化的元素。正是这样一个反公共领域，不论它多么有待发展、有异质性，威廉斯作为一个“二战”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却完全丧失了它。就跟我们其他人一样，只是他的情况更加令人心酸，更有戏剧性，他是被迫去占领一个尚未确定的空间的，处于一个真实但反动的学院和一个称心但缺场的反公共领域之间。当然，事实上他的影响一直在扩展，已经大大超出了学院范围：他的书到1979年仅仅在英国就已经售出了七十五万册，要将这样一位作家诋毁为“学院主义者”（academicist）确实需要一个令

人意想不到的扭曲的逻辑。但是由于反公共领域的实际缺场，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不会在政治上被组织起来；接纳并讨论威廉斯的著作不能构成一个更广泛的政治文化项目，不能与实际的文化实验和文化干预相联系。在缺乏工人阶级的戏剧运动影响下，无论好或坏，威廉斯的政治戏剧在资本主义的媒体反而找到了一个家；因为缺乏工人阶级的图书馆和知识生产机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在一个严禁赞助和屈尊的共享媒介内部坚决普及复杂的思想——被中断了。因为尽管这项任务很重要，但真正的政治宣传涉及更多，不单单是创作使社会主义理论为大众读者所理解的作品；这样的读者必须制度化而不是无组织的，必须能够在集体语境下接受和解释这项工作，并为政治行动思考其后果。英国缺乏一份普及的社会主义报纸是个简单而又显见的事实，这当然不是监督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的结果，这个事实剥夺了威廉斯可能为建设反公共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在机构内工作，机构让他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寻常的密切联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读者被认为是越来越分散，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他

们暂时保留了足够共同认可的利益，让文人去体验自己这个由社会定义而不是由个人创造的角色。他通过个人的和专业的接触网络，间接接触到政治权力的杠杆和决策中心。威廉斯的作品虽然具有文人的广度，但他这个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主义批评家的定位，必然与莫雷或史蒂芬的定位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倒向那个社会，而不是代表它；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矛盾的是，威廉斯不像文人，而更像是一个孤立的、看法与人相左的圣人。说这就是威廉斯大众形象中的一个元素绝非毫无意义。事实上，他的职业生涯和华兹华斯的职业生涯之间存在着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当然并无后者的政治变节。他们二人都利用自传性的、在乡村社区的个人成长经历，对既定的社会秩序进行道德批判和社会批判；二人都因此固守真实体验之伦理、现实主义之美学和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关系之生态意识；都碰上剑桥学术的统治阶级，并与其保持疏远，并在这一时期转向革命政治；都最终返回乡村环境。我们还可以概述出他们相似的情感以及共同的民粹主义气质。但如果社会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都不能获得现成的读者，这个社会主义作家就不会陷入浪漫主义的幻想，认为他或她自己的工作可以积极组建这样一个读者群体；因为

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的“读者”在政治上是预先确定和预先给定的，而不仅仅是那些分享一份情感的人，还有那些占据一个共同的社会位置的人。那个浪漫主义诗人面对政治性的东西时寻求让自己的话语和一个共同文化达成一份协议；而对于这位社会主义批评家来说，政治性的东西是这种团结的前提。社会主义批评不能召唤出一个反公共领域；相反，这种批评本身不能完全存在，要到这样一个领域已经被营造出来才行。在此之前，这位社会主义批评家仍将被困在圣人与文人之间，并将前者批判性的分裂与后者实践的、投入的、广泛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批判性的分离和提纲性的参与之意，它抓住了这个悖论中的一些东西。雷蒙德·威廉斯的作品因此最终无法跨越的边界不是知识性学科——政治和文学，或者，批评性写作和“创造性”写作——之间的那些边界；那些都是学术机构和政治社会之间的前沿地带，是缺场的反公共领域才使其凸显出来。

115

与18世纪的国家 and 公共领域不同的是一个第三领域，尤尔根·哈贝马斯将其称为“私密”(intimate)家庭领域。这个“私密”领域不属于公共领域，现在，作为后封建主义家

庭(the post-feudalist family), 它降格为隐私性的区域;但是, 尽管如此, 它仍为那个更为公共的竞技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冲量和能量来源。如果说英国的咖啡屋不像法国的沙龙, 它们把妇女排除在外——她们经常被触动, 要制作宣传小册子来揭露喝咖啡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那是因为在 18 世纪早期的英国, “文化”承担着妇女被禁止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波折之后, 妇女在 1928 年终于成功获得选举投票权, 被正式纳入政治公共领域, 然而此时该领域实际上已经过气了。虽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正式将这个“私密”界域排除在外, 然而, 它却以其他方式完全抵押给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因为 18 世纪的公共领域将主体性的形式主题化, 并对其加以巩固, 这些形式的根基都在家庭内部。这个内部世界产生新的主体性形式, 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 它们是“以公众为导向的”, 然后它们进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公共领域, 去获得自我反思性的表达方式。塞缪尔·理查德森那个著名女性小圈子中的商讨现象就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通过不断的、集体的、“理性的”讨论, 亲密的感情模式和行为模式得以明确下来, 可作为公共形式进行具体的表述。当然, 这些讨论的焦点是文学;情况就是如此, 这也

暗示出文学很有几分重要性，那时就跟现在一样。文学曾是如今私密化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¹与政治公共领域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或调节；它为商议新的主体性模式提供了象征形式，然后这些新的主体性模式又可以移植到公共领域。一旦文学有了体验性和反思性，深刻内向但形式规范，它就占据了一个特权空间，位于深沉的自治性主体和政治社会的制度生活这二者中间。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资产阶级的小说是从书信的形式——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私人信件——演化而来的，然后逐渐获得更加公开的相关地位。然而，这个过程自然也是更加辩证的，较之于如下这点：文学不仅是以更公开的幌子对这个亲密领域所进行的“反思”，也是家庭领域一个活跃的成分，它传授的是感情模式和关系模式，把它们拉回到家庭当中，它还进行干预，以便重新组织亲密场所，使其成为适合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目标的主体性形式。“文化”的作用，就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两个维度——家庭和政治社会——进行不断的调解，产生新的主体性形式，这两个维度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定义。

当然，这种不同性，有一部分是意识形态上的幻觉，但其功效却十分显著。家庭的“自主性”非常空洞，一如公共

1 指由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译注

117 领域本身的“自主性”，在某些方面，它们是平行的。二者都与政治社会串通一气，在此基础上再将自己从中独立出来。正如尼科斯·普兰查斯¹所写的那样，“个人私密领域，是国家在相对脱离社会公共空间的同时创造出来的……个人私密领域构成现代国家设立的那块战略要地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并被它固定为自己的权力目标。总之，它只存在于国家之中，只通过国家存在。”²如果公共领域里的关键点既不是权力，也不是等级，而是文明理性的本质，那么，在这种欺骗性的平等之下，不断滋养着它的，就是一个更为深沉的同质性：“人类”本身的同质性，它的家就是那个有着温暖炉火的家庭。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所有的资产阶级都合为一体。家庭这个思想观念在18世纪被用

1 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 1936—1979)，生于希腊，青年时期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怀有强烈兴趣，并参加了希腊共产党，积极参与国内政治活动。1968年，希腊共产党分裂后，他来到巴黎，立即被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不久以后，他自己也成为了这一学派的核心成员。他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尤其是阶级、国家、专政、意识形态等问题。1979年，普兰查斯由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悲观失望而自杀身亡。其代表作有《政治权利与社会阶级》、《法西斯主义与专政》、《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专政的危机》等。——译注

2 普兰查斯，《国家、权力、社会主义》(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1978, p.72。——原注

来掩盖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与资产阶级财产制度的相互关联，就跟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被用来掩盖公民社会的剥削现象一样。

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近代，公共领域、“私密”领域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公共领域日益“阶层分化”，“私密”领域渐渐被边缘化；国家教育和社会政策将先前留给家庭的许多功能接管过来，模糊了“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剥离了家庭的社会作用和生产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私密”领域被去私密化了，被拉进了公共社会——但具有显著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不料它又被重新私密化，成为了消费单位。以如今缩小的家庭空间为基础的私人消费和休闲娱乐，取代了从前与公共领域相关的社会讨论。妇女运动的出现，除了别的意义之外，还可以视为是对这些变化的一种反应。如果家庭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主体性的特权场所，如果“私密”领域内的经验本身已经商品化了，如果这个领域被日益纳入国家范畴，那么，将家庭完全社会化的女性主义要求，就会顺应历史，在那个非常时刻与掩饰物质演变(material evolution)的家国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这样一种观点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例如，家庭在某些方面依然不

是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场所；它不仅是家国意识形态，还是这种保全家庭的做法为资本主义带来的物质利益，这种做法在该问题上阻碍了女性主义的要求，而这些事实都完全没有被弄清楚。即便如此，妇女运动也已经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举动，重新制定了“公共”领域与“私密”领域的关系。具有惊人的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与公共领域的衰落密切相关的“私密”领域边缘化，导致了那个领域以一个新的反公共领域形式满血复活。这个新的领域就是女性话语和实践。与传统的公共领域一样，在这个新领域内，阶级分类尽管不会被忽视，但是可能会暂时中断：性别的共享事实能平衡其中所有的参与者。与传统的公共领域一样，“文化”再次成为政治和个人经验之间的重要纽带，把人的需求和欲望调节为可以公开讨论的形式，传授新的主体性模式，论战已接受的陈述内容。

119 如果把这个比喻扯得太远就有危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最显著的局限之一是它的理性主义特征，他后来的著作将其作为了社会主义未来的某种预示。这样一种模式似乎在延伸资产阶级理性本身的结构，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它们，作为某种准先验的能力。妇女运动明显不是这样的。身体的日益社会化导致女性主义关注“身体的政治”，它与任何这样的理性主义完全是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话语，

更一般地讲，男性理性的话语，基本上是脱离肉体的思想的一个混合，这些思想摆脱了欲望的束缚，正是因为它们没有感受到物质利益的压迫。这样的话语到了18世纪有可能会被视为是修辞性的，这正是该词本身具有的一种意义：旨在说服；但从这个词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话语不能被看作是修辞性的：像所有的话语，都刻有权力和欲望的运动痕迹。相比之下，女性主义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是自觉具有修辞性的、不熟悉的用语，所以更加明显地将自身出借给各种“文化”形式。这种语言，与后来哈贝马斯对恰当言语行为的一种通用理论的探寻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那么，妇女运动的兴起就是反公共领域出现的一个例子。在这个空间内，从前被压抑的或表达不清的需要、利益和欲望，找到了政治的符号的形式，被改变的用语、习俗和文化模式所调节。奥斯卡·内格特¹和亚历山大·克鲁格²认为，正是这种对审查过的个人经验的清晰表达，奠定了一个

1 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 1934—)，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阿多诺的学生，曾做过哈贝马斯的助手，代表作有《政治的人：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等。——译注

2 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 1932—)，德国人，身份多重，主要是导演、作家、学者。作为导演，其代表作有《昨日女孩》、《马戏院帐篷顶上的艺人》、《德国之秋》、《情感的力量》等，曾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作为作家，其代表作有《战争》、《致命学习过程》、《感觉的力量》、《魔鬼的盲点》等，曾获毕希纳奖；作为学者，他常与奥斯卡·内格特合作，代表作有《公共领域与经验：面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公共领域分析》、《历史与固执》等，曾获阿多诺奖。——译注

120 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这个领域将不会与有组织的劳工机构共同延展。¹ 在这样一个场所内，目前在家庭中被扭曲表达的真实的需求和欲望，将被赋予新的形式和方向。如果我们再一次考虑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的命运，从允许艺术实现一定自主性的早期商品生产，一直考察到把主体性领域占为己有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的重要性就会变得很清楚。约翰·勃莱恩克曼²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这一观点通过两个阶段的转型，演变了社会生活的经济维度和象征维度之间的关系。在第一阶段，经济维度和象征维度大幅割裂：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剥去了劳动力所有情感的、象征性的内涵，将劳动力从它在封建制度下所了解的传统制裁、权利和义务背景中连根拔起。“它把所有其他的身体能量支出与这个活动分开，这些支出被指定为是非生产性的，在形形色色的情色、审美和宗教经验中表现自己。”³ 这种分化进入作为主体的人之后，分解了生产者与身体的关系：“与这个工具化的身体

1 参见内格特和克鲁格，《公共领域与经验：面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公共领域分析》（*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 Zur Organisationsanalyse von bürgerlicher und proletarischer Öffentlichkeit*），Frankfurt / Main, 1972。——原注

2 约翰·勃莱恩克曼（John Brenkman），现任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文学教授，杜克大学刊物《社会文本》的创始编辑。——译注

3 勃莱恩克曼，《大众媒体：从集体经验到私密文化》（*Mass Media: From Collective Experience to the Culture of Privatization*），载于《社会文本》（*Social Text*），第1期，1979年冬季号，p.94。——原注

(挣工资的劳动者)形成对照的,是主体与动欲的(erotogenic)身体的关系,这个主体有着复杂的关系网络,与那些构成全部社会经验的象征性形态和有效经历紧密相连。晚期资本主义克服了象征维度与经济维度的纯粹分离,但做到这点的方式却是把象征维度置于经济维度的主导之下。对这种包摄(subsumption)进行种种处理,正是旨在阻碍克服资本开创的主体性分离。”¹正是在此,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处理才是最关键的:“晚期资本主义通过其主导的文化形式和实践,力求从反意识形态的形成中割断社会经验,将集体经验拆分成一元而孤立的个体私密经验,并通过包摄调节社会生活的话语和图像,抢先获得关联效应。”²然而,资本主义原本就把物质生产从这些产生意义的领域——这是传统公共领域的条件——剥离出来了,它现在却回去根据商品的逻辑重新组织意义的生产工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政治权力介入商品交换的社会场所,某些社会力量——“大众文化”——因此就会承担起政治功能。

121

那么,大众文化的作用就是“抓住与社会经验相联系的

1 勃莱恩克曼, p.95。——原注

2 同上, p.98。——原注

种种话语，将它们重新加工成一种话语，用它来分散自己所处理的主体，就像它将这些主体产生的各种集体表达同质化一样”¹。请允许我在此阐述一下勃莱恩克曼的观点，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家庭，成为各种需求和欲望在其中进行协商的场所，甚至逐步渗透到家庭本身。在传统公共领域，私人经验奠定了公共交往的根基：参与者正是作为普通公民遇到彼此，他们的社会话语基本上就是由每个人的主观自主性构成的。家庭的“私密”领域顿时成为逃离这个世界的避难所，成了它的主体身份模式的一个矩阵。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私密化变为解除公共联系的方式，而非使其成为可能的条件；它是家庭和社会之间真正分离——缺乏一个或许可以调解它们的公共领域——的结果；矛盾的是，它又是家庭去私密化的结果，这种去私密化是通过把家庭的某些传统功能吸纳到国家来实现的，国家将家庭困住的手段几乎只有情感体验和消费体验。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逃脱市民社会的避难所，滋长着它未实现的生命冲动；但是由于它也不断受到商品文化的渗透，这个潜在的积极的个人竞技场不断忙于搞各种形式的私密化，让它们细化、序列化，然后断

1 勃莱恩克曼，p.105。——原注

开。同时，资产阶级传统领域的公共交往形式被替换，取代它们的是意识形态上强有力的同质化，是一种伪造的社会交往，不过是商品的均化效应(the levelling effect)罢了。当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来都不是将私人经验简单调节成公共形式，因为正是公共形式——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司法的——首先构建了私人经验。即便如此，一个从“私密”领域得来的主观经验还是通过公共领域的那些组织实现了话语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一种有分量的可能影响国家决策的公众舆论来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当代文化产业看起来就像是传统公共领域的一幅粗俗漫画，它借鉴了真实的个人体验，用自己的习惯用语将其再次清楚表达出来，它将这个信息返回给它的消费者所用的方法，能够把他们牢牢地锁定在一个私密化的世界。勃莱恩克曼写道：“资本不能说话，但它可以积累，把自己集中在传播媒体、事件以及对象这些方面，它们都充满了一种力量，要把集体经验的话语变成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重组为连续性的一种话语。”¹

不言而喻，这种处理方法根本不是必然的或非矛盾的

1 勃莱恩克曼，p.105。——原注

123 (non-contradictory)。“媒体化的公共领域”——勃莱恩克曼这样称呼它——不会延续自身，“它的形成只是因为它不断挪用、拆卸和重组社会群体的意指性实践”。因此，法兰克福式的失败主义或恩岑斯贝格尔¹式的必胜信念都是不合适的。真正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不考虑批评与那个领域漫画式的当代形象——即文化产业——的关系，对批评与传统公共领域的关系的调查就无法结束。18世纪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在公共领域的文化政治中发挥了作用，当代的社会主义批评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因此必须参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从而确定自己的存在意义。这两种策略都不再孤立地关注“文学文本”。勃莱恩克曼论道：“建构一个无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需要与那些象征形式做坚持不懈的斗争，媒体化的公共领域通过那些象征形式构成主体性，并把它置于商品的统治之下。”²当代批评家的作用就是抵制这种支配行为，把象征符号跟政治重新联系起来，通过话语和实践参与这个过程，使得被压抑的需求、利益和欲望可以获取那些能够将它们焊接成一个集体政治力量的文化形式。

1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1929—)，德国诗人、作家，著有《比空气轻》、《动荡》、《将军和他的子女们》等书。——译注

2 勃莱恩克曼，p.108。——原注

那么，当代批评家的角色就是一个传统角色。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将批评召回它的传统角色，而不是为它创造出某种时髦的新功能。对于西方社会新一代的批评家而言，“英国文学”现在是贴在某个领域上的一张继承而来的标签，这个领域内聚集了许多不同的东西：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电影研究、文化理论、性别再现、通俗写作，当然也包括传统上受到重视的过去的著作。除了关注对社会生活的符号化处理，以及主体性形式的社会生产之外，这些研究兴趣明显缺乏统一性。觉得这些研究兴趣很时髦、是令人反感的新玩意儿的批评家都被误解了，这是一个文化历史问题。这些研究兴趣代表的是当代对最庄严的批评主题的一种看法，此前批评被限定、被困顿在了所谓的“文学正典”（literary cannon）之中。此外，我们可以认为，这样一种拷问可能以某种适度的方式有助于我们本身的生存。因为，政治权力通过这些符号化处理进行配置、得到巩固、被抵抗、有时被颠覆，如果不能对它们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将无法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危害性最大的权力斗争，这一点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明显。现代批评是在反对绝对主义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定义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根本没有前途。

索引

- 阿尔都塞, 路易 Althusser, Louis 96
- 阿拉克, J. Arac, J. 129n
- 艾迪生, 约瑟夫 Addison, Joseph 10-13, 18-19, 24-25, 30-34, 37, 47, 50-51, 53, 56, 62-64, 73-75, 78, 82, 125n, 126n
- 艾利厄瑟夫, L. A. Elioseff, L. A. 125n
- 艾略特, T. S. Eliot, T. S. 33, 67, 100
- 艾略特, 乔治 Eliot, George 58
- 《爱丁堡评论》 *The Edinburgh Review* 37-38, 48-49, 60, 75, 79
- 安德森, 佩里 Anderson, Perry 8
-
- 巴雷尔, 约翰 Barrell, John 8, 35, 69-70, 126n
- 白芝浩, 瓦尔特 Bagehot, Walter 49-52, 58
- 班尼特, 戴维 Bennett, David 8
- 邦德, 理查德·P. Bond, Richard P. 17, 125n
- 鲍斯维尔, 詹姆斯 Boswell, James 32-33
- 贝尔顿, 尼尔 Belton, Neil 8
- 贝尔雅姆, A. J. Beljame, A. J. 11-14, 125n
- 贝利, 约翰 Bayley, John 104
- 贝文顿, M. M. Bevington, M. M. 127n
- 本雅明, 瓦尔特 Benjamin, Walter 62, 101, 112, 128n
- 《笔记与质询》 *Notes and Queries* 66
- 边沁, 杰里米 Bentham, Jeremy 54, 85
- 宾斯万格 Binswanger 101
- 波德莱尔, 夏尔 Baudelaire, Charles 91

- 勃莱恩克曼, 约翰 Brenkman, John 120-123, 129n
- 勃朗特, 夏洛蒂 Brontë, Charlotte 38
- 博维, 保罗 Bové, Paul 102, 129n
- 《布莱克伍德杂志》 *Blackwood's Magazine* 37-38
- 布莱森, 约翰 Bryson, John 128n
- 布莱希特, 贝托尔德 Brecht, Bertolt 89, 112
- 布朗肖, 莫里斯 Blanchot, Maurice 101
- 布鲁姆, E. A. Bloom, E. A. 125n
- 布鲁姆, L. D. Bloom, L. D. 125n
- 布鲁姆, 哈罗德 Bloom, Harold 101
- 布鲁斯, 伊丽莎白 Bruss, Elizabeth 70, 86-88, 90, 128n
- 布伦登, 埃德蒙 Blunden, Edmund 126n
- 丹顿, 约翰 Dunton, John 19
- 《悼念》(丁尼生) *In Memoriam* (Tennyson) 58
- 德·曼, 保罗 de Man, Paul 100-101, 104, 129n
- 德莱顿, 约翰 Dryden, John 9, 72, 125n
- 德里达, 雅克 Derrida, Jacques 91, 98, 101
- 狄更斯, 查尔斯 Dickens, Charles 57, 59, 67
- 迪斯雷利, 艾萨克 D'Israeli, Isaac 16
- 笛福, 丹尼尔 Defoe, Daniel 14, 18, 31
- 杜德克, 路易斯 Dudek, Louis 127n
- 恩岑斯贝格尔, 汉斯·马格努斯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123
- 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101-102, 123
- 菲尔特斯, 诺曼 Feltes, Norman 8
- 弗莱, 诺斯洛普 Frye, Northrop 84-85

- 《弗雷泽杂志》 *Fraser's Magazine* 37, 40
- 弗利, 蒂莫西·P. Foley, Timothy P. 125n
- 弗洛希诺夫, V. N. Voloshinov, V. N. 109
- 伏尔泰 Voltaire 12
- 福柯, 米歇尔 Foucault, Michel 91, 109
- 福斯特, E. M. Forster, E. M. 100
- 高吉克, W. Godzich, W. 129n
- 戈德史密斯, 奥利弗 Goldsmith, Oliver 16
- 戈里斯特, 格内维尔 Griest, Guinevere 127n
- 格雷厄姆, 沃尔特 Graham, Walter 25, 126n
- 格林, T. H. Green, T. H. 22
- 格罗斯, 约翰 Gross, John 127n
- 哈贝马斯, 尤尔根 Habermas, Jürgen 8-9, 11, 36, 64, 80, 115, 118, 125n
- 哈特曼, 杰弗里 Hartman, Geoffrey 101
- 海克, T. W. Heyck, T. W. 45, 47-48, 66, 127n, 128n
- 豪威, P. P. Howe, P. P. 126n
- 赫顿, R. H. Hutton, R. H. 127n
- 赫里克, 罗伯特 Herrick, Robert 108
- 赫兹利特, 威廉 Hazlitt, William 21, 31-32, 38, 41, 126n
- 亨特, 利 Hunt, Leigh 37-39
- 亨特, 约翰 Hunt, John 37
- 胡塞尔, 埃德蒙德 Husserl, Edmund 101
- 华兹华斯, 威廉 Wordsworth, William 41-42, 114
- 辉格党 Whigs 11, 22, 24, 38
-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8
- 霍顿, 瓦尔特 Houghton, Walter 127n

- 霍恩达尔, 彼得·乌维 Hohendahl, Peter Uwe 10, 13, 21, 48, 66, 79, 125n, 128n, 129n
- 霍普, 贝雷斯福德 Hope, Beresford 59
- 霍钦斯, C. W. Houtchens, C. W. 126n
- 霍钦斯, L. H. Houtchens, L. H. 126n
- 济慈, 约翰 Keats, John 38
- 杰弗里, 弗朗西斯 Jeffrey, Francis 37-38, 40-41, 48-49, 60
- 杰克, 简 Jack, Jane 17, 125n
- 金斯利, 查尔斯 Kingsley, Charles 40
- 卡夫, 埃德蒙 Cave, Edmund 31
- 卡莱尔, 托马斯 Carlyle, Thomas 39-41, 45-47, 56, 127n
- 卡扎米安, L. Cazamian, L. 25, 126n
- 康格里夫, 威廉 Congreve, William 72
- 《康希尔杂志》 *The Cornhill Magazine* 66
- 考克斯, R. G. Cox, R. G. 75, 126n, 128n
- 考珀, 威廉 Cowper, William 24
- 柯勒律治, 塞缪尔·泰勒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39, 46, 54, 64
- 柯林斯, A. S. Collins, A. S. 17, 125n
- 柯托普, W. J. Courthope, W. J. 125n
- 科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36
- 科尔, 威廉·P. Ker, William P. 125n
- 科利茨, 特里 Collits, Terry 8
- 克拉克, 约翰 Clarke, John 14
- 克莱夫, 约翰 Clive, John 126n, 127n
- 克鲁格, 亚历山大 Kluge, Alexander 119, 129n
- 克鲁奇, 约瑟夫·伍德 Krutch, Joseph Wood 71, 126n

- 肯特, 克里斯托弗 Kent, Christopher 59-60, 127n
- 库克, 托马斯 Cooke, Thomas 14
- 兰姆, 查尔斯 Lamb, Charles 38
- 劳伦斯, D. H. Lawrences, D. H. 75
- 勒古伊, P. Legouis, P. 25, 126n
- 理查德森, 塞缪尔 Richardson, Samuel 29, 116
- 理查兹, I. A. Richards, I. A. 84-85
- 利维斯, F. R. Leavis, F. R. 23, 70-78, 80-82, 87, 99, 127n, 128n
- 利维斯, Q. D. Leavis, Q. D. 11
- 《领袖》 *The Leader* 55
- 刘易斯, 乔治·亨利 Lewes, George Henry 46, 55
- 卢卡奇, G. Lukács, G. 96, 102
-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12
- 《伦敦杂志》 *The London Magazine* 37-38
- 《论批评》(蒲柏) *Essay on Criticism* (Pope) 21
- 《论自由》(密尔) *On Liberty* (Mill) 53-54
- 罗宾逊, H. G. Robinson, H. G. 127n
- 罗蒂, 理查德 Rorty, Richard 23, 126n
- 罗杰斯, 帕特 Rogers, Pat 29, 126n
- 罗斯金, 约翰 Ruskin, John 40
- 马丁, W. Martin, W. 129n
- 马尔, G. S. Marr, G. S. 33, 126n
- 马克思主义 Marxism 94, 96-97, 109
- 马修斯, 罗伯特·J. Matthews, Robert J. 90
- 麦考雷, 托马斯 Macaulay, Thomas 10, 24, 56, 126n
- 《漫步者》 *The Rambler* 33, 70

《米德尔马契》 *Middlemarch* (George Eliot) 55

米勒, J. 希利斯 Miller, J. Hillis 101, 105, 128n

密尔,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53-55, 127n

莫雷, 约翰 Morley, John 51, 55, 113, 127n

莫伊, 托瑞尔 Moi, Toril 8

穆迪, 查尔斯 Mudie, Charles 57

穆尔赫恩, 弗兰西斯 Mulhern, Francis 8, 78, 128n

内格特, 奥斯卡 Negt, Oskar 119, 129n

纽曼, 约翰·亨利 Newman, John Henry 55

诺克斯, 威斯希姆 Knox, Vicesimus 126n

欧文主义 Owenism 36

潘恩, 托马斯 Paine, Thomas 36

《旁观者》 *The Spectator* 10-11, 14, 17-20, 22, 26, 29, 39, 51, 73

《批评》 *The Critical Review* 33

皮奇, 格雷厄姆 Pechey, Graham 8

皮斯, 唐纳德 Pesse, Donald 102

《评论》 *The Review* 18

《评论季刊》 *The Quarterly Review* 37, 59

蒲柏, 亚历山大 Pope, Alexander 11, 21, 29-30

普兰查斯, 尼科斯 Poulantzas, Nicos 117, 129n

《萨伏伊》 *The Savoy* 67

萨克雷, 威廉·梅克皮斯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40, 58

桑德斯, J. W. Saunders, J. W. 125n

沙拉特, 伯纳德 Sharratt, Bernard 8

- 《绅士杂志》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31
- 《审查者》 *The Examiner* 37
- 圣约翰, 亨利 St John, Henry 24
- 《诗人传》(约翰逊) *Lives of the Poets (Johnson)* 33
- 史蒂芬, 莱斯利 Stephen, Leslie 12, 17, 23, 30, 32-33, 47-48, 56-57, 62, 66, 76, 114, 125n, 126n, 127n, 128n
- 史密斯, W. H. Smith, W. H. 57
- 《双周评论》 *The Fortnightly Review* 51, 55, 59
- 斯大林主义 Stalinism 101
- 斯德乌斯, 苏珊 Staves, Susan 30, 126n
- 斯蒂尔, 理查德 Steele, Richard 10-11, 18-19, 21, 24-25, 31-33, 37, 47, 51, 62-64, 73-74, 78
- 斯科特, 约翰 Scott, John 37
- 斯莫利特, 托比亚斯 Smollett, Tobias 33
- 斯威夫特, 乔纳森 Swift, Jonathan 11, 24-25
- 汤普森, E. P. Thompson, E. P. 36, 111
- 汤普森, 丹尼斯 Thompson, Denys 75, 128n
- 特里林, 莱昂内尔 Trilling, Lionel 104
- 特罗洛普, 安东尼 Trollope, Anthony 67
- 托利党 Tories 11, 22, 24-25, 38
- 瓦特, 伊恩 Watt, Ian 31, 126n
- 《威廉·麦斯特》(歌德) *Wilhelm Meister (Goethe)* 48
- 威廉斯, 雷蒙德 Williams, Raymond 25, 108-115, 129n
- 《威斯敏斯特评论》 *The Westminster Review* 58-59
- 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希 Wittgenstein, Ludwig 89
- 魏曼, 罗伯特 Weimann, Robert 107, 129n

沃尔夫, M. Wolff, M. 127n

《细察》 *Scrutiny* 70, 74-79, 81-84, 103, 105, 107

夏托克, J. Shattock, J. 127n

《闲话报》 *The Tatler* 10-11, 17-22, 26, 29, 51, 73

《闲人》 *The Idler* 70

《心智》 *Mind* 66

《星期六评论》 *The Saturday Review* 59-60, 79

雪莱, 珀西·比希 Shelley, Percy Bysshe 38

《雅典娜信使》 *The Athenian Mercury* 19

《亚当·彼得》(乔治·艾略特) *Adam Bede* (George Eliot) 58

燕卜苏, 威廉 Empson, William 84

耶鲁学派 Yale School 100-102, 104-105

伊格尔顿, 特里 Eagleton, Terry 126n, 128n

《英国历史评论》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66

《愚人志》(蒲柏) *The Dunciad* (Pope) 25

约翰逊, 塞缪尔 Johnson, Samuel 11-12, 31-35, 53, 56, 70-75, 82, 127n

詹姆斯, 亨利 James, Henry 66, 76, 100, 103

詹姆逊, 弗雷德里克 Jameson, Fredric 90, 128n

《准绳》 *The Criterion* 33, 67

《自我者》 *The Egoist* 67

《作为补充的论说文》(华兹华斯) *Supplementary Essay* (Wordsworth) 42

《作为英雄的文人》 ‘*The Hero as Man of Letters*’ (Carlyle) 46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by Terry Eagleton, ISBN: 9781844670550

Copyright © Terry Eagleton 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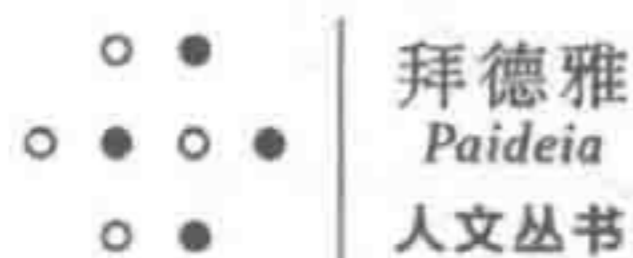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1984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Verso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hongqing Yuanyang Culture &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6) 第 253 号



(书名以出版时为准)

- | | |
|----------------------------|-----------------------|
| 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神圣人”系列二之三) |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
| 宁芙 |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
| 意大利范畴：诗学研究 |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
| 奇遇 |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
| 普尔奇内拉或献给孩童的嬉游曲 |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
| 身体之用(“神圣人”系列四之二) |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
| 历史之眼(第4卷)：被展现的人民，作为配角的人民 | [法]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著 |
| 自我解释学的起源：福柯1980年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演讲 | [法]米歇尔·福柯 著 |
| 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 | [法]米歇尔·福柯 著 |
| 社会学的技艺 |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
| 学术人 |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
| 社会学的问题 |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
| 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著 |
| 非人：漫谈时间 |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 |
| 异识 |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著 |
| 不可言明的共通体 | [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
| 海德格尔：纳粹主义、女人和哲学 | [法]阿兰·巴迪欧&[法]芭芭拉·卡桑 著 |
| 怎么办？ | [法]阿兰·巴迪欧&[法]马塞尔·格歇 著 |
| 模式的概念 | [法]阿兰·巴迪欧 著 |
| 什么是人民？ | [法]阿兰·巴迪欧等 著 |
| 苏格拉底的第二次审判 | [法]阿兰·巴迪欧 著 |

- 追寻消失的真相 [法] 阿兰·巴迪欧 著
- 资本主义、欲望与奴役 [法] 弗里德里克·罗尔顿 著
- 从康吉莱姆到福柯：规范的力量 [法] 皮埃尔·马舍雷 著
- 我们自身以外的陌生人 [法]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著
-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 [法] 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 著
- 时间与他者 [法]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著
- 绝对的制图学 [英] 阿尔贝托·托斯卡诺 & [英] 杰夫·金科勒 著
- 生产的剧场：在康德与德勒兹之间的哲学与个体化 [英] 阿尔贝托·托斯卡诺 著
- 走向思辨实在论：论文和讲座集 [美] 格拉汉姆·哈曼 著
- 铃与哨：更思辨的实在论 [美] 格拉汉姆·哈曼 著
- 阅读我的欲望：拉康反历史主义 [美] 乔安·柯普耶克 著
- 虚无的解放：启蒙与灭绝 [英] 雷·布拉西耶 著
- 资本主义的幸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法] 亨利·列斐伏尔 著
- 非政治的范畴 [意]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 著
- 电子眼：监视社会的兴起 [英] 大卫·里昂 著
- 潘多拉的希望 [法] 布鲁诺·拉图尔 著
- 巴斯德：细菌的战争与和平 [法] 布鲁诺·拉图尔 著
- 再魅化世界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 著
- 逃逸线 [法] 菲利克斯·加塔利 著
- 批评的功能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